

目录

[理想國譯叢序 8](#_Toc54780184)

[導讀　作為方法的日本 9](#_Toc54780185)

[序言　東京奧運會 12](#_Toc54780186)

[第一章　黑船來襲 14](#_Toc54780187)

[第二章　文明開化 21](#_Toc54780188)

[第三章　色情的、獵奇的、無意義的 30](#_Toc54780189)

[第四章　“啊，我們的滿洲” 38](#_Toc54780190)

[第五章　與西方開戰 45](#_Toc54780191)

[第六章　東京布基伍基 51](#_Toc54780192)

[第七章　1955年之散記 59](#_Toc54780193)

[跋　戰后時期的終結 64](#_Toc54780194)

[專有名詞詞匯表 67](#_Toc54780195)

[引用文獻 69](#_Toc54780196)

[索引 72](#_Toc54780197)





（荷）伊恩·布魯瑪　著

創造日本：1853-1964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

INVENTING JAPAN

Copyright © 2003, Ian Burum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eidenfeld & Nicols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四川省版權局著作權合同登記號：圖［進］21-2017-684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創造日本：1853-1964 / (荷) 伊恩·布魯瑪著 ; 倪韜譯.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220-10661-3

Ⅰ. ①創… Ⅱ. ①伊… ②倪… Ⅲ. ①日本－歷史－研究－1853-1964 Ⅳ. ①K313.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7)第315320號

出版發行：四川人民出版社

地　　址：成都槐樹街2號

網　　址：http://www.scpph.com

責任編輯：張　丹

特邀編輯：王燕秋　梅心怡

裝幀設計：陸智昌

內文制作：陳基勝

# 理想國譯叢序

“如果沒有翻譯，”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曾寫道，“我們無異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語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應說，“翻譯不僅僅是言詞之事，它讓整個文化變得可以理解。”

這兩句話或許比任何復雜的闡述都更清晰地定義了理想國譯叢的初衷。

自從嚴復與林琴南締造中國近代翻譯傳統以來，譯介就被兩種趨勢支配。

它是開放的，中國必須向外部學習；它又有某種封閉性，被一種強烈的功利主義所影響。嚴復期望赫伯特·斯賓塞、孟德斯鳩的思想能幫助中國獲得富強之道，林琴南則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變國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與故事，必須以我們期待的視角來呈現。

在很大程度上，這套譯叢仍延續著這個傳統。此刻的中國與一個世紀前不同，但她仍面臨諸多嶄新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他人的經驗來幫助我們應對難題，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面對復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保持一種非功利的興趣：對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本身充滿興趣，真誠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經驗。

# 導讀　作為方法的日本

許知遠

一

“在黃子成書十年，久謙讓不流通，令中國人寡知日本，不鑒不備，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在為黃遵憲的《日本國志》撰寫的后序中，梁啟超這樣感慨。

這是1897年末，距離中日甲午戰爭結束不過兩年。在這場戰爭中，中國意外地大敗于日本，簽署了屈辱的《馬關條約》——割讓了臺灣，并付出了兩億兩白銀的賠款。這場戰爭最終將中國從昏睡中叫醒，她不僅不再是世界的中心，還可能有亡國之危險。此前，不管1840年的中英之戰爭，還是英法聯軍在1860年燒了圓明園，或是1883——1885年的中法之戰，都未給中國帶來震撼。對于很多士大夫來說，它們都是來自遠方蠻夷的挑戰。但這次不同，日本常年被視作中國的附屬國，即使它不從屬于朝鮮、越南、緬甸這個序列，也相差不遠，它被輕蔑地視作“倭國”。日本的勝利還撕去了神秘中國的最后面紗——在她傲慢與遼闊背后，是無能與虛弱。

戲劇性的是，在短暫的敵意之后，日本成為羨慕與模仿的對象。1887年寫就的《日本國志》長期無人問津，此刻突然受到歡迎，幾個書局重印了它，甚至光緒皇帝也成了它的讀者。人們相信這本書蘊含了日本富強之秘密。另一位維新者康有為干脆勸光緒追隨明治天皇，像后者再造日本一樣再造中國。當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訪華時，維新者向他尋求變革中國之建議，一些人甚至期待他擔任客卿，直接指導一切。

百日維新失敗了，日本模式吸引力卻并未減弱。1898——1911年間，至少有兩萬五千名中國學生前往日本留學，被形容成“歷史上第一次以現代化為定向的，真正大規模的知識分子的移民潮”。未來中國的領袖們——從軍事家蔡鍔、蔣介石到文學人物魯迅、陳獨秀——都是其中一員。流亡中的梁啟超，將橫濱變做他的知識生產中心，他在這里編輯的報刊被偷運回國內，塑造了一代中國知識人的思維。在國內，清政府參照日本改革了警察與監獄系統，維新派官員甚至準備推行日本式的君主立憲制。

在這高昂的熱忱背后，中國人又對日本有多少了解？令梁啟超備感嘆服的《日本國志》真的能給予中國變法以參照嗎？駐北京的日本公使矢野文雄不無譏笑地說，倘若根據《日本國志》來理解日本，就像是以明史記載來理解今日中國的時局。敏銳的觀察者如黃遵憲，也很難洞悉日本的變化速度有多快。而以國師自居的康有為在《日本變政考》中，向光緒描述的明治維新是出于自己的臆想，還得出這樣的荒唐邏輯——倘若日本用三十年可以變法成功，以中國這樣大得多的規模，三年就可以了。

對于一個世紀前的中國維新者來說，日本令人著迷，既因它突然獲得富強的能力，也因為它可能導向某種速成之路。在20世紀初的東京，到處是為中國學生所設的速成學校，從語言、法律到軍事、政治，這些青年人想用幾個月，最多幾年來掌握一切。他們以同文同種的眼光來看待日本，倘若日本能迅速掌握西方的秘訣，他們也同樣能迅速掌握日本的秘訣。

當鄧小平在1978年訪問日本時，很少有人記得黃遵憲與康有為的插曲了。在中國的革命史敘事中，他們是可以被忽略的改良人物。但革命家鄧小平發出了相似的感慨，他在參觀新干線時感慨：“快，真快！就像后邊有鞭子趕著似的！這就是現在我們需要的速度。”他還說，“這次訪日，我明白什么叫現代化了。”這也是令人心酸的感慨，鄧小平與20世紀初的維新者一樣，他們在東京看到了一個新世界。

日本再一次成為速成教材。就像明治日本被視作富強之表率一樣，戰后日本則被看作一個純粹的經濟故事。這個日本故事沒有持續多久，就因股市與地產的崩潰而結束。中國經濟的崛起似乎徹底終結了日本作為榜樣的時代。21世紀到來了，東京的商場、旅店與公園里擠滿了來自中國的游客，《讀賣新聞》、NHK上充斥著關于中國經濟實力的報道。中國媒體不斷重復著日本“失落的二十年”論調。日本變成了某種反面教材，評論家們提醒中國不要重復它的經濟泡沫與萎靡不振。

但中國游客很快就發現，盡管中國經濟規模龐大，他們還是想在銀座買下一個馬桶蓋，去逛京都的寺廟，感慨日本鄉村之整潔、人民之禮貌，追著村上春樹的小說與日劇《深夜食堂》。一些時候，21世紀富有的中國游客的感受竟與一個世紀前的留學生不無相似，“日本政治之善，學校之備，風俗之美，人心之一”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

與此同時，我們對日本的理解欠缺且滯后。中國知識分子們談論此刻日本時仍常引用《菊與刀》與《日本論》，前者是20世紀40年代美國人類學家的著作，后者則來自民國時的戴季陶。日本社會內在的復雜性很少進入我們的視野。它要么是被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敵人，要么是一個值得模仿的鄰國。至于日本到底是什么？我們仍缺乏興趣。

二

在翻閱伊恩·布魯瑪的《創造日本》時，讓我深感興趣的是近代日本的矛盾性。它對西方的妒羨交織之情，它內部威權傳統與自由文化的交戰，這兩股不同的力量，驅動了日本迅速崛起，也將它引向災難。

這是一本緊湊卻雄心勃勃的著作。在不到200頁的容量里，作者對近代日本進行俯瞰式的描述。他以1853年的黑船來襲作為現代日本的開端，傳統的日本秩序開始瓦解，西方既是屈辱又是力量的來源。1964年東京奧運會則是全書結尾，作為主辦國的日本特意設立了一項無差別組的柔道比賽，但當自己的傳奇選手神勇昭夫意外地輸給荷蘭選手后，他們接受了失敗，將掌聲給予了勝利者。

“過分自信、狂熱心理、深深的自卑感以及時而執念于民族地位的想法——所有這些因素對日本現代史都產生過影響，但相較于其他品質，有一種最令人受用：那就是雖敗猶榮時的那份優雅”，布魯瑪寫道，他相信這標志著現代日本轉型之完成，它對世人展現了一種更成熟的姿態。

倘若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著迷于日本所代表的富強秘密，伊恩·布魯瑪則鐘情于日本歷史的連續性與復雜性，以及在這樣一個國家建立現代政治制度、自由文化之艱難。

很少有人比他更有資格來描述近代日本故事。他在亞洲、歐洲與美洲都有著廣泛游歷，敏感于東西方文明間的沖突與融合。出生于荷蘭這一背景或許還增加了這種理解力。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荷蘭是日本窺望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蘭學也是想獲得新知的日本學者的唯一選擇。他也屬于在20世紀80年代成熟起來的文化批評家，確信個人自由與普世主義，常以懷疑的姿態看待各種“文化特殊論”。

在這本小書中，中國知識分子可以讀到他們熟悉的命題。同樣面對西方之沖擊，為何日本成功，中國卻失敗了？在作者看來，日本文化之邊緣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是中國式自我中心的龐然大物，日本思想家可以輕易把目光從中國轉向西方，展開一場新的學習。日本也從不是集權的社會，并存的天皇與幕府給予維新者更大的回旋空間。

但更重要的段落卻留給了中國知識分子無暇顧及或刻意忽略的東西——富強背后蘊含的黑暗。明治維新在軍事、工業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日本從未進行完整的現代政治改革。日本盡管制定了憲法，“但立國基礎不仰賴政治權利，取決于對天皇制度的宗教崇拜以及通過國家神道灌輸的日本起源論”。

這個政治制度也要為日后之失敗負責。天皇是名義上的負責人，卻不參加具體之決策，也不需為此承擔責任。正是這種缺乏明確的問責制將日本拖入了二戰，就像一位高級官員的回憶：“海軍打心底里認為與美國開戰必敗無疑，只是不愿公開表態。陸軍未必真想打仗，又極力反對從中國撤軍。外相堅定地認為，不答應從中國撤軍，與中國的交涉斷無希望成功。”沒人真心支持戰爭，同樣沒人愿意公開表態反對，一套自上而下都不負責的氣氛最終將日本拖入災難。

一種對應的自由文化從未建立起來，對西方之焦灼感與威權文化的影響，都讓它步履維艱。從一開始，“文明開化”運動也蘊含著兩面性，它追求現代的自由、平等理念，又著迷于對外擴張，整個國家被強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支配著。作為明治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澤諭吉以倡導西方文明著稱，竭力推動日本獲得平等地位，當聽到戰勝中國的消息時，他興奮地跳起來。即使在更為開放的大正年代，日本社會也始終伴隨著個人主義帶來的緊張感，投入天皇的“圣戰”反而讓人感到放松。

伊恩·布魯瑪明顯地善于處理一個更開放、自由的日本，其中一些細節尤其妙趣橫生。“日本人竭力模仿歐洲人的一顰一笑，男賓們抽著哈瓦那雪茄，玩惠斯特牌；其他人則小口小口品著宴會桌上堆積如山的松露、果醬和冰淇淋雪葩”，他這樣描述明治人物對西方之仿效。他對于大正時代的銀座則寫道：“小伙子留著長發，戴著‘勞埃德’式眼鏡，穿著喇叭褲和花襯衫，扎著松松垮垮的領帶。他們和梳著蘑菇頭的姑娘徜徉在栽有垂柳的大街上。血氣方剛的青年聚在‘茶店鋪’里討論德國哲學或俄國小說，因此得名‘馬克思少男少女’。”

在近代日本，這表面對西方的羨慕與追隨，總是讓位于嫉恨與對抗。直到美國人的到來，似乎才打破了這種循環。日本終于呈現出東京奧運會的成熟一幕。但日本真的變成了一個正常國家嗎？在戰后的經濟復蘇中，昔日的財閥與政治家族很快又占據了主宰。在21世紀開始的東京，不止一個日本人向布魯瑪抱怨，他希望再有黑船來襲，他們覺得只有借助外力，才能打破日本之封閉。在這令人悲哀的抱怨背后，也讓人不禁想象，倘若麥克·阿瑟將軍當年大膽地廢除了天皇制，日本將會以何種面目出現？

回到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國歷史。倘若中國知識分子能在尋求富強之道時，也能意識到日本模式所蘊含的黑暗力量，近代中國之路或許也會變得不同。這一點對于正在獲得富強的中國，尤其富有啟發。

# 序言　東京奧運會

1964年，日本回歸世界舞臺，戰后那段饑饉、恥辱和持續至1952年的被盟軍占領的歲月終于畫上了句號。隨之而來的是被稱為經濟奇跡的繁榮年代。就正式的政治層面而言，日本早在1951年就已作為主權國家重返世界舞臺，因為是年9月，時任內閣總理大臣（首相）的吉田茂同日本過去的敵國美、英、法等國（不包括中國和蘇聯）簽署了《舊金山和約》（Treaty of San Francisco，又稱《對日和平條約》），但1964年奧運會落戶東京讓這一年的秋天成了日本隆重慶祝其和平改造和戰后民主復興的絕佳契機。日本再也不是那個灰頭土臉的戰敗國了，而已然重獲世人的尊重。歷經數年的大興土木，修建起高速路、體育場、酒店、下水道、輕軌和地鐵后，東京準備以一場主題為愛、和平與體育競技的盛會來迎接全世界的矚目。

10月10日下午，人們坐在丹下健三 [\*](#_2)  設計的嶄新體育場內，看著九十四個參賽國的運動員入場，一一經過觀眾席。美國代表團頭戴牛仔帽，日本健兒則一襲紅色運動裝。坐在皇家包廂里的裕仁天皇向全世界友好地揮手致意，八千只潔白的和平鴿振翅翱翔。對于任何經歷這一幕的人而言，當他再回想起1933年日本憤而退出國聯，并于1940年加入軸心國妄圖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起瓜分世界的那段往事，想必會有種恍如隔世之感。“滿洲國”、南京大屠殺、偷襲珍珠港、巴丹死亡行軍、沖繩戰役和馬尼拉屠城——所有這一切此刻似乎已成過眼云煙，報紙上每天都會刊載成千上萬日本人投書的小詩，抒發他們內心的喜悅。一位淳樸的日本人感慨道：

一面又一面，總共九十四面國旗，

當中一些指不定還曾相會于沙場。

這首詩之所以引人注目，不是因為其文采有多斐然，而在于作者用了“指不定”這一古怪的字眼。但正如愛德華·塞登斯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所言——我在本書中也會援引他的著作——這或許可以理解為“日本人習慣把話說得含蓄一些的特點”。

到了1964年，廣島原子彈爆炸業已成為日本戰時受難以及后世和平主義思潮的主要象征。奧運會開幕式上點燃奧運火炬的正是出生于原子彈爆炸當天的一名廣島青年，這樣一來可以表達出日本的和平意愿，二來或許還可以反映出日本的苦難歷程，當中夾雜著一絲自憐。圣火點亮時，日本自衛隊的戰機飛越東京上空，懷著由衷的和平暢想，在空中畫出奧運五環的形狀。

憑借友好的姿態和高效的組織，日本人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他們無論做什么事都力求萬無一失。日本人同時也是獎牌大戶，摘得十六枚金牌，僅次于美國和蘇聯。日本人很看重體育比賽的成績，有時或許執著得過了頭。兩位日本運動員——分別是馬拉松選手圓谷幸吉和女欄健將依田郁子——因為辜負了國民的期待，后來相繼自殺。可憐的圓谷在跑進體育場時還排在第二位，但就在即將沖線前被一名英國選手超過了。這一幕令在場的東道主觀眾目瞪口呆。蒙受奇恥大辱的圓谷最后雖摘得銅牌，但并未起到多少安慰作用。

日本人素來很在意自己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對他們而言，競技場上的勝利可以撫慰戰敗的記憶。20世紀50年代期間，一位名叫力道山的彪形大漢在摔跤場上連連取勝，多少安撫了日本人受傷的自尊心。力道山的比賽似乎總有規律可循。面對身材高大、往往大打出手且通常來自西方的對手，剛上來幾個回合，力道山總處于下風，但逐漸地，在心中富士山的激勵下，這位日本好漢會爆發出一腔義憤，雖體格較小，但最終會以弱制強，戰勝大一號的金發家伙。

不過，提到力道山，有幾件事不能不說。首先，他的原籍其實是朝鮮，官方對此刻意保密，但并非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其次，職業摔跤盡管別開生面，但缺少了諸如相撲、劍道和柔道等傳統搏擊術的那份神韻。再次，舉辦奧運會這一年力道山已不在人世，在此一年前，他在東京一家夜總會被一名暴力團成員刺殺身亡。是時候讓日本人用更傳統的姿態施展他們的氣力了。于是，日本奧組委動用手中的特權，新增了柔道這一奧運比賽項目。

撇開日本人有望在本土項目中爭金奪銀這一點，選擇柔道還有一大好處：能體現以柔克剛。柔道講究的不是體型大小或肌肉力量，它的內涵要豐富得多，甚至有幾分精神力量的意味。要想打敗對手，得靠耐心、迅速的反應和絕不輕舉妄動，因此，小個子用巧勁可以戰勝比他壯得多的對手。不同于摔跤或拳擊，柔道所需要的精神力量可是習慣了粗蠻打斗的西方人萬萬不可能具備的。換言之，柔道能體現出日本文化和日本氣概的優越性。

為了強調這一點，日本人除傳統的重量級、中量級和輕量級分組外，還設置了一個無差別組。無論體格大小，任何挑戰者均可參賽。日本方面，這塊金牌的有力爭奪者是神永昭夫，他是個技藝超群的冠軍選手，有著日本人當中少見的魁梧身材，不過跟身高6.6英尺、體重267磅 [†](#_3)  的巨人荷蘭冠軍安東·吉辛克（Anton Geesink）一比，就相形見絀了。即便如此，神永也贏定了。這一戰的價值，足以抵得上力道山在職業摔跤場上戰勝金發“低等人”一百次的戰績。

比賽定于10月23日，奧運會落幕當天。多達一萬七千名觀眾涌入東京市中心的日本武道館，想要一睹神永為日本奧運會獻上的壓軸大禮。在日本的各個城鎮和鄉村，人們聚攏在商店櫥窗周圍，通過電視觀看比賽。誰都不想錯過這場好戲。數以百萬計的人走上街頭，支持神永。他寬闊的肩膀現在要扛起整個日本的榮耀。當天連國會都休會了。有著拳拳愛國心的社長們確保在自家公司每層樓都擺上一臺電視機。人們給報社寄去贊美神永的小詩。就連天皇都會親自觀賽。

起初的十分鐘里，日本人和荷蘭人難分高下。神永攻而吉辛克守。兩人都緊盯對方腳下，試圖預判下一步動作，仿佛在用身體對弈。忽然，吉辛克向前猛撲，體型巨大的他居然出奇地敏捷，一把將神永按倒在榻榻米上，并死死壓住后者。日本冠軍拼命掙扎，試圖抓住對手，他強健的小腿一遍遍拍打著榻榻米，就像一條魚在做垂死掙扎。終于，裁判宣布時間到了，吉辛克勝。

起初現場一片死寂，接著響起啜泣聲。巨大的羞恥感讓人幾乎難以招架。日本人的陽剛氣概再一次面臨西方優越力量的考驗，并再一次被證明成色不足。但隨后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吉辛克獲勝后不久，一干荷蘭擁躉本想沖入場內恭賀他們的英雄，吉辛克卻立即抬手制止了他們，然后轉向神永畢恭畢敬地鞠了一躬。日本觀眾紛紛起身，對這一尊重對手的傳統姿態報以掌聲。這一幕他們永遠也無法忘懷。在東京，吉辛克這位魁偉的荷蘭勝利者向日本人展示出剛柔并濟的威力。自打那時起，他在日本人心里成了永遠的英雄。

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過分自信、狂熱心理、深深的自卑感以及時而執念于民族地位的想法——所有這些因素對日本現代史都產生過影響，但相較于其他品質，有一種最令其受用：那就是雖敗猶榮時的那份優雅。

注釋

\* 　丹下健三（1913——2005），日本著名建筑師，曾獲得普利茲克建筑獎，東京奧運會主會場就是他的杰作。——本書注釋除特殊注明外均為譯注

[†](#_1) 　轉換為公制后，身高為198厘米，體重121公斤。

# 第一章　黑船來襲

1853年7月8日，綽號“老馬特”的馬休·卡爾布萊斯·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準將率四艘全副武裝的軍艦駛入江戶灣。他此行的使命是逼迫日本對美國艦船開放港口。彼時的佩里認為日本人是一群愚民，他這么想也情有可原。日本同他國斷絕往來，已經大約有兩百年了。日本統治者一方面忌憚外部勢力入侵，另一方面又擔心傳教士散播的基督教信仰會讓臣民變得難以管束，于是取締了這一教派。除了將大部分外國人和所有神甫驅逐出境外，還禁止日本人出國。膽敢違令者格殺勿論，且死法一般都極其慘烈，沒有人敢以身試法。雖然同中國和朝鮮仍有通商往來，但自17世紀30年代以來，日本國內的西方人僅剩下一小撥百無聊賴的荷蘭商人，他們被禁足在長崎市近海的一座人工小島上。

“黑船事件”是近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較量之一。一方是佩里及其麾下四艘“邪惡黑船”，它們停靠在日本岸邊，鳴響火炮，隆隆的炮聲傳遞著不祥的訊號。另一方是日本人，站在岸邊一字排開，手握刀劍和老式火銃。佩里準將堅持只同日本政府的最高代表打交道，卻吃不準此人是誰。天皇雖高高在上，但仍是沒有實權的虛君，至于他和將軍之間的區別，佩里更是一頭霧水。身居京都這一昔日帝都的天皇象征著日本的文化延續性，承擔禮儀和精神上的職責；而作為武士大統領的將軍則坐鎮江戶，也就是今天的東京，主持朝政。自1603年起，歷代將軍均出自德川一族，他們的政府也因此得名“德川幕府”，亦稱“江戶幕府”。

對此一概不知的佩里卻堅持要將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Millard Fillmore） [\*](#_9)  要求日本開埠的信件直接呈給天皇。但即便這封信交到后者手中，也只會令他不知所措。

由于日本的通事只懂荷蘭語這一門歐洲語言，與他們的溝通進行得很艱難。17世紀，葡萄牙傳教士被逐出日本后，更關心賺錢而不是傳播信仰的荷蘭商人成了唯一獲準駐留日本的外國人。盡管日本官員對美國人的堅船利炮充滿了好奇心，也很樂意在佩里的旗艦上品飲兌了糖水的白蘭地，但他們奉命讓這些“花旗洋鬼”走人。他們堅稱，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只有長崎。然而，對其火炮威力信心滿滿的佩里不肯讓步。官方指派的美國翻譯、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對日語只了解個皮毛，他在日記里寫道，“志在四方的揚基民族”前來“打破了（日本）麻木不仁和長期以來的蒙昧狀態”。

就在日本人商量對策期間，他們靠虛與委蛇和其他拖延戰術鎮住了飛揚跋扈的佩里。終于，在經過深思熟慮后，佩里被允許上岸。接著，雙方開始比試誰的排場更大。佩里大步流星，兩側是他最高大的黑人保鏢；日本人則身穿上好的綢布服裝。雙方互贈禮物：美國人得到的是華美的錦緞、瓷碗、鍍漆盒子、折扇等工藝精湛的寶貝；而日本人得到的是一臺電報機和一節迷你小火車。日本人叫來了相撲大力士，還邀請佩里在他們肚子上打兩拳。酒敬了一輪又一輪，某位日本官員在灌下大量威士忌和香檳后，摟著佩里說道：“日本美利堅，兩國一心。”日本男人在喝醉后贊美國際友誼時都是這副德行。

冷靜的傳教士衛三畏指出，這真是“東西方之間的一次奇妙融合”，“鐵路和電報、拳師和受過教育的運動員……削了發的禿頂和睡衣；手持火銃的士兵隊列緊湊，進行操練；圍著襯裙、穿著木屐、佩戴兩把劍的士兵，所有人都亂哄哄的，跟烏合之眾一樣——所有這樣或那樣的事物，均凸顯出我們的文明和習俗同這個與世隔絕的異教徒民族之間的差別”。日本人贈送的禮物很明顯說明他們是“部分開化”的，而美國人的禮物則體現了“科學和更高等文明的進取心所獲得的勝利”。

二十年后，許多日本人會秉持相同的看法，似乎“普世”的西方給一個深陷中世紀混沌的國度帶來了一線光明。

佩里準將或許打心眼里相信他的使命就是教化劣等人，但是無論是此次訪日，還是1854年再度訪日，他的當務之急都是擴大美國在日貿易權益。他麾下戰艦甲板上的六十一門火炮和日本形同虛設的海防（多數炮臺都是障眼法，再說日本當時也沒有海軍）最終令江戶幕府認識到，與其發動一場以卵擊石的戰爭，不如委曲求全。自此，美國艦船獲準駛入兩個指定的日本港口，裝載煤和其他補給。這些東西美國人會花錢購買，算是建立貿易關系的第一步。

在美國人看來，這一切頗得他們的心意，而佩里也會因為迫使日本“開國”而名留青史。在他的一生中，這份殊榮總是被掛在嘴邊，逢人必吹噓一番。的確，佩里的黑船以及其他出沒在該地區的西方艦船觸發了日本朝野的一場政治危機，終結了這個國家閉關鎖國的狀態。江戶幕府的獨裁統治維系了兩百余年，但與西方優勢力量的對峙暴露出了它不堪一擊的一面。無獨有偶，二戰期間，日軍也將歐洲帝國的外強中干展現得一覽無余。圍繞如何應對危機方為上策一事，日本人產生了嚴重的分歧。部分少數派呼吁放外國人進來，打開國門，對外通商；其他人則贊成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把番夷逐之門外。越來越多心懷不滿的地方武士和知識分子預謀推翻不得人心的幕府，建立一個欣欣向榮的國家，并扶植天皇（以及他們自己）站上權力舞臺的中心。與之相對的是一群魯莽的好戰之徒，妄圖剪除任何反對將軍的勢力。造成這番動蕩并非佩里一個人的“功勞”，但他的做法無疑激化了局勢。

然而，佩里認為日本人乃井底之蛙的想法實則大謬不然。在他抵達江戶灣之際，日本精英對美國的了解要勝過美國人對日本的了解。盡管相對閉塞，但日本人比起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大多數亞洲人還是更了解西方。他們在英美政治、西方科學、醫學、歷史和地理方面的知識著實令人嘆服。他們手頭掌握著詳細的美國地圖，也知曉美國的政治制度。17世紀時，西方科學便已東漸，流入日本。日本人還做過有關俄國軍事、英國經濟等多方面的研究。不過，鑒于后來的歷史進程，日本人從上述研究中得出的結論要比研究本身更為重要。

\*\*\*\*\*

人們常認為，基督教在日本從未獲得過發展壯大的機會，但實際上早在16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傳教士在勸說日本人入教一事上便成績斐然，特別是精英階層中皈依者甚眾。這使得將軍及其謀士深深忌憚這一西方信仰。1638年，日本基督徒慘遭屠戮，外國傳教士被驅逐出境，所有被認為有基督教色彩的書籍一概遭到取締，利瑪竇撰寫的科學類書籍也赫然在列。更奇怪的是，就連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和西塞羅的《論友誼》也被視為禁書。但西學并未因此偃旗息鼓。17世紀初，當局對所謂的基督教宣傳品的封殺，以及旅居長崎的荷蘭商人，共同促成了“蘭學”的濫觴，也就是“荷蘭研究”。以這門新型學問為業的人統稱為“蘭學者”，意即研究荷蘭的人。

公眾對荷蘭人的印象是一群番邦異獸，小解時會像狗那樣抬起腿，他們一頭紅毛，眼珠子藍得跟鬼畜一樣。不過，沒過多久，長崎官方指派的通事便發現西醫效果顯著，而相形之下，中醫則不那么管用。這些人說是通事，其實還身兼坐探一職。在沒有辭典、不諳語法的情況下，他們學會了荷蘭語，這絕對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除此之外，長崎和江戶的部分醫生還勤奮地鉆研歐洲醫學。官方對與荷蘭有關的事物也饒有興致。每年，荷蘭商人都會被傳喚至江戶，接受將軍及其隨從的連番提問。為了給后者助興，荷蘭人還被要求唱歌、跳舞、互相親吻，活脫脫地被當成了馬戲團動物。

1720年，對歐洲事務發自內心感興趣的幕府將軍德川吉宗放松了對西方書籍的禁令。吉宗有著異乎尋常的寬廣胸襟，但他同中國帝王一樣，是個心系稼穡殷盛的傳統主政者。當時正值城市工商業萌芽和鄉村暴動頻發的時期，為防止出現更多農民起義，吉宗致力于改善農民的生活。由于節氣對于農耕至關重要，將軍便重視起歷法來。在聽人進諫說歐洲歷制比中國歷制更精確后，他決意弘揚“蘭學”，并表示：“紅毛國的人，做事往往靠心理演算，講究合情合理；他們只會使用看得見摸得著的器物；要是某事不確定的話，他們不會言之鑿鑿，也不會拿來用……”

吉宗對“蘭學”感興趣，更多是出于實際需要，而非哲學思辨。盡管如此，他的態度同中國皇帝還是大相徑庭。在后者的構想中，天朝大國居于天下中心。吉宗的繼任者并非個個同他一樣有著旺盛的好奇心和豁達的心胸，此外，蘭學始終處于一種危險的境地，尤其在19世紀初，那時幕府正絞殺異端學說。無論大多數蘭學者多么愛國，多么保守，只要他們過度醉心于西洋事物，身上總隱隱籠罩著一層賣國嫌疑。官方以及多數學者的立場是，盡管西方科學在有效治理日本一事上可以成為一件有力工具，但是萬萬不可讓普通人接觸到外國思想，生怕人們會“找不著北”，忘了聽統治者的話。

德川幕府奉行的意識形態是新儒家，這是儒家思想中特別保守的一脈，創始者是12世紀中國哲學家朱熹。朱熹強調自然秩序的重要性，而這一點經日本人詮釋，成了對權威的絕對服從。儒家士大夫的職責是解釋典籍，確保人們加以遵守。他們好比教士，有權闡釋上天的法條。19世紀著名自由派教育家福澤諭吉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一傳統的局限性：“在吾國，學問意味著統治者的學問，僅僅是治國術的一個分支。”不少儒生——日語里稱“儒者”——兼具教師和中醫的身份，西學與他們奉為圭臬的部分信條格格不入，對其地位構成了直接的威脅。因此，他們樂見西學倡導者遭到打壓。

同洋教師過從甚密或許會以悲劇收場。長崎的荷蘭貿易使團里有個十分博學的人，名叫菲利普·弗朗茨·馮·西鮑魯特（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是個內科醫生，有德國血統，為人少言寡語。癡迷于收藏日本物件的馮·西鮑魯特帳下有不少敬重他的日本弟子。1826年，在前往江戶途中，他同高橋景保交換了禮物。高橋是出色的翻譯和天文學家，是荷蘭人口中的“格勞比烏斯”（Globius）。“格勞比烏斯”送給馮·西鮑魯特一份日本地圖，自己則獲贈一幅世界航海圖。消息一經走漏，馮·西鮑魯特就因間諜罪被捕，繼而被驅逐出境，而“格勞比烏斯”于三年后死在獄中，死因或為自殺。

另一位倒霉的學者是青年吉田松陰，他無比渴望見識西方世界，央求佩里讓他上船，帶他回美國。佩里拒絕了他。吉田因擅自登上美艦被囚禁于牢籠內。他的老師佐久間象山也因為慫恿學生出國游學身陷囹圄。佐久間曾基于自己的西學功底，發展出一套理論，探討防范外夷入侵的最佳對策。他發表過《省侃錄》這部名作。出獄后，因為給坐騎安了西式馬鞍，佐久間死在了狂熱的反西方分子手中。

彼時鉆研西學是要冒風險的。然而，多數蘭學家很難算是逆黨，哪怕是那些呼吁以妥協退讓來應對佩里掀起的風波的人，也一樣不是亂臣賊子。許多人或行事謹慎，唯恐被卷入政治，或對此不屑一顧。總之，他們幾乎清一色都是赤忱的愛國者，雖對中國中心論的蒙昧主義傾向頗有微詞，卻仍篤信新儒家的那套君臣之道。同馮·西鮑魯特交換禮物的“格勞比烏斯”因涉嫌賣國死在獄中，但也同樣是他，曾于1825年建言政府將所有外國船只驅離日本海岸。要是有人能將18、19世紀（乃至20世紀）的日本思想家分為兩派，一派是進步的、信奉自由主義和追求民主的西化論者，另一派是反動的、倡導本土論的威權主義者，這固然很好，可問題是這種區分過去不存在，如今也不成立。積極鼓吹通商和懷柔的人士——他們中有不少蘭學家——同時也宣稱，有朝一日，待日本“師夷長技以制夷”后，國家就能再度回退到安穩的鎖國狀態了。

\*\*\*\*\*

即便鉆研“蘭學”的人自己渾然不覺，他們的學識對削弱儒教國家的哲學合法性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日本人從中國那里借鑒了一套基于天下原則的治國理念：人類社會的自然秩序要以天下自然秩序為依據，一位仁君務必確保二者之間的和合共生。儒家倫理被認為符合自然原則，“蘭學”則引入了一種截然相反的世界觀。要是能對自然原則進行理性分析，而支撐儒教國家的天下觀念又可以被證偽的話，那會對其政治合法性構成嚴重的挑戰。

總而言之，西方科學在中國造成的震蕩要甚于日本，因為其顯示出中國并非天下的中心。為了避免可能爆發的倫理革命，中國人采取了將中式倫理同西方科學一分為二的做法，就仿佛歐洲思想無關乎倫理。19世紀末曾流行這樣一句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可實際上，這在中國根本行不通。西學不可能在不遭到嚴重歪曲的前提下被剝離到簡單的器物層面，而舊有的中國中心論原則也很難同科學探索相調和。因此19世紀以降的中國思想家往往會在立場上呈現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從先前沉郁的保守主義思想倒向激烈的偶像破壞論：要么就捍衛中國傳統——管它應是何種面目——使其免受哪怕一丁點兒外國勢力的玷污，要么就打著“賽先生”的旗幟，把傳統砸個稀巴爛。現代中國的歷史就是這兩種情況的寫照。

對于西方思想，日本人有著相似的對策，卻不像中國那般疾風驟雨，或者就算是疾風驟雨，表現形式也不盡相同。日本的知識分子同樣采取了“舉西方科學，存日本精華”這一保全顏面的策略，結果一樣碰壁。然而，日本具備一大優勢，即文化邊緣性。過去視中國為智慧中心的日本思想家可以輕而易舉地轉尋其他效仿對象。重要的是，鮮有日本人會幻想地球圍繞日本轉，他們或許會認為日本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是一片得神護佑的土地，但與之爭奪神明眷顧的國度還有很多。他們還明白，日本的政治制度乃至其立足的原則都是源自中國的舶來品，一旦舊秩序運轉不靈，想再師從他國也不會面臨什么阻力。

日本與中國的另一大區別在于權力分割。在中國，世俗和政治權力集中在朝廷手里。德川時期的日本，將軍以鐵腕統御全國，天皇的角色則更近似教皇，經過他的加冕，世俗統治者才被賦予了合法性。這種安排后來有所異化，原因是與天皇同屬一朝的將軍也開始顯露出一些帝王相。不過，分權有一大好處：可以起來造政府的反。而要是打著效忠天皇的旗號、且無叛國之嫌時，就更是如此。換成中國，這絕非易事。

西方影響常常是日本劇變的催化劑，但絕不是幕府體制開始顯露頹勢的唯一誘因。早在17世紀，以大阪為主的一些沿海城市就已形成一個日益富裕且成熟的商人階層。他們買賣日用品，訂立自由契約，從事奇貨可居的投機生意。商人在官方的尊卑體系中要比農民和匠人低一等，但當他們富起來的同時，名義上處在等級制頂端的武士往往變得無用武之地，到了18、19世紀愈發窮困潦倒。天下太平了，職業武士還有何用？武士的數量太多，沒法安排所有人進入官府工作，經商則又顯屈尊。三百年后風靡西方的那些記錄武士信條和俠義精神的浪漫文字其實反映了他們無所事事的狀態。旨在重武抑商的尊卑體系已經跟不上經濟發展的腳步。此外，閉關鎖國的國策也阻滯了日本的技術進步。

19世紀40年代，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慘敗的消息傳至日本，引起一片嘩然，因為這不僅說明中國已十分落后，同時也折射出日本自身的脆弱性。但實際上，許多日本人很早以前就已抱有這樣的疑慮。1644年，滿族滅明后不久，國勢便一落千丈。差不多在胸襟寬廣的德川吉宗大力倡導蘭學的同時，日本國內還興起了一股復興文化傳統的熱潮。信奉本土論的學者在日本詩歌、神道教之萬物有靈論和天皇崇拜中尋找日本優越性的證據（他們確實找到了）。甚至有人表示日本應取代中國，成為真正的中央帝國——至少他們心里是這樣想的。跟日本皇室的純凈血脈一對比，中國叛亂頻仍、朝代更迭的政局就相形見絀了。日本文學表達含蓄溫婉，漢學則被認為過于冰冷和理性。就連日本的親華派也開始挑戰“新儒家思想象征自然秩序”這一命題。而經由“蘭學”引進的地理學則清晰地表明中國并非天下中心。

\*\*\*\*\*

時至今日，日本國內的本土論者依然有一種惱人的習慣，他們研究外國思想的目的是為了印證日本民族獨一無二的優越性。神道教復興論者牢牢抓住哥白尼的天文學說，以此證明日本人一直以來都是正確的。地球當然是圍繞太陽轉，那么天照大神，即太陽女神，難道不是日本人的神圣祖先么？日本不是從誕生之初就面朝太陽么？無疑，這種說法在佛教徒和信奉中國中心論的保守派看來不啻為歪理邪說，但同時也恰恰點明了西方思想之所以令本土論者心潮澎湃的原因：其有助于將日本從中華文化圈里解放出來。

更耐人尋味的是一些本土論者對基督教的態度。18世紀末19世紀初，本土學派的重鎮設在水戶一座別致庭院里的書院（保存至今）。位于江戶東北的水戶長期以來就是學問之都，佩里準將造訪日本時，水戶藩藩主態度強硬，反對向外國人作出任何妥協。他鼓吹“尊皇攘夷”的口號。在他的支持下，所謂的水戶學派專事日本獨特性的理論研究。該學派領軍人物之一的會澤正志齋曾在1825年發表著名的《新論》。會澤宣稱，基督教是邪教，西方蠻夷則是一群“野豬餓狼”，他們在日本一靠岸，就應被剿殺殆盡。

可會澤同其他水戶學派人士又都是勤勉的蘭學者。會澤總結道，歐洲國家之所以強盛——這點他一上來就予以肯定——要歸功于西方信仰。他認為，作為國教的基督教令歐洲臣民自然地歸順統治者，一神論可以促成國家統一，“政”“教”應當合一。這樣說來，日本需要的是屬于自己的國教，由天皇擔任大祭司。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就應該將神道教這一遠古的日本信仰由眾神崇拜的自然宗教改造成一門將所有日本人都置于天皇蔭庇之下的全民信仰。神圣祖先天照大神將接受人們的頂禮膜拜，地位堪比基督教里的上帝。令人扼腕的是，政教合一后來成為日本現代民族主義思想的奠基石之一，借的是古代傳統的力，但效仿對象依然是歐洲。

西學學者和水戶本土論者都或明確或隱晦地挑戰了中國中心論式的舊秩序，因而兩派人的立場實際上是一致的。不管是蘭學者，還是本土論者，都不歡迎佩里艦隊這群不速之客，有許多人是徹頭徹尾的排外論者。不過，他們承認西方思想的力量，也愿意加深了解，為的是能使日本有朝一日躋身強國之林。撇開圍繞遠古文獻、皇室血脈純潔性和祖先神祇的那套玄奧話語，從許多方面來看，本土論者和西方人一樣現代，盡管西方到了他們這里通常會變得面目全非。此外，他們還將西方世界最壞、最無情的一些東西學了去，并仿而效之。

其中之一便是殖民主義。18世紀末有一位杰出的蘭學者，名叫本多利明，是一位貧寒武士之子。本多在仰慕者口中被喚作“日本的本杰明·富蘭克林”，這位日本的“富蘭克林”和水戶派交游甚密，說真的，他的一些想法放在當時來看可謂十分進步。他嘗言，政府建立的前提是民眾許可，因為“當違背民意而以武力統治國家時，許多人會發自內心地反對強制脅迫，并成為作奸犯科之徒”。他還贊成游歷海外，以開闊日本人的眼界。本多將國家的大部分問題歸咎于對科學的無知以及卑躬屈膝地因襲中國已然不得人心的做法，他甚至還提議棄用漢字。根據對英國的研究，他總結道，一個面積狹小的海洋國家需與外界通商。他相信，日本有四大亟需：火藥、金屬、航運和殖民。

本多認為，沒有殖民帝國，一個國家便無法成就一番偉業。他對日本殖民帝國的構想同其政治思想一樣，既進步，也無情，這一點同他崇尚的楷模英國的殖民方針高度吻合。為了攫取日本致富所需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可以對被殖民國家的原住民進行剝削，也可以砍伐森林。參考日本其后在東南亞的所作所為，這一主張在當時可謂極具“先見之明”。本多對好的殖民統治的看法也領先于同時代人：“父親般的統治者有責任引導并教化原住民，好讓他們每個人都不會庸庸碌碌地混日子。”

這樣說來，佩里的翻譯、善良的衛三畏牧師根本就沒有參透這些日本“原住民”。他們完全不像他認為的那樣麻木不仁和愚昧無知。日本人心里的主意多得很，其中不少觀念早在衛三畏抵日很久之前就已從西方東漸。問題是，在舊秩序的大廈將傾、一個嶄新而現代的國家成型之際，到底哪些觀念是行得通的。縱然學者的思想對后世存在影響，但他們并非締造歷史的主體。直到20世紀20年代，本多的學說才完全為世人所理解，他的聲望也達到了生前難以企及的高度。不過，那些推翻幕府統治的人除了受到思想的鼓舞外，切身利益也是他們行動的原動力。他們當中一部分人是排外論者，一部分是樸素自由論者，還有一部分則兼具雙重身份。

倘若說即將到來的這個百年是以排外、威權主義和戰爭為標志的話，通往開放、民主局面的道路也并未完全被堵死。1837年前后，所有滲透進日語的外來語當中有個荷蘭語詞匯，叫vrijheit（經由荷蘭人撰寫的一部拿破侖傳記引入），意為自由。至少有一位日本通事對此念念不忘。他很清楚大聲說出這個詞會招致危險，因此一直郁郁寡歡。據當時一位見證者所言，他只能靠飲酒來解悶，但“喝醉后，又免不了高喊‘Vrijheit！’”。

也許衛三畏認為日本人“部分開化”的看法還不至于錯得那么離譜，這一評價對世間所有人都通用。無論身處哪個時代，開化的那一半人總會做一番掙扎。只可惜，在日本，掙扎總會以失敗告終。

\*\*\*\*\*

1853年至1868年這一時期，也就是自佩里的黑船來襲到幕府統治的滅亡，史稱“幕末”。“幕末”這個詞除了隱含“世紀末”（fin de siècle）的輕佻、浪蕩意味外，還呈現出一種黑暗而暴虐的面貌。這一點起先在劇情邪惡的歌舞伎作品中被描繪得淋漓盡致，很久之后又在不計其數的武俠片里得到了體現。“幕末”臨近尾聲之際，日本社會波詭云譎，動蕩不安，陰謀四起，殺機四伏，兵燹不斷，政變頻繁。來自西南的藩主們同德川幕府的忠臣明爭暗斗，最終導致內戰爆發。這一時期，人們狂躁不安，各種“末法”思想 [†](#_10)  層出不窮。暴民嘯聚江戶在內的大城市，高舉神道教畫像，去神社拜祭，在大街上衣不蔽體地翩翩起舞，甚至在眾目睽睽之下行交媾之事。他們打劫富戶，邊打劫還邊像走火入魔的教徒似的大喊：“這樣不好嗎？這樣不好嗎？我們想干嘛就干嘛！”同20世紀30年代和70年代初的情況一樣，19世紀60年代涌現出一批年輕的極端主義者，視暴力為民族救贖之道。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或許與日本社會在太平時期受到的嚴密管控有關。

佩里的到來使得“尊皇攘夷”這句口號成了“倒幕”的一紙戰斗宣言。江戶幕府不僅越來越無力維持時局，還被指責是外敵來犯的禍首。人們既畏懼變革，又反抗傳統。革命黨既是偶像破壞者，亦是反動勢力。年輕的極端主義者往往出身于低級藩士家庭，在舊社會里迷失了自我，于是通過一系列暗殺行為來表現他們排外、尊皇和救國的抱負。這為之后的一個世紀樹立了標桿。1858年，一位幕府高官 [‡](#_11)  與美國簽署條約，賦予美國人在日通商和居留的特權。他曉得自己無從選擇。兩年后，這位官員在位于江戶的將軍府外遇襲身亡。一伙來自水戶的武士把他從坐轎里揪了出來，當場砍掉了他的腦袋。雖然兇手自認為官員該殺，但怎么說這也是以下犯上。于是，殺手按照武士的慣例，切腹自裁，以死謝罪。

另一位險些得手的刺客是個來自土佐地區（位于日本西南的四國島）的青年，名叫坂本龍馬。他是許多小說、劇本、電視劇和電影的主人公，常被稱為日本的“加里波的”（Garibaldi） [§](#SS_1)  ：一頭亂發，放蕩不羈，腰掛佩刀。這番打扮在二戰后比在戰前的專制時期更受人推崇。坂本從政之初是個嗜殺的狂徒，后來獲得政治啟蒙，這一轉變過程折射出同時代人身上共有的幽暗魅力、急智和對不同政治可能性的開放心態。

一想到自己要過那種束手束腳的地方武士生活，坂本便心生厭倦。他退了學，離家出走，告別領主，上了一所劍術學校。滿腦子都是水戶學派那套民族純潔和外夷險惡之說的坂本動身前去刺殺賣國賊。他自認為找到了完美的目標：人稱“麟太郎”的勝海舟 [¶](#P_1)  。后者是幕府的海軍專家和知名蘭學家，曾在長崎同荷蘭海軍專家共事過一段時間，也作為1859年日本首批派駐美國的公使團成員，親眼見證了美利堅國力的強大。他總結道，日本要想維持其獨立國家地位，唯一的機會便是打開國門。在坂本這種狂熱的年輕武士眼里，勝海舟此舉不啻為懦夫行徑和賣國求榮。

據傳當時經過如下：勝海舟在面對前來索命的青年時，鎮定自若地說道：“你是來殺我的吧？要是的話，應該先等我把話說完再動手。”這之后，事情出人意料地來了個大轉折，但這種轉折時而又很符合日本主人公那種魯莽的性格特點。勝海舟辯稱自己和坂本一樣愛國，他唯一的目標就是讓日本變強大，趕走外夷的最好辦法是先學會他們的全部技藝，因此他才提倡門戶開放，一開始妥協退讓。據傳，坂本扔掉了手中的劍，跪倒在地，為自己的“心胸狹隘”賠罪，并懇請勝海舟收他為徒。也許當初情形果真如此。

坂本在勝海舟身邊侍奉了數年，后來在長州、薩摩和土佐之間斡旋，促成了它們的結盟。這三個藩是西南幾股反幕府勢力的中堅力量。薩摩位于九州南部，長州在本州西陲。16、17世紀之交，日本陷入內戰，這三個藩的領主吃了敗仗，因此一直被排除在德川幕府的核心權力圈之外。薩摩和長州的藩主打算同江戶幕府開戰，但坂本主張議和，并敦促其盟友說服將軍退位。坂本提議，日本應由一個地方大名組成的議事院共同治理，德川將軍在其中仍有發言權，但不再擔任大統領。1867年，末代將軍同意了坂本的提議，但薩摩和長州的武士此時已喪失耐心，唯有一件事能滿足他們，那就是幕府的倒臺。

坂本把新的活動地點設在長崎，他在那里研習西方政治體制，并對歐洲國家的憲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盡管沒讀過幾年書，坂本想必聰慧異常，因為早在1867年時，他就已設想出后幕府時期一幅高度詳備的政府架構藍圖：政治權力必須被交還到天皇手中，但一切政府決策的通過須以兩大立法機構，即上下議事院的“全體人員意見為依據”。憲法的起草也勢在必行；在物色高官人選一事上，則采取任賢選能的原則，不再看重等級或出身。（有必要記住的是，像坂本這樣地位卑微的武士總被要求對上級卑躬屈膝，不管是在本藩還是外藩。）后來，坂本在另一份文件里詳細說明了如何遴選賢能以及選舉委員會所發揮的作用。對于開展外事，他的意見是“要遵循全體意見通過的恰當規范”。

鑒于坂本自身的背景以及此類政治模式在日本史上尚屬首創這一事實，這份文件的意義不容低估。一年后，其中大段行文被寫入明治維新的《五條御誓文》 [\*\*](#_12)  ，正式宣告幕府統治的終結。明治，顧名思義就是“開明之治”，被用作天皇的新年號。過不了多久，“明治”二字便會成為令人瞠目結舌的現代化進程的代名詞，引得那些仍然生活在西方殖民統治下的亞洲人紛紛投來敬畏的目光。

這是一則振奮人心的故事，講述了一個社會如何經由進步思想洗禮，從封建主義和軍事專制邁向自由和啟蒙。可惜事情遠沒有這么簡單。毋庸贅言，政治自由主義的種子已經撒下，但其生長進程從一開始便受到其他力量的阻遏，將日本推往另一個方向。一旦天皇和他的廷臣為某個政治目的所用——利用他們的是反抗幕府的叛黨，以薩摩和長州這兩個藩為主——一種現代化的專制主義便應運而生了。

\*\*\*\*\*

幾個世紀以來，身居京都的天皇象征著日本文化與道德的守護人。對于其政治授信，將軍根本不當回事，甚至都懶得與之見上一面，遑論共商國是。到了19世紀50年代末，情況則大為不同。反抗幕府的強硬派人士慫恿孝明天皇反對同美國簽訂協議，但天皇本不應對這類事發表意見。即便反對幕府的叛黨并不真的希望看到天皇直接行使政治權力，也已拉開了天皇制走向政治化的序幕。

這一進程最終以災難收場，其結果早在新憲法制定之初的幾部草案里就可見端倪。1867年，在同薩摩和土佐方面的代表會晤過后，坂本龍馬等制憲者擬了一部草案，其中包含下述條文：“國無二君，家無二主，政刑 [††](#_13)  歸于一君乃自然之理。”話雖如此，這番措辭還是給建立世俗政府留有一定余地。天皇依然可以只充當名義上的統治者，將執政之事托付給文官組成的政府。但實際情況似乎是“復古神道”學派的口號“祭政一致”——即祭祀和政事統一——正在成為一種政治現實。

幕府統治的終結并不像坂本料想的那樣是個和平的過程。1868——1869年間，擁護幕府的臣子和天皇的軍隊之間爆發了內戰。擁幕派來自東北的幾個藩，倒幕派則來自西南。戰事進行得很慘烈，那些不幸身處交戰雙方中間地帶的平民只能任憑武士對他們百般欺凌。幕府的最后一道防線設在會津這座水戶西北的城邑。三萬天皇大軍兵臨城下，用最新式的西方火炮轟擊會津藩藩主的堡壘。在苦苦支撐逾兩周后，這座城池被大火吞噬。許許多多擁幕派年輕武士在絕望中切腹自盡。堡壘被攻破了。會津藩藩主損失了三千多名手下，他本有兩萬多人馬，剩余的散兵游勇面對追兵，一路逃亡至北方的苦寒之地，死于饑饉者無數。

天皇遷都江戶，并更名為東京，這也是近千年來天皇首次與政府機關同處一座都城。東京市中心建起了名為“靖國”的神社，以緬懷為天皇捐軀的英靈。他們的牌位被供奉在神社內。在后世一系列對外戰爭中，數以百萬計的日本人也將魂歸此地。那些效忠幕府的人士則下場凄涼，無人為他們建祠立碑。時至今日，靖國神社依舊能激起人們強烈的抵觸心理，反對者不僅有日本過去在亞洲的敵人，還包括日本國內的基督徒和自由派。

不幸的是，坂本沒能活著看到幕府走向覆滅的這一天，亦未能等到他為之嘔心瀝血的明治維新成為事實。幕府統治的最后幾年里，京都成了一片亂世，遍地都是陰謀家、刺客和行走江湖的劍士，人人都在蠢蠢欲動。1867年冬，坂本藏身于一位販醬油的友人家中。他知道幕府的人在追殺他，但自覺無人身安全之虞，于是差保鏢出門買吃的。一個陌生人敲響了商人家的門，說要找坂本龍馬。坂本的家仆剛想轉身去稟告樓上的主人，來客便闖進屋內，身邊還跟著兩名劍客，他們拔刀向坂本的頭部、身體和四肢砍去。這些刺客是“新選組”的成員，該組織的宗旨是殺光所有與將軍為敵的人。事畢，他們走了，留下了倒在血泊中的日本制憲第一人。

注釋

[\*](#_4) 　米勒德·菲爾莫爾（1800——1874），美國第十三任總統，任內（1850——1853）開啟了美日關系史上重要一步。——編注

[†](#_5) 　原書作millenarian cults，但在日本幕末時期，并非帶基督教色彩的千禧年主義信仰，而是末法思想，一種佛教末世論。末法是佛教用語，指正法絕滅，佛法衰頹之時代。——編注

[‡](#_6) 　指井伊直弼（1815——1860），彥根藩藩主和江戶幕府大老。其暗殺事件被稱為“櫻田門外之變”。——編注

[§](#SS) 　意大利民族獨立先驅。

[¶](#P) 　勝海舟（1823——1899）是幕臣中開明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幕府海軍的創始人。

[\*\*](#_7) 　《五條御誓文》，是日本明治天皇于慶應四年陰歷三月十四日（1868年4月6日）發表的誓文。

[††](#_8) 　即行政和司法權。——編注

# 第二章　文明開化

據傳，2月11日是日本神話里首位天皇建立皇權的日子，日本特意選在1889年的這一天紀念其“名正言順”地躋身強國之林。一個煥然一新、與封建時代徹底決裂的日本將擁有屬于自己的第一部憲法，落實“文明開化”這一明治時期的主要口號。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口號，略晚些流傳開來，這個口號便是“富國強兵”。不過這還是后話。說到天皇，他像神賜禮物一樣將憲法施予臣民。圍繞這一重大事件而舉行的儀式隆重而盛大，十分符合明治日本那種奇特的文化矛盾心理。

一大早，明治天皇（外國人多以其名“睦仁”稱呼）便穿上古制朝服，遁入東京皇宮的神社內室中，向列祖列宗稟告了新憲法的事。他解釋道，這份文件符合“文明進步”的精神，旋即話鋒一轉，勸諸位先皇不要擔心，說新憲法定會維系皇權的世代傳承。還不光是維系，明治維新——抑或是明治維新的政治宣傳——的意義就在于，它“復辟”了遠古形態的日本皇權。

明治天皇的臣民此時還對皇恩浩蕩的陛下賜給他們的新憲法的內容渾然不知，但就算是參加了隨后舉辦的慶典的人，也一樣被蒙在鼓里。慶典于當天晚些時候進行，天皇身邊有一位德國顧問，專門負責就宮廷禮儀的“移風易俗”出主意。慶典便采納他的方案，取歐式風格。正如當時某幅浮世繪所示，天皇的覲見室為仿維多利亞風格，歐式和日式圖案隨處可見，譬如金色的流蘇、紅色的軟絨、精致的鍍金燭臺，數量多得讓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已換上一套歐式元帥服的天皇端坐在金燦燦的普魯士風格的御座上，身后是皇家徽章，腳下鋪著長長的紅地毯。皇后緊挨夫君而坐，身穿一件極不相稱的粉色晚禮服。她一般不拋頭露面，此次登場，再度證明日本已接受文明開化的新風尚。天皇手下的大臣和留著連鬢胡子的士紳或身穿雙排紐禮服，或一身戎裝，腰板挺得筆直，顯得不太自然。在畫家筆下，他們被安上了一雙與實際不相符的大長腿。天皇一側是他的外交團隊，以贊許的目光看著眼前這一切，好似觀摩學校話劇社表演的家長。隨侍人員中還有伊藤博文，他是日本樞密院議長，也是新憲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伊藤崇拜俾斯麥，舉手投足間有幾分神似“鐵血宰相”，包括后者手持雪茄的儀態。（二戰后擔任首相的吉田茂也會以此方式表達對丘吉爾的敬意。）

有件事給這一喜慶場合蒙上了污點：改革派文部大臣 [\*](#_20)  森有禮遇刺身亡。他對西方文明的優越性篤信不疑，以至于提倡日本人和歐洲人通婚，“是為提高日本國力之上策”。排外勢力長期以來就對森有禮的西化做派恨之入骨。制憲日當天，一位來自長州的原藩士刺死了森有禮，原因是他在參拜伊勢神宮這一神道教至尊圣地時表現得不夠恭敬。盡管森有禮會因為喜歡說教被載入史冊，但殺害他的年輕人一樣青史留名，理由是他的愛國精神“至真至誠”。

繼1868年政府許諾出臺憲法以來，日本人總算有了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憲法。十年來，舉國上下的人都對新憲法的性質和可能的內容議論紛紛。民權和自然權利活動家發表倡議，撰寫草案。同坂本龍馬一樣，植木枝盛也是來自土佐的原藩士，他寫了一首歌，鼓吹主權在民，其中幾句歌詞激情澎湃：

讓我們為憲法而奮斗！

為盡早實現民選議會而奮斗！

前進！前進！吾國的人民，

讓我們推動自由和民權！

然而，實際頒布的憲法卻言辭模糊，且完全將國家主權置于天皇手中。恰如日本名仕穿戴的禮服和高帽，以及東京市中心建起的某些現代紅磚樓，憲法披著光鮮亮麗的西式外衣。立憲者借鑒了普魯士憲法，為的就是讓西方世界刮目相看：瞧瞧，日本如今也是現代化民族國家，那些賦予美國人和歐洲人在日特權——譬如治外法權——的不平等條約總算可以壽終正寢了。過去幾個世紀以來，日本一直向某個外國京畿看齊，這一舊戲碼如今再度上演，只是情況有變：巴黎、倫敦、柏林和華盛頓取代了中華帝國歷朝古都的地位。

明治憲法的確授權國會籌備選舉，首屆選舉的日期定在憲法頒布后次年，但是政黨無從干涉政府大臣的人選任命。只有一小部分人——多是富裕的地主——享有投票權。伊藤博文在同僚中算得上是思想開明的，但他對此事的看法卻與其偶像俾斯麥別無二致，即人民主權十分危險。他表示：“鑒于皇權是我國憲法的基石，我們的體制就不能以一些歐洲國家通行的‘君臣共治’觀念為出發點。”

伊藤等寡頭大多出身薩摩和長州兩藩，1868年維新之后，他們花了不少時間周游列國，為日本挑選合適的政治思想。一行人前往歐洲和美國，研究英美模式，并滿懷感情地造訪了荷蘭這個日本“最久遠的朋友”。盡管對美利堅的國力贊嘆不已，也感念于美方給予的禮遇，但美式民主令他們惶恐不安：看著實在是太混亂了。因此，在聽到旅德日本僑民說還有區別于英美、更適合日本國情的政治模式時，伊藤等人長舒了一口氣。不過，并非人人都傾向于師從德國。明治維新著名先驅之一大隈重信就更推崇英國式的憲政思想，但這條路很快就被同僚堵死了。大隈本人也險些死于暗殺，刺客和殺害森有禮的兇手是一路人，都是那種一片“赤膽忠心”的狂徒。

由此說來，以明治憲法的定義來看，日本民主從一開始便如“病孩兒”。德國和古代日本的專制思想構成了新憲法的靈魂。但從長遠看來，最大的隱患還是來自法條的模糊性。天皇雖被賦予絕對統治權，但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大統領，也不是類似歐洲君主那種獨裁者。按理說，天皇不應直接參政；他的理想角色是凌駕于世事之外，委托一群官僚精英以其名義制定決策。與此同時，日本武裝力量效忠的卻是天皇，而非文官政府。這就造成了一種垂簾聽政的政治生態，躲在幕后的人基本上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行使大權，個體無需為其行為承擔最終責任。

事情是否可以是另外一番局面？日本人難道就非得認準一個既不像德國又不像古代日本的專制體制么？存不存在建立民主制度的機會？機會還是有的，但是鑒于推翻幕府的那群人的背景，機會永遠都成不了現實。

明治維新的一眾英雄，諸如伊藤博文、西鄉隆盛、山縣有朋、大久保利通和木戶孝允，均來自長州或薩摩。他們深諳忠誠、服從和軍紀所構建的武士信條。西鄉隆盛是維新時期最具浪漫色彩的人物之一，他身材高大，驍勇善戰，還因為一對碩大的睪丸聲名遠播。西鄉想在薩摩建立一個武士國家。一系列現代化改革——尤以取消武士地位世襲制為主——令許多武士感到被時代拋棄，胸懷憤懣，西鄉便成了他們心目中的英雄。1877年，他率部起義，反抗中央政府，掀起一陣血雨腥風。從表面上來看，薩摩藩起事的動機是西鄉認為日本對朝鮮的政策過于軟弱，但實際上他另有所圖。盡管許多改革措施根本談不上民主，但對于千千萬萬習慣于封建體制的人而言，依舊是過于激進了。西南戰爭的爆發是日本人對“反動”起義者素來抱有好感的一大明證。西鄉的一片赤膽忠心從未遭人質疑。同他那些思想較為開明的同志相比，后人至今仍認為西鄉更加偉岸，更富英雄氣概。

明治早期歷史的驚人之處并不在于薩摩和長州藩主認為人民主權不對他們的脾性，而在于數量眾多的日本人的看法恰恰相反。天皇于1868年頒布的《五條御誓文》中曾經承諾會創建“議事會”，且“所有事宜均通過公眾商討決定”。來自昔日土佐藩的權貴追隨坂本龍馬，在諸如塞繆爾·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的著作《自助論》（Self-Help）等勵志文學的鼓舞下，成群集黨，鼓吹代議制政治。由于這些土佐藩藩士被排除在薩摩和長州兩地領導人把控的中央政府之外，他們的這種做法相當符合自身利益——他們想為自己代言。

從某種角度來看，明治初期日本的政治改革并未跟上經濟改革的步伐。不僅如此，伊藤博文等人相信，政治改革力度過大的話，會顛覆漸進式的經濟政策。19世紀70年代的日本已經踏上通往現代市場經濟的道路：法律廢除了階層等級之分，農民能夠擁有土地，財產可自由買賣，一些壟斷也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企業制度。雖說是自由企業，實則從未脫離國家干預。正如明治口號所言，維新的目的不僅要“富國”，還要“強兵”，這就意味著政府要扶持增強軍力所需的戰略行業。早在幕府將軍統治末期，日本人在歐洲專家的幫助下，就已著手建造蒸汽輪和加農炮。日本首座鑄鐵廠誕生于1857年，但直到19世紀80年代，財政上捉襟見肘的政府將官營紡織廠、鐵路、水泥廠等產業變賣給私營企業主后，日本才迎來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波工業繁榮。也就是說，日本的工業革命要晚于英國，但也只比德國略落后幾年。由于起初只有一小部分人有膽量涉足現代企業，日本工業財富的半壁江山便集中在幾家公司手里，它們很快成長為巨大的工業聯合體，亦稱“財閥”。舉例而言，三井在江戶時期還只是一家織品店，后來發展壯大為集銀行、貿易公司、煤礦、化工廠等諸多產業于一體的巨型康采恩。另一家知名財閥三菱剛開始只是一家規模很小的輪船公司，到了20世紀30年代，卻已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商業“巨無霸”之一。它們的發展模式如今在日本已耳熟能詳。官僚、政客和商界領袖編織起一張綿密的關系網，他們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不是靠鼓勵大企業放開手腳在市場上競爭，而是通過制定戰略方針，提供政府補助，以及簽訂互惠互利的密室交易。明治日本有的是小霍雷肖·阿爾杰 [†](#_21)  筆下的人物。鄉下小子背井離鄉、在大城市出人頭地是明治時期小說家最青睞的主題。不同于美國的是，個人財富在日本得為國家需要讓路。正如俾斯麥治下的德國，經濟同政治一樣，都是民族主義事業的一部分。

由此可見，經濟上，明治日本已逐漸成為一個現代國家，但政府依然只是一小撮來自西南的昔日武士的專屬領地，大久保利通、山縣有朋、伊藤博文等人因此得名“寡頭”。他們精明強干、精力充沛，某些方面聰慧過人，但死死守住權力不容他人染指的做法也確保了民主自誕生之初便會遭到扼殺。

不過寡頭統治并非沒有對手。最早想要將經濟自由轉化為政治自由的人士中有一位來自土佐的知識分子，名叫板垣退助。同大隈重信這位較為開明的明治時期領袖一樣，板垣也是一起未遂刺殺行動的目標。1882年，他在參加公眾集會時遭一名狂熱警官槍擊，就在倒地之際，據傳他還喊出了那句聞名遐邇的口號：“板垣可以死，但自由永不亡！”事實上，板垣撿回了一條命，而他所推崇的自由權利就沒那么幸運了。

板垣等所謂民權運動的領導人認為，主權不應立足于“君權神授”——這不啻為對帝制的當頭棒喝。他們時常會搬出自然法的概念，盧梭、穆勒、斯賓塞、邊沁和托克維爾的作品在這些早期民權活動家當中被廣為閱讀。一些志同道合者組成的小團體后來轉正為“自由黨”。大隈等親英派人士則組建了一個與之對立的黨派“憲政黨”。然而，撇開他們對歐洲理論的興趣，板垣等活動家從內心深處來看依然是武士，他們從不認為普羅大眾應該直接參政。西方也從來不缺少為上述觀點背書的人。尤利塞斯·辛普森·格蘭特（Ulysses S.Grant） [‡](#_22)  曾高調造訪東京，他就建言日本政府，稱過度自由會令其國民難以消受。而另一位民權活動家心目中的英雄、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早年曾主張人們有權反抗政府壓迫，到頭來卻認為只有絕對王權才適合日本人。

實際上，不少人曾嘗試投身政治。由于日本國內外盛行日本人“隨大流”“缺乏主見”“順從成性”，因而不熱衷政治的觀點，這就使得那股曾幾何時席卷日本城鄉、不分階層的議政熱潮顯得格外耐人尋味。除了連農民也可以建黨結社外，明治日本的另一大特色是各種叛亂層出不窮，矛頭多對準地方長官和地主，而非中央政府。問題的癥結在于專制統治，我們不用讀約翰·斯圖爾特·穆勒或亞當·斯密的作品，也對專制統治深惡痛絕。至少有一起事例可以說明農民反抗過帝制本身。縱然私有物權是明治改革的核心宗旨之一，政府卻決定將長野縣農民的土地收歸國有，改造為皇家林場。農民為此抵抗了二十五年，他們以法律為武器，據理力爭，并于1905年拿到了部分賠償。他們是幸運的，沒有因為煽動叛亂而鋃鐺入獄。

某起最著名的暴動發生在1884年，策源地位于東京西北的秩父郡山區內。“秩父暴動”的根源照例是壓在農民身上的苛捐雜稅，而政府政策失當起碼要為之承擔一定責任。在將業余辯護士、自由黨的一些干部、義憤填膺的教書匠和個別地痞煽動家推舉為代表后，農民建立了“困民黨”。他們向官府和郡役所提交請愿書，同債主協商延緩債務償還，卻一次次招致警方的野蠻鎮壓，終于忍無可忍，手持刀劍、火銃和竹槍，同政府軍激戰了整整十天，最后無疑還是敗下陣來。三百人被囚禁，七人遭處決。

這些暴動令兩大“自由”黨派的領導人惶恐不已，繼而迅速與自己眼中的“大膽刁民”劃清界限。然而這一旗幟鮮明的表態無濟于事。由于不斷遭受來自政府的滋擾，這兩大黨勢力日衰，人心消沉，并于1884年解散。后雖經歷復興，但聲勢已大不如前，且改頭換面，成了企業利益的吹鼓手：自由黨為三井財閥說話，憲政黨則代表三菱株式會社。

\*\*\*\*\*

“文明開化”這句口號向來是文化意味重于政治意味，強調的是氣度和外在。然而在日本，外在偏偏又舉足輕重。明治時期流傳過這樣一句嘲諷式民諺：“敲敲短發蓬松的天靈蓋，文明開化的聲音響起來。”似乎某人梳著歐式發型便是其出身顯貴的象征。部分明治領導人發自內心地認為，要是打扮成歐洲人的模樣，就能說服西方列強放棄不平等條約。

明治時期的啟蒙開化運動，既有幾分裝腔作勢，又讓人肅然起敬，同時也不乏荒誕色彩。即便是出于為現代化過程披上一層本土論外衣的考慮而去創造、復蘇一些遠古或近古風俗，人們也在有意識地排斥和湮滅不久前的一段歷史。倘若這段歷史在西方人眼里顯得輕浮佻薄、下里巴人的話，這種意識便分外強烈。舉例而言，歌舞伎曾是低俗淫樂區里一道鮮活的風景線，經過改造后，已無傷風化，成了一門越來越死氣沉沉的經典傳統。1872年，歌舞伎大家九代目市川團十郎在東京為新劇院揭牌時，沒有像過去那樣身著華麗和服，而是一套燕尾服，配以白領結。他在演講中指出：“近年來戲劇作品污穢不堪，散發著粗鄙和下作的氣息……對此我深感悲哀，在和同事商量過后，我決心清腐去朽。”

歌舞伎原本沾上了江戶末年煙柳巷的臭氣，就在為其“除臭”的同時，西方戲劇被引入日本，以達到熏陶城市精英的目的。這一領域的先行者之一是川上音二郎，他做過警察，為人激進。1901年，川上帶著妻子貞奴在歐美巡回演出。貞奴本是藝伎，據傳做過伊藤博文的小老婆。夫婦倆向如癡如醉的西方觀眾呈現了并不原汁原味的歌舞伎，回頭又向如癡如醉的日本觀眾呈現了同樣不正宗的西方戲劇。有一幕令人記憶猶新：東京的劇院里，飾演哈姆雷特的川上把自行車騎上了舞臺。在觀眾眼中，哈姆雷特和自行車一樣，都是新奇、現代的洋玩意兒，因此川上此舉并無任何不妥。

明治時期的另一大怪現象是民間饕餮食肉之風漸盛，這一舉打破了佛教食齋的戒律。彼時的佛教正處于低谷，維新后的最初幾年里，神道教狂熱教徒四處打砸佛教廟宇，意圖滌清日本殘存的傳統中國文化勢力。追本溯源，吃肉的風尚始于福澤諭吉這位明治時期最偉大的知識分子之一。他曾宣稱肉食可以強壯日本人的體魄。很快，吃肉就因為其“開民智”的功效而大行其道。

一個世紀之后，小說家三島由紀夫在談到明治時期的那股假正經之風時，依舊是氣不打一處來。針對在公共場合裸體和男女混浴等“粗鄙下作”、叫人難堪的行為制定禁令，背后動機主要是生怕外國人的責難，倒不是國人自己變含蓄了。三島將明治日本比作“就像因準備接待客人而焦慮的家庭主婦，將普通日用品藏入柜中，脫下平素穿的便裝，希望整潔無瑕、一塵不染的理想化家庭生活能讓客人開開眼界”。

這么說略微有些夸大其詞，多數日本人的行為舉止并不像舞臺上的歐洲人，而且就算是上流社會人士，也只是在公開場合如此為之。不過話說回來，他們還是挺樂在其中的。歐化的惺惺作態發展到高潮時，“文明開化”之風蔚為大觀，其典型便是在鹿鳴館舉行的大型舞會。鹿鳴館的主人是井上馨，他舉辦舞會的目的是慶賀1885年天皇生日。《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um）的作者法國人皮埃爾·洛蒂（Pierre Loti）是眾舞客之一。他的觀后感雖顯傲慢，但恐怕十分準確。鹿鳴館的設計出自英國建筑師之手，糅合了維多利亞式、法蘭西帝國式和意大利文藝復興式等幾種風格。洛蒂形容鹿鳴館的外觀像法國鄉下的溫泉療養院。在他看來，身著燕尾服的日本士紳活像表演雜耍的猴子；而女眷則穿著肥大的荷邊鯨骨裙，綢緞裙擺拖在地上；她們倚墻而立，好似色彩斑斕的掛毯。好吧，這還挺“別開生面”的。日本人竭力模仿歐洲人的一顰一笑，男賓們抽著哈瓦那雪茄，玩惠斯特牌；其他人則小口小口品食著宴會桌上堆積如山的松露、果醬和冰激凌雪葩。這邊廂法國管弦樂隊演奏起歌劇小品，那邊廂德國樂隊就奏響波爾卡、瑪祖卡和華爾茲舞曲。洛蒂寫道：“那些個一身華服的日本人啊，跳起舞來倒是中規中矩的。但能感覺得到，舞步像是強行灌入他們腦子里，所以動起來如同自動人偶般，沒有一點兒自主性。要是碰巧沒踩準拍子，就得打斷他們，從頭再來。”

我們很容易和洛蒂一樣對這一切啞然失笑，但須知舉辦舞會的初衷是很嚴肅的。井上馨在友人伊藤博文的內閣里擔任外務卿 [§](#SS_3)  ，他倆希望迅速實現西化，好讓日本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繼而使后者同意放棄不平等條約下享有的特權。而要在外貌上變成現代人——換言之，就是變得西化——最好的辦法莫過于盡可能接觸真正的西方，于是便有了鹿鳴館。這將是東西方在最高層面上交融雜處的場所，聯結二者的紐帶是惠斯特牌和馬祖卡舞曲。而在批評者看來，伊藤當局不啻為“跳舞內閣”。

當局面逐漸明朗，即西方外交官和文人很樂意前來參加舞會，但并未因為井上馨的熱情好客而萌生修改不平等條約的意愿后，這位外務卿頭上的光環便黯淡了下來。他的政策聲名掃地，到了1889年，鹿鳴館被轉賣給一家私人俱樂部。此時，一場針對西化的全面抵制行動已經展開。可憐鹿鳴館，今已無處可尋。

\*\*\*\*\*

西化并不只有光鮮外表和政治算計這層內容。一些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深入吸收了西方思想，本可以將日本推向一個更加開明自由的方向。福澤諭吉的一生象征著明治文化最可愛的那一面，盡管他也無法免于流俗，沾染上了一些自命不凡的習氣。用他自己的話來講，福澤諭吉的身份是“成為西學東漸的執牛耳者”。為此，他在東京創辦了一家書院，也就是后來慶應義塾的前身。他介紹西方世界風土人情的著作十分暢銷，以至于此類題材的出版物得名“福澤系列叢書”。本著儒學大師的風范，福澤諭吉試圖在生活和著述中給后人樹立道德典范。然而，不同于多數儒學學者，他心中的典范是個體主義式的，是那種具有批判眼光、獨立于權力之外的思想家形象。福澤諭吉是日本最早出現的獨立知識分子之一，這類人至今仍是稀罕物。他的懷疑論思想與新儒家傳統格格不入，具有鮮明的反專制特征。他很清楚遭人暗殺“這一令人不悅的可能性”始終存在，也很幸運地躲開了堂弟 [¶](#P_3)  的暗算，后者是個容易激動但無疑赤膽忠心的水戶學派門生。

出生于1835年的福澤諭吉是低級藩士之子，通過“蘭學”接觸到西學。然而，他驚訝地發現，19世紀60年代期間來到日本的那些洋人對荷蘭語居然一竅不通，遂改學英語，跟著外交使團出訪歐美，并著手“打開我們這個‘閉關鎖國’的國家的國門”。他常對同胞失望不已，特別是他們見風使舵的習性，就跟“橡皮玩偶”一樣，總是急于巴結權貴。但他從未停止為思想自由“鼓與呼”。1874年，福澤諭吉同森有禮等啟蒙知識分子一道，創建了名為“明六社”的學術團體，以鼓勵自由公開辯論。他們的觀點發表在一份同名刊物上。這些人并非反政府活動家，相反，大多數人都有公職。可好景不長，這種早期的公開政治辯論實踐并未持續多久。1875年通過的《讒謗律》和《新聞紙條例》極大地鉗制了言論自由，無奈之下，“明六社”的成員決定停刊。四年后，另一部新法出臺，規定公務員、教師、軍人、農民和學生不得參加任何形式的政治集會，違者法辦，這就使得“明六社”難以為繼。自此，不斷有日本知識分子從公共事務中抽離出來。于是同諸多德國同行一樣，日本知識界不問國事，要么潛心學術研究，要么自我陶冶情操。

心灰意冷的福澤諭吉眼看著許諾的自由化為泡影，卻決定不予公開抨擊。他在自傳里寫道：“通盤考慮當下情勢后，還是在私文里抱怨抱怨罷了。”友人勸他發聲，福澤答道：“你我都已是不惑之年，應切記這點，莫要去傷害他人。”后世的日本知識分子秉持的也是這種態度，到了19世紀70年代，知識分子精神已死，除了某些引人矚目的個案外，直到1945年后這種精神才完全復蘇。

\*\*\*\*\*

縱觀福澤諭吉的人生篇章，最奇異、情感上最濃墨重彩的一頁出現在他對1895年甲午戰爭的欣喜反應上。中日沖突的根源是爭奪對朝鮮的控制權。歷史上朝鮮曾依附于中國，但后來分裂為兩派，一派親華，一派親日。親日派首領在上海遇刺一事成了戰爭的導火索。然而，這不僅僅是一場地緣戰爭，還是兩國軍事現代化的一場較量。誰擁有最新式的武器、最高效的軍隊和最先進的戰術，誰就會贏得戰爭。盡管日本在艦船數量和部隊人數上處于劣勢，但他們才是勝利者。日本戰勝中國的消息讓福澤諭吉喜出望外，他“甚至難掩興奮之情，跳了起來”。事實上，他有此反應不足為奇。“文明開化”的一個維度就包含對其他亞洲人落后之處的蔑視。福澤諭吉認為漢學已然成為日本社會的一大毒瘤。在他看來，要“入歐”就必先“脫亞”。如果說日本過去是中華文化圈一份子的話，那么如今它應該成為文明西方的一部分。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勝利顯示出該國已取得長足“進步”，這不愧為高等文明的一大標志。描繪這場戰爭的浮世繪作品無一例外地將日本軍人塑造成身材高大、皮膚白皙的英雄人物，而對手中國人則是一群猥瑣、膽怯、留辮子的亞洲人，似乎日本人突然換了種，變得跟歐洲人種更接近了。

大多數日本人對這場戰爭都抱有和福澤諭吉相似的愛國主義情懷。能滅一滅中國的威風，意味著日本已躋身強國之林，此外還讓日本人有了全新的國家統一觀。天皇已隨內閣遷至廣島的戰爭大本營，這也印證了福澤的話：“政府和人民精誠合作。”報紙對戰爭英雄的事跡大加宣傳，比如白神源次郎這位傳奇號手，被子彈擊穿肺部后依然堅持吹響沖鋒號。當時的流行歌曲有諸如“炸藥之歌”和“支那人”等歌名。

旅居日本的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嘗言：“新日本真正的誕生之日，始于戰勝中國之時。”人們覺得，這下全世界——其實特指西方世界——肯定會對日本刮目相看。一位著名記者寫道：“我們不再因為自己是日本人而在世人面前自慚形穢。”這反映出“文明開化”的陰暗面，即認為殖民征服是強盛和現代化的終極標志。明治時代的另一大口號“富國強兵”便由此而來。

盡管不是大多數人，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明治時代人士繼承了諸如本多利明等江戶知識分子的思想衣缽。本多堅信，任何大國不可不建帝國。甲午戰爭的根源是朝鮮的主導權，但戰爭目的遠不止此。盡管忙于“跳舞外交”，外務卿井上馨仍迫切地想在尚未被西方列強占領的亞洲地區建立一個日本帝國。作為亞洲現代化的鼻祖，日本人開始改造落后的朝鮮人；侵占臺灣后，又誓將這個戰利品打造成文明開化殖民主義的典范。借另一位有著狂熱愛國心的日本記者之言，日本終將在“這場偉大而光榮的事業”中與西方列強平分秋色。而那些無法在舞廳和華麗館舍內通過文化模仿而獲得的，就只能依靠鐵與血來實現了。日本如今已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大國，就在日軍擊潰清軍前夕，與西方簽訂的各項不平等條約就此作廢。而既然日本已經證明自己的軍力，它就有了將類似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中國的資本。當年從佩里那里學來的一課最終結出了黑色的果實。

\*\*\*\*\*

國家統一、為民族存亡而進行的達爾文式抗爭、種族活力，這些均是19世紀的主旋律。寰宇之內，新國家相繼成立，全新的國族認同應運而生。圍繞這些話題，各國內部爆發了激烈且具有鮮明國別性的辯論。法國反動勢力依舊渴望復辟舊制度（ancien régime），但是共和制的“國族觀”已經在法蘭西的土壤里生根發芽。決定公民身份的是政治權利，而非族群或信仰。英國公民身份之獲得也如出一轍，只不過有別于前者，女王陛下的臣民效忠的是一個捍衛共同信仰的王權。直到1871年——也就是明治維新過去僅僅三年后——才實現統一的德國在定義“國族觀”時卻碰到了難題。許多日耳曼人生活在國境線之外，而國境線以內的德意志邦國還希望保留各自的身份認同。同明治時期的日本一樣，德皇威廉治下的德國必須打破采邑割據的封建舊體制，形成中央集權國家。一個德國人之所以認為自己是德國人，靠的是文化和族群凝聚力，而非政治因素；毋寧說，靠的是德國文化（Kultur）、音樂、詩歌和種族，而非公民身份。只要你講德語，有德國血統，那么你就是德國人。由于德國的政治體制脆弱不堪，且1848年那場革命仍歷歷在目，俾斯麥和普魯士王公貴戚對黨派政治戒心甚重。在他們看來，黨派政治家都是“自私鬼”，而自由派則是潛在的賣國賊。在普魯士皇帝的統治下，國家統一有賴于軍事紀律，有賴于鼓吹民族精髓和德意志精神的文化宣傳。強大的國力，一靠鋼鐵鑄就，二靠鮮血澆灌。

盡管內部存在異議，明治寡頭還是選擇走德國道路。這部分是緣于寡頭的武士出身。對這些藩閥而言，政治自由主義或共和思想都是異端。他們清楚一部憲法和表面上的政治代議制是現代國家不可或缺的“門面”，但也力圖解決一個如今依舊困擾許多伊斯蘭國家的難題：既想邁向現代，又不愿冷落傳統。這一點通過將德國信條嫁接在日本神話之上得到了實現。寡頭們信奉軍事紀律、神秘君主專制思想和鼓吹民族精髓的“鮮血加國土”的政治宣傳。在國家新秩序的構建者當中，論影響力，最大的還不是伊藤博文，哪怕他儀態神似俾斯麥，也不是井上馨這位翩翩舞者，而是伊藤的老戰友山縣有朋。山縣認為，有兩件事對民族存亡至關重要，一是武備，二是教育。他所崇尚的那種教育以培養忠誠、紀律和服從為己任，旨在湮滅“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思想。

山縣大將生于1838年 [\*\*](#_23)  ，和伊藤一樣是長州藩人，父親是底層武士。他同伊藤還有一個共同點：也曾師從吉田松陰這位曾懇請佩里帶他去美國的狂熱民族主義者。但是，與為人和藹的伊藤不同，山縣總是一臉嚴肅，不茍言笑，把紀律看得比什么都重。出身行伍的他在19世紀80年代擔任內務大臣，90年代又兩次擔任首相，為日本的制度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說到軍人官僚，山縣便是典型，后世還會不斷涌現出類似的人物。

但若因此視山縣為反動派，實乃大謬不然。他并不留戀江戶幕府那段歲月，相反，他對日本轉型成為現代化大國持歡迎態度。山縣也不反對借鑒西方思想，同老師吉田松陰一樣，他也渴望以別國為師，并在維新后一年里周游歐洲，甚至還聘請德國法學家起草日本法律。可是，對于開放國門、接受新興事物影響的后果，山縣向來心知肚明。接觸新觀念很容易讓人民感到“惶惑”，并催生他們的叛逆心理。日本不能容許西方影響削弱傳統價值觀。山縣任內務大臣期間恰逢民權運動煽動大眾起事作亂。他因此要求伊藤——后者于19世紀80年代初任首相——制定更為嚴苛的法律“對付政黨”，不然的話，“維護我們帝國獨立自主的目標”便無從談起。

山縣得償所愿，限制性的律法的確束縛住了政黨政治，但是他最重要的一筆遺產乃是奠定了帝國軍隊的根基。在一個攜帶武器屬于武人特權的國度推行義務兵役制，這一安排可謂具有革命性的意義。曾幾何時，日本人中間只有武士才有資格佩劍（且有資格行切腹之儀），而且他們效忠的對象是各個藩的大名，并非中央政府。因此，許多原藩士會抵制這一激進的革新舉措便不足為奇。但山縣不這么想，他在這方面崇尚革故鼎新。自1873年起，所有身體健全的日本男子必須在軍中服役三年，在預備役服役四年，而這也是他們當中多數人對西化的最初體驗。身著西式軍裝、住西式兵營、學習西方軍事科技，這些不算，不少人還學會了讀書寫字。至于讀什么，多半是民族主義宣傳。對于明治日本的多數青年而言，接觸現代性的渠道不是福澤諭吉的慶應義塾，也不是追求自由言論的社團，而是軍隊。

盡管現代技術和西方作派逐漸為上百萬日本人所熟知，舊的武士道德觀依然在明治社會各階層大行其道。這是一項有意為之的政策。在山縣等志同道合的軍人看來，義務兵組成的部隊不僅是抵御外敵入侵的中堅力量，還是團結國民的最佳渠道。國民一心則袍澤一心，國民教育即軍事教育。武士律條被推向全國。一身戎裝的天皇四處巡幸，盡忠勇、尊君王成了最高形式的愛國主義精神。

1882年，天皇頒布《軍人敕諭》，起草者是山縣有朋。這是近代日本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文件之一，明確了每一名日本陸海軍軍人的職責，并要求他們對之爛熟于胸。他們絕對效忠的對象唯有天皇一人：“朕是爾等軍人的大元帥，朕賴爾等為股肱，爾等仰朕為頭首，其親特深。”天皇的軍人要做到不問政治，不質疑政令，甚至連私下表達看法也不行。山縣這么做的目的是實現軍政分離，使軍人超脫于俗世，唯一能左右其意志的只有天皇圣諭。他認為如此一來便可避免嘩變。半個世紀后，這一設計的內在缺陷將大白于天下，因為其實際效果往往同設想的情況截然相反。如果當兵的以服從神圣天皇為唯一天職的話，那么違抗那些被認為逆天皇旨意而行的文官領導人，就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了。1936年，滿懷一腔法西斯“熱血”的年輕軍官為了體現自己“盡忠盡節”，四處殺害內閣大臣時，心里就是這么想的。

天皇崇拜乃山縣提出的新秩序支柱之一，它被形容為一項源遠流長的義務，與日本人的精神氣質密不可分，象征日本文化的精髓，最早可追溯至神道教諸神誕生之初。實際上，天皇崇拜和威廉德國創造的哥特信仰一樣名不副實。如同德國浪漫的中世紀精神，它必定要從過去汲取養分，可是濫觴于明治時期的天皇崇拜實際上與山縣有朋的義務兵役制一樣是新興事物。日本人過去從未視天皇為最高神明，對其頂禮膜拜。直到江戶末期，天皇一直身居京都，寄情于詩畫文墨，充當日本風俗和道德的精神守護者。神道教既不是國教，也不是偶像崇拜，而是一門集萬物有靈儀式和季節性祭祀于一體的松散信仰，以大自然、豐饒土地和孕育日本的諸神為歌頌對象。可到了明治年間，神道教逐漸向國家神道靠攏，變得面目全非。山縣等明治藩閥為文化和宗教覆上了一層政治色彩，與此同時“閹割”了世俗政治制度。盡管日本有憲法，但其立國根基并不仰賴政治權利，而取決于對天皇制度的宗教崇拜以及通過國家神道灌輸的日本起源論。

1890年頒布的《教育敕語》——當時山縣仍任首相——告誡日本人應順服于天皇及其神圣祖先。該文稱，臣民克忠克孝，此乃我“國體之精華”，也是“教育之淵源”。這不啻為對福澤諭吉等人所推崇的西化路線一記當頭棒喝。保守派堅信，西化進程已走得太遠，危及到了帝國的道德根基。

這一觀念其實具有濃厚的儒家色彩。盡管日本人大張旗鼓地擯除來自中國的影響，滿嘴盡是些“深邃日本性”的玄奧話語，但是官方的思維方式依舊帶有新儒家的深刻烙印。通過道德說教和強制思想同化來起到控制廣大民眾的目的，從根源上來看，就是中國式的做法。憲法也許賦予了日本人宗教自由，但實際上人們鮮有發表異議的空間，因為“權力就是真理”的格局依舊如故。除了佛教徒外，日本的基督徒也結結實實遭受了本土論宣傳的戕害。起初他們還見容于社會，最知名的一批明治知識分子當中有不少都是基督徒。但《教育敕語》頒布后，他們的日子越來越難過，因為你不能同時膜拜兩個神。明治時期，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表示，日本基督徒要是想被納入國家道統的話，就必須鏟除基督教，主權在日本只能掌握在一位“民族之父”手里。

天皇陛下同時還是軍隊首領，這一安排本身就同日本傳統相距十萬八千里。不僅如此，他貴為“民族之父”這一點——乃至“國族”觀念——都讓人聯想起近代德國的族群民族主義論，此外還摻雜了19世紀中葉水戶學派的本土論主張。鑒于此，若認為山縣有朋對“文明開化”的威權式反擊斬斷了現代性或西化進程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他也從西方有所借鑒，只不過借鑒的東西具有高度反自由的特點。這種教育制度下培養出來的日本人和福澤諭吉心目中的理想國民形象相去甚遠。日本的軍政走進軍營，也走進學校，它一心培養的是訓練有素且根本不具備自我思考能力的隨大流者，而不是崇尚懷疑論的個人主義者。

\*\*\*\*\*

明治軍國主義發展到鼎盛的產物是殘酷的日俄戰爭。1904年，日軍以類似后來發動珍珠港事件的方式，偷襲俄國艦隊，由此拉開了戰爭的序幕。這時候的日本人心里依舊憤憤不平，因為西方列強逼迫他們將1895年甲午戰爭后獲得的部分戰利品拱手送人，這其中包括滿洲 [††](#_24)  境內的遼東半島南部，原本計劃割讓給日本，后被轉租給俄國。西方列強那時正在瓜分中國：德國占領山東；法國盤踞廣東；英國則在沿海設立一系列通商口岸；美國也在亞太地區擴張其帝國版圖；俄國拿到了修建滿洲鐵路 [‡‡](#_25)  的特權，并向朝鮮北部滲透。日本視朝鮮為其地盤，因此有充分理由認為自己遭到了排擠。

唯一讓日本人感到些許慰藉的是1902年簽訂的《英日同盟條約》。盡管日本人言必稱德國，但德皇威廉二世壓根瞧不起日本人，還常告誡沙皇要提防“黃禍”。俄國人對日本人想要重新分割東北亞利益的要求置之不理，于是日本海軍在東鄉平八郎大將的帶領下先發制人，先是攻擊旅順港，接著在對馬海峽大敗俄軍。自此，強大的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幾乎全軍覆沒。同四十年后的美國人一樣，俄國人被打了個措手不及。他們沒預料到日本人敢于向一個西方大國率先發難。這樣的事前所未聞，至少在成吉思汗西征后便再無他例。不過也有唱反調的，英國媒體就對“勇敢的小日本”不吝溢美之詞。

戰事開啟一年來，成千上萬的日本人和俄國人在有史以來最為血腥的那些戰斗中魂斷沙場。日俄戰爭可以算得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某種預先彩排。甲午戰爭中勇敢的司號員和五彩斑斕的戰旗已經不見了蹤影，這一回，兩個大國的軍隊在鐵絲網后的戰壕里互相廝殺。為了在浸透雨水而泥濘的戰場上推進區區幾碼，數以千計的士兵前赴后繼，不是踩進雷區，就是倒在機槍火力之下。在旅順口，乃木希典大將的軍隊共傷亡五萬八千人，戰死者中還包括他的兒子。但是乃木這座明治愛國主義精神的豐碑卻聲稱兒子的死只會讓他倍感家門榮幸。在奉天之戰中，俄國和日本的戰損比為八萬五千對七萬。付出了如此慘重的代價后，日本人總算獲得了滿洲鐵路的特權以及遼東半島的租約。一些外國人作為觀察員直擊了這場慘烈的戰爭，其中有一位名叫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的年輕美軍中尉。

雖然打了勝仗，但東京民眾的情緒遠沒有1895年甲午戰爭勝利時來得那么高漲，或許是因為這一仗死了太多的人。戰爭歌曲一點也不激昂，而是充滿傷感。要不是遠在紐約的猶太銀行家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對俄國的排猶暴行義憤填膺，下決心對日本施以援手的話，日本就要破產了。被俘的俄國官兵向日軍介紹了一些反猶作品，大談“錫安長老會”（Elders of Zion）如何具有通天的本事。而希夫拯救日本于水火也令日本人對這種說法信以為真。很明顯，希夫也是暗中控制世界的猶太人之一：這又是從西方那里學來的錯誤一課。民眾的戾氣曾一度變得一發不可收拾，暴露出丑陋面目。由于俄國未被勒令支付戰爭賠款，東京爆發了騷亂，參與者中除了怒火中燒的民族主義者外，還有民權運動的成員。新一代日本人成長于狂躁沙文主義和好戰思想甚囂塵上的年代，較少受到維新早期那種理想主義的浸淫。隨著這批人走向前臺，寡頭們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向來贊成強軍而不是培養軍國思想的山縣有朋對此憂心忡忡，擔心日后的戰爭將演變為東西方之間的種族戰爭。

\*\*\*\*\*

夏目漱石是他那個年代最出色的小說家，他曾沉重地警告稱，日本嘗試消化西方文明的速度過快，將面臨一場集體精神崩潰。夏目漱石和福澤諭吉均代表明治時代最可愛的一面。他是一個真正實現了“文明開化”的人，不僅通曉中日雙語，還深諳歐洲文學文化，這番修為不僅在當時少有，就是放到現在也是實屬罕見。夏目是個富有人文精神、具有獨立思想，但內心又十分矛盾的作家。《我是貓》這部或許稱得上是他代表作的小說就反映了上述所有特點。小說講述的是發生在一名學生和老學究之間的故事。學生管老師叫“sensei”，也就是日語里的老師之意。師徒屬于不同的兩代人，各自的成長環境和年代在他們中間劃下了一道鴻溝。老師因為對摯友年輕時自殺一事有負罪感，內心一直備受煎熬。同時他還要忍受一種疏離感，因為自己是時代的落伍者。1912年夏，明治天皇駕崩后，夏目覺得屬于自己的時代也隨之遠去了。他在報上讀到日俄戰爭的英雄乃木希典大將在天皇去世當天自殺。這種追隨主公而去的做法，早在一個世紀前就已顯過時。故事里的老師也決定自殺。

撇開切腹自殺這一老掉牙的形式，乃木希典大將其實同福澤諭吉、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和夏目漱石一樣具有鮮明的明治時代風范。如同《我是貓》（‘吾輩は貓である’）里的老師一角，乃木這個人也背負著恥感。1877年，在鎮壓西鄉隆盛麾下薩摩武士挑起的西南戰爭中，乃木作為政府軍的指揮官，竟然將聯隊旗給弄丟了。當時他本想一死了之，以洗刷恥辱，卻活了下來，日后還參加了甲午戰爭，并在日俄戰爭中一舉奠定了自己傳奇將領的地位。他的兩個兒子都在日俄戰爭中陣亡，但喪子之痛并沒有令乃木動搖。在次子也戰死沙場后，他曾說過“為天皇捐軀乃吾之榮幸”這樣的話。

如其所言，他的確“捐軀”了，這么做既出于愛國心，也可能出于對亡子的歉疚。天皇大殮當天，乃木賦詩一首，在贊美富士山之余，也表達了希望日本緬懷那些為天皇殉死的英烈愿望。他的夫人換上一身黑色和服，而乃木則脫得只剩下白色內衣。在向已故天皇和兩個兒子的遺像鞠躬后，乃木將一柄匕首扎入夫人的脖頸，成全了她，隨后又像武士那樣，持短劍切腹自盡。正如先前所言，這種死法哪怕在當時看來也已顯得老套，但是乃木大將及夫人作為理想行為的楷模，為后世樹立了榜樣，其性質堪比福澤諭吉和他的自由思想，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鮮有人能做到像乃木夫婦那般忠直剛烈，但躍躍欲試者還是多如牛毛，結局往往以荒誕收場，最終還會釀成慘劇。

每張一萬日元紙幣上都印有福澤諭吉的頭像，一千元面值的則是夏目漱石。要是把乃木將軍的肖像也印在鈔票上，讓他知道了怕是會惶恐不已。但是他并沒有被人遺忘，時至今日，仍有人銘記緬懷他。乃木家的老宅依然矗立在東京，一旁是供奉這位將軍靈位的神龕。紀念乃木的公祭每年舉行兩次，分別是他忌日前夕和當天。公眾受邀沿著一條小徑盤旋而上，參觀乃木家的舊宅，要是觀者留心某扇窗戶背后的話，還能辨認出一件血跡斑斑的內衣，它的主人被喚作“最后的武士”。

注釋

[\*](#_14) 　即教育部部長。——編注

[†](#_15) 　小霍雷肖·阿爾杰（Horatio Alger Jr.，1832——1899），美國兒童小說作家，一生著有大約一百三十部作品，大都是講窮孩子如何通過勤奮和誠實獲得財富和社會成功的。

[‡](#_16) 　尤利塞斯·辛普森·格蘭特（1822——1885），美國第十八任總統。

[§](#SS_2) 　外務卿這一頭銜，在1885年12月日本實行內閣制后改稱外務大臣。

[¶](#P_2) 　增田宗太郎，出身中津藩的藩士家庭。

[\*\*](#_17) 　原書誤植為1839年。——編注

[††](#_18) 　本書中的“滿洲”一般是指中國東北地區；“滿洲國”則是指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后扶植的傀儡偽政權——偽滿洲國。——編注

[‡‡](#_19) 　滿洲鐵路系俄方定名，清政府定名為“大清東省鐵路”，簡稱“東清鐵路”，即日后的“中東路”。——編注

# 第三章　色情的、獵奇的、無意義的

1920年是許多日本人眼中的黃金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在遙遠的世界另一端，這場他國之間的紛爭于日本而言是一樁幸事。趁著歐洲列強在戰爭中靡耗資源，數百萬青年血灑疆場，日本人造船，出口紡織品，制造工業機械和鐵路車輛，并為歐洲人供應軍需物資。待戰爭結束時，日本經濟已是一片欣欣向榮，不僅誕生了三菱、住友等大型財閥中的翹楚，同時也涌現出不計其數、處在工業金字塔底端的小型工坊。“錦上添花”的是，日本還收獲了部分戰利品。加入協約國后，日本攫取了德國在中國和南太平洋的殖民地，帝國版圖得以擴張。

明治末年的專制氣息現已消散，大正天皇嘉仁為人愚鈍，哪怕只是充當擺設，身上也缺少他父親那種威嚴感。一次，這個可憐人被請去出席國會，據傳他抄起一份文件，卷了卷，當成望遠鏡用。自此他便極少出現在公眾場合。（其子裕仁于1922年走上前臺，開始攝政。）明治時期的元老們不是已經故去，就是上了年紀，無法再施展權威。日本首相頭一回由有黨派政治家、而非舊官僚擔任。

日本帝國內部當然也并非太平無事。1919年3月，朝鮮人起事，反抗將他們視為二等公民的強制同化政策。1905年的日俄戰爭后，朝鮮淪為日本卵翼之下的保護國，并于1910年被日吞并。部分朝鮮精英對此持歡迎態度，與日本人沆瀣一氣，但多數朝鮮人，尤其是大學生，認為日本文化還沒朝鮮發達，對日本官員騎在他們頭上作威作福強烈不滿。數以千計的人聚集在漢城市中心的塔谷公園，宣布獨立。來自各階層的約五十萬朝鮮人走上街頭，聲援起義。手持軍刀和步槍的日本憲兵撲向人群。起義被鎮壓了，至少七千名示威者遇害，其中不少是學生。這起大屠殺震驚世界，以至于連日本政府都承認事態嚴重。

是年，中國爆發了抗議日本繼承德國在華權益的“五四運動”，這既是一場反日運動，同時矛頭也對準腐朽的北洋政府。那時日本國內也不太平，戰后的通貨膨脹和短期蕭條導致鄉村地區貧困交加，失業率高企。1918年8月，日本國內暴民四處縱火，遭殃的不僅有警察局、店鋪和有錢人的家，奇怪的是，東京市內一些昂貴的妓院也被一把火燒了。暴亂的起因是抗議高昂的米價。然而，這依舊是一個令人樂觀的信號：日本人認為自己有公開批評政府的自由。20世紀20年代初，各種運動風起云涌：有提倡普選的，有呼吁解放社會被歧視群體的，有鼓吹女權的。總而言之，那是一個屬于年輕人的時代。

\*\*\*\*\*

東京的銀座區素有“文明開化”之歐化重鎮的美名，自明治末期亂世以來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小伙子留著長發，戴著“勞埃德”式（源自哈羅德·勞埃德［Harold Lloyd］ [\*](#_38)  ）眼鏡，穿著喇叭褲和花襯衫，扎著松松垮垮的領帶。他們和梳著蘑菇頭的姑娘徜徉在栽有垂柳的大街上。血氣方剛的青年聚在“牛奶鋪” [†](#_39)  里討論德國哲學或俄國小說，由此得名“馬克思少男少女” [‡](#_40)  。幾年后，時髦青年又有了新名字，男的叫“摩登男孩”（モボ，modern boys的縮寫），他們那些摩登范兒十足的女伴（flapper） [§](#SS_5)  則叫“摩登女孩”（モガ，modern girls的縮寫）。除了“牛奶鋪”外，銀座還遍布著德式啤酒屋和巴黎街頭那種咖啡館，只需略加打賞，里面的女招待并不介意出賣色相。店外掛著諸如“老虎咖啡廳”和“雄獅啤酒屋”的招牌，老主顧里不乏新聞記者。同咖啡廳女招待一樣，他們也是大眾傳媒和娛樂新時代的一道風景線。一路沿街而上，在1905年爆發大騷亂的日比谷公園附近，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 Lloyd Wright） [¶](#P_5)  設計的帝國酒店正拔地而起。落成后，這里將是人們喝茶和品嘗時髦的“卓別林太妃糖”的地方。

電車駛向銀座東部，就來到了淺草。這兒是大眾娛樂的中心，藝術裝飾風格的影院里播放最新的好萊塢大片，“劇院”里歌女站成一排，胴體半裸，表演高踢腿。1921年 [\*\*](#_41)  ，有些人興許看過《蛇性之淫》這部影片，導演是好萊塢學成歸來的托馬斯·栗原（Thomas Kurihara） [††](#_42)  。同樣有好萊塢背景的默片導演弗蘭克·德永（Frank Tokunaga） [‡‡](#_43)  則堅持和攝制組只說英語，致使其工作室多此一舉地請來翻譯，徒增開支。以坂本龍馬等江戶時代劍客為題材的武俠片海報無處不在。除此之外，卡巴萊歌舞表演，連環畫說書，西式、中式和日式餐廳應有盡有，甚至還能聽到真正的歌劇。某位旅英意大利人向東京市民展現了威爾第作品之美。

大正年間，東京洋溢著一種輕佻間或虛無的享樂主義精神，讓人不禁聯想起魏瑪時期的柏林。由之而生的文化被概括為“エロ”（ero），“グロ”（guro），“ナンセンス”（nansensu）。“エロ”指代英語單詞erotic（色情的），“グロ”指代grotesque（獵奇的），而“ナンセンス”的意思再清楚不過了，就是nonsense（無意義的）。從某些方面來看，東京與柏林的相似之處絕非無心插柳的結果。畫家和漫畫家刻意模仿喬治·格羅茲（George Grosz） [§§](#SSSS_1)  的風格；“新型戲劇”的導演除了推出豪普特曼（Hauptmann） [¶¶](#PP_1)  和梅特林克（Maeterlinck） [\*\*\*](#_44)  的劇目外，還研究馬克斯·萊因哈特（Max Reinhardt） [†††](#_45)  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 [‡‡‡](#_46)  的作品。

達達主義、表現主義、立方主義、建構主義、“新覺醒”，所有這些元素都曾在日本流行過一陣——實際上還不止“一陣”，因為潮流在日本的生命力通常要比在其發源地長久得多。小說家也把目光投向歐洲。谷崎潤一郎沿襲了19世紀末法國頹廢派的文風，這一時期的佳作之一、衣笠貞之助拍攝的《瘋狂的一頁》（‘狂つた一頁’，1926年）就受到影片《卡里加里博士》（The Cabinet of Dr.Caligari） [§§§](#SSSSSS_1)  的巨大影響。在《瘋狂的一頁》問世前幾年，衣笠還執導過一部平淡無奇的故事片，并在其中飾演一位穿和服的女人，腳蹬厚重的雨靴，以應付露天拍攝的情況——追求逼真寫實的戲劇風格很晚才傳到日本，電影也不例外。大正年間，政壇波詭云譎，跌宕起伏，這一時期也刮起一股藝術表現和反思之風。個人主義發展到了孤芳自賞的程度，記錄作者點滴心緒、被稱作“私小說”的日記體文學紅極一時。藝術家們已經全然拋卻明治時期的一腔理想主義熱血，一心探索浪漫愛情和黑暗情欲的極限。

精英學府的學生同樣也對新思潮如饑似渴。他們的穿著打扮酷似坂本龍馬，不修邊幅、散漫不羈，還喜歡把“流氓無產者”“布爾喬亞自由主義”等字眼掛在嘴邊。學生們對“笛康叔”（DeKanSho）興趣盎然，“笛”、“康”和“叔”三個字分別代表笛卡爾、康德和叔本華。有錢人家的大家閨秀不甘心只學習如何料理家務，于是到了1918年，東京誕生了第一所女子大學。就連軍人也感受到了大正早期的縷縷清風。陸軍大臣田中義一就擔心部隊“變得張狂而叛逆”，某位司令官還曾抱怨道，“由于大眾知識水平和社會教育的進步”，他再也無法指望部下不假思索地執行命令了。

\*\*\*\*\*

那么問題出在哪兒呢？這種無拘無束的日本“魏瑪精神”怎么到了1932年前后就一蹶不振（雖說并未銷聲匿跡）了呢？想知道答案，就務必要分析日本朝野和軍部的權力格局。不僅如此，還要檢視日本政治叛亂的本質。早在1905年，這一問題就初露端倪，那時，標志日俄戰爭結束的《樸次茅斯條約》（Treaty of Portsmouth）引發了暴動。乍一看，示威抗議純粹是一項侵略主義行徑。報章言辭激烈地抨擊這一條約，紛紛發表社論稱其太便宜俄國人了。然而，比之更兇狂的是9月5日當天沖擊警察路障、毆打攔路警員、嘯聚日比谷公園的暴民。伴著銅管樂隊演奏的軍隊進行曲，他們高喊口號：“仗要接著打下去！”人們唱起國歌，高呼“天皇萬歲”“皇軍威武”，隨后向皇宮進發，并與那里的警察發生了沖突。

東京的暴亂持續數日，造成多達一千人傷亡。十三座基督教堂遭受打砸搶，其中一座位于淺草，其神甫很不明智地宣稱俄國之所以占了便宜，是因為它是個基督教國家。政府大樓和警察崗亭一片狼藉，首都的局勢一度面臨失控。然而，這一切背后還不止是對外侵略主義在作祟，因為暴亂的領頭人并不全是右翼好戰派，還包括民權運動在內的老面孔和倡導普選的人士。某人還給駐扎滿洲的關東軍發去一封電報，懇請部隊予以敵人致命一擊，同時向樞密院請愿，要求撕毀《樸次茅斯條約》。

實際上，這些行為同1919年抗議政府聽任日本強占德國在華殖民地的中國青年幾乎如出一轍。當政府統治缺乏民意基礎，甚至未獲民眾許可時，造反的某種形式就是力爭比當政者更加民族主義。當政者要是賣國賊的話，就理應被推翻。這種情況在東亞一再上演，周而復始，于自由民主無益。與此同時這也顯示出，對內的政治權利訴求與對外的帝國主義主張完全可以和諧共存，并行不悖。但這種戲碼當事雙方都可以玩；官方也可以將民族主義情緒的禍水引到自由派頭上，他們也的確經常為之。

即便如此，議會制民主似乎在大正初期尚有一線生機。1918年的“米騷動”為首個由下院議員兼民選政治家原敬組成的內閣奠定了基礎。民眾之所以抗議《樸次茅斯條約》，不僅是為了逼迫俄國做出更大讓步。同理，暴動當然也不單單涉及米價。對于所有那些自感被新工業時代所拋棄的人，這給了他們發泄胸中憤懣的機會。這一群體包括建筑工人、人力車夫、農民、小店主和“部落民”（意指被社會排斥遺棄的人）。雖然1900年頒布的法律助其擺脫了社會枷鎖，但他們仍舊備受歧視。官方試圖通過譴責那些因為暴動而遭到驅逐的人來操縱大眾偏見，但并不起什么作用。相反，名譽掃地的首相只好辭職。

原敬具有高超的政治手腕，但也不得不想辦法兼顧所屬政黨“立憲政友會”（簡稱“政友會”）的利益和掌握日本政壇真正權力的那些機構的利益：比如由退役軍人、舊廷臣和保守派官僚組成的貴族院（上院）；再比如天皇的智囊團，即決定國家大事的樞密院；又比如身為現役軍人的陸、海軍大臣。藩閥依舊活躍，他們長袖善舞，像一群高級士紳俱樂部里的理事那樣把持著上述組織。山縣有朋和伊藤博文等人的聲望足以維持其運轉。有矛盾可以擺平，面子上掛得住，又不傷和氣，心腹得到推舉，利益之爭則在秘密會議和君子協定中迎刃而解。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天皇旨意這道帷幕之后。可是，藩閥們死的死，老的老，待他們謝幕后，日本政壇便陷入了一場不同機構之間不間斷的混戰，沒有哪方可以獨占鰲頭。天皇旨意只是一道掩蓋“群雄并爭”的幌子，這種情況到了大正天皇及其子裕仁在位期間變得尤為突出。

原敬為擴張議會權力和壯大黨派政治所采用的策略與20世紀50年代以來確保自民黨執政地位基本不動搖采取的那種手段別無二致。他在之前幾屆內閣中擔任過內務大臣，通過編織一張流淌著政治獻金的關系網，籠絡了一批地方上的地主、商人和實業家。就這樣，鐵路、橋梁、公路和新廠房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在條件優厚的協議和巨大回扣面前，官僚投身原敬的政黨機器著實有利可圖。這一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成功，但當原敬升任首相后，針對官場腐敗的批評遭到了嚴酷的打壓。成立于1911年的“特別高等警察課”（特高課）將作家和“危險”書籍出版商列為緝拿對象。“危險”當然是一個彈性很大的概念，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思想一般都可歸入“危險”范疇。

原敬絕對算不上激進派，在推動男性普選權一事上他鮮有建樹。他能當上首相，端賴當初傍上了山縣有朋這位元老級大靠山。即便如此，對于一些人而言，原敬的做法還是太過激進了。他因為同意與美、英、法三國簽署條約，限制日本海軍擴軍計劃 [¶¶¶](#PPP_1)  ，得罪了海軍高層。鑒于此，原敬在1921年遭暗殺就當真不足為奇了。殺他的依然是那些赤誠狂徒中的一員，他們對撲滅日本民主制的希望“功不可沒”。

同多數西方國家一樣，那時的民主即便在日本自由派眼中也仍是一個相對意義上的概念。在推動男性普選和立憲政府一事上，吉野作造當屬最積極的人之一。吉野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系，這所頂尖學府是孕育官僚精英的知識殿堂，在戰后更名為東京大學，并沿用至今。吉野本可加入那些行事詭秘的小團體，借天皇之名統轄日本，但他沒有這么做，而是效仿前輩福澤諭吉，選擇了一條最難能可貴、最岌岌可危且最危機四伏的道路：成為一名獨立知識分子。同許多東亞地區的自由派活動家一樣，吉野也是基督徒。

1905年，也就是畢業后一年，吉野開始著書立說，批判專制政府和“軍國化帝國主義”。盡管他不認可日本已準備好接受美式民主，卻老愛引用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Gettysburg Address）。吉野表示，要想成為一個有頭有臉的大國，參與國際競爭，唯有通過立憲政府以及他所謂的“以民為本的民主”方能實現。與一些基督徒不同，他完全擁護對俄作戰，因為俄國在他看來是個封建的專制王權國家，而日本則是朝鮮和滿洲天然的主人。但既然人們被呼吁為國征戰——也就常常為國捐軀——他們自然對誰來管理國家享有發言權。這也構成了后人口中“大正民主”的根基。人們談及這一時期，有的無比留戀，有的萬分厭惡。

吉野是個心胸豁達的改革派，這一類別在日本政壇常被人踩在腳下。他信奉社會主義，卻又不是革命黨——日本官方總是罔顧這一區別。他時而認為天皇制度的神秘色彩終將褪色，盡管還不到時候；時而認為朝鮮人會獲得真正的自主權，卻無法享有絕對主權；時而又認為中、朝、日三國人民應攜起手來，共同對抗軍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剝削。他希望對幾乎毫無制約的樞密院加以鉗制，要是可能的話，最好是撤銷這一機構。在當時，吉野算得上是最前衛的民主派了，但他從未帶頭參與暴力游行，而這仍是普羅大眾傾吐不滿情緒的唯一渠道。

吉野為自由派刊物撰稿，到處演講，在東京帝大任教，負笈海外，曾在《朝日新聞》擔任記者，甚至還依照明治初期辯論社的傳統，創辦了“新人會”。這是一個供聰慧的“馬克思少年”議論社會和時事的非正式社團。吉野在中國做過一段時間老師，并在日本媒體上發表過積極評價1919年“五四運動”的文章。1916年他訪問朝鮮，親眼目睹日本拓殖當局的殘暴，也看清了他們想要將朝鮮人歸化為日本人的努力純屬徒勞無功。官方那套朝鮮人和日本人同文同種的宣傳，由于含有對朝鮮人正式或非正式的歧視而受到了致命的破壞。他告訴日本讀者，朝鮮人的身份和反日是畫等號的。很不幸，這句話在一個世紀后的許多朝鮮人（韓國人）身上依舊適用。吉野堅稱，發生在1919年的朝鮮起義是“大正時期的一塊污點”。類似暴亂必須彈壓，這自不必說，但是他也發出了應善待朝鮮人的疾呼。這樣說來，吉野雖是個死硬的帝國主義者，但同時也不乏人文關懷。他的觀念既反映出大正時代自由主義思潮的光輝，也襯托出其局限性。要是連像吉野這樣的自由派都對日本魚肉鄰國一事并無根本性異議的話，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日本后來會踏上一條比這危險得多的軍事冒險之路。

日本人對朝鮮人犯下的某起最慘絕人寰的暴行，發生在1923年關東大地震重創東京和橫濱之后。大約午飯時間，整座城市開始劇烈晃動。幾小時后，東京陷入一片火海。一時流言四起，傳播速度同火勢一樣迅猛，說是外國人在用一臺地震制造儀加害日本，朝鮮人則正往井里投毒。由于那時外國在日僑民寥寥無幾，人們對“外國佬”無計可施，暴民就四處殘殺朝鮮人以泄憤。一些人被淹死在隅田川，另一些在燃著余燼的斷壁殘垣之間被踢打至死。有人挺身而出，保護朝鮮人，此人便是吉野作造，他還竭力想要修正被官方低估的朝鮮死難者人數。他得出的結論是將近兩千人罹難。

1923年，那些為自由“鼓與呼”的人依然存有一線希望。兩年后，以加藤高明為首的內閣總算通過《普選法》，規定所有二十五歲以上、有穩定收入的男子擁有選舉權。加藤富有而親英，處處模仿英國上流社會的習氣。考慮到僅僅一個世紀前日本所處的國際地位以及當時亞洲其他國家的情形，《普選法》的出臺可謂一項了不起的成就。但似乎每往前邁出一步，就要立刻再倒退一步才行。一周后，《治安維持法》規定任何旨在變更“國體”的有組織行為都屬違法。這意味著，共產黨或激進社會主義者可能面臨長達十年的牢獄之災。

加藤翌年去世，耐人尋味的是，他是自然死亡。在經歷一位將軍 [\*\*\*\*](#_47)  主政的一小段插曲后，政府大權落到一位比加藤更有意思的政治家手中。此人名叫濱口雄幸，是“立憲民政黨”（簡稱“民政黨”）黨魁。他有很多宏偉的計劃，比如在地方選舉中賦予婦女投票權、改革勞資關系、同中國改善關系。1930年，濱口在倫敦簽署了一份海軍條約，進一步限制日本海軍擴充軍備 [††††](#_48)  。此事后果很嚴重，海軍軍令部總長火冒三丈，一介政客竟敢染指他的地盤，要知道這可是海軍自己的事，不容文官插手。濱口在東京火車站遭右翼狂徒槍擊，幾周后宣告不治。僅僅過了一年多，首相犬養毅又在一場未遂政變中遭一伙隸屬“血盟團”的海軍軍官殺害。犬養生前極力阻止陸、海軍中的激進派同中國開戰，與他一同遇刺的還有兩位商界領袖。主戰派還用手榴彈襲擊了犬養所屬黨派政友會的黨部大樓和日本銀行等右翼的眼中釘。至此，政黨政治的試驗戛然而止，滿洲淪于日本之手，侵華戰爭的序幕也在徐徐揭開。

\*\*\*\*\*

魏瑪共和國不僅毀于希特勒手下野蠻的沖鋒隊，它的覆滅也緣于愿意捍衛其脆弱制度的人寥若晨星。共產黨人和社民黨人忙于黨爭，并未充分意識到納粹威脅的嚴重性。無獨有偶，大正民主擁護者的數量也不足。早在1916年，自由派思想家吉野作造就曾寫道，許多日本知識分子未能認清普選的意義。實際上，對其厭惡者大有人在。一如太多幻想破滅的德國知識分子，日本人同樣認為民主政治粗鄙、卑劣、自私、腐化。這種看法一方面誘發了激烈的反自由思想，另一方面又催生了病態的自省，有時則是二者皆有。

西田幾多郎是20世紀初最有影響力的日本哲學家。深受德國理想主義和佛教思想浸淫的他曾嘗試提出一種全新且獨特的日本思想。追尋“日本性”之本質的做法是對德國理想主義的描摹。與多數誕生于現代日本初期的事物相似，“日本性”也是一種雜糅，融合了禪宗、黑格爾和尼采的思想。而西田的追隨者后來還摻入了海德格爾的學說，進一步豐富了其內涵。西田哲學的根基是“主觀和客觀、自我與非我的統一”，日本需要的是一種不為理性所拖累的直接體驗，需要將佛教中的“頓悟”和黑格爾所說的“絕對精神”結合起來。黑格爾認為個體要融入集體。倘若這套學說僅僅流傳于京都帝國大學高墻之內的話，倒也沒什么害處，可惜事與愿違。文部省于1937年發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小冊子，名為《國體的本義》。該文件勸說日本人“舍棄”他們的“小我”，在“天皇身上尋找”自身存在的本源。此外，有著純潔精神的日本人優于任何其他民族，且“秉性與西方國家所謂公民迥然相異”。這份造成惡劣政治影響的文件以一種粗鄙的方式呈現了西田關于日本主體融入天皇客體的思想。

下面兩位人物的經歷顯示出，這種獻身精神對于曾苦苦追求個人主義卻無功而返的大正年代的人而言，是何等受歡迎，又何等具有慰藉作用。第一位登場的人物是北一輝，他在求知道路之初是尼采和日蓮宗佛教的浪漫信徒。20世紀20年代的日本，社會氛圍浮躁，日蓮宗提出一種說法，認為帝制日本終有一日會站在統一世界的中心，而在此之前要先打敗猶太人和民主黨。這里很明顯能看出俄國宣傳的痕跡，日本人都沒怎么聽說過猶太人是何方神圣。

從家族背景來看，北一輝既不排外，也并不富有浪漫主義情懷。他的家在遙遠的佐渡島，販售清酒的父親是民權運動堅定的擁護者。北一輝自小沉迷于絕對個人自由理想，但民權問題在他眼里實在是太小兒科。他對和平的政治活動毫無興趣，崇尚的是絕對真理和快刀斬亂麻的意志行為。個人主義思想令他和許多同齡日本理想主義者困惑不已。北一輝推崇尼采，深受其熏陶，開始試著通過將人性和神性合二為一來克服個體疏離感。1911年，見證了推翻清朝統治的辛亥革命的他興奮異常，還給自己起了中文名。很快，北一輝滿腦子都想著要在日本鬧革命。

對于北一輝，革命暴力的宗教意義要大于政治意義，這是一項個體精神解放行為。他結交極右翼陣營成員，起草政治傳單，鼓吹由天皇擔任宗教元首（führer）的國家社會主義。北一輝認為，國家已經被腐敗寡頭、官僚、銀行家和實業家綁架了。寡頭們以一部言辭模糊的明治憲法，限制天皇的政治權力，欺騙日本民眾。日本需要一場政變，將絕對權力還給“人民的天皇”。個體只有在和天皇以及國家完全捆綁在一起后才能得到解放。在北一輝的筆下，國家是一種有機體，一種吸收所有個體臣民“小我”的“大我”。而帝國之上還有一片極樂世界，人在往生極樂后可以成佛。至此，北一輝與他理想主義的父親漸行漸遠，他心里惦記著一項神圣的事業，愿意為之而生，或者更重要的是，愿意為之而死。

北一輝的事業對陸軍少壯派軍官格外有吸引力，他們多數來自貧窮的農村，和北一輝一樣將國家的腐朽墮落歸咎于世故的城市資本家。在一腔暴力理想主義熱血的驅使下，部分軍官于1936年2月發動政變，企圖將絕對權力交給天皇，并清除賣國賊和貪官污吏。政變被粉碎了，作為幕后指揮的北一輝被捕。要是政變成功，他本可獲任為無任所大臣 [‡‡‡‡](#_49)  ，但他最后連同其余十六人一起被處決。

北一輝的故事印證了一點，日本社會在他所處的時代已變得一點即燃、一觸即發。他并非只是游走在右翼極端思想丑陋邊緣的怪胎。自20世紀20年代初，他定期會見日俄戰爭的英雄東鄉平八郎大將，后者在海軍界的影響力猶在。北一輝的神秘沙文主義學說既具有革命性，又高度迎合那些視民主為敵的強權派的勃勃野心。他被處決后僅兩年，文部大臣荒木貞夫就寫道，日本帝國服膺神旨，“以血緣為紐帶，遠超區區道德，然陛下以超凡之道德形象見于世人……”。請留意“區區”一詞。這段話說是北一輝寫的，也不為過。

高村光太郎的生涯沒有北一輝那般跌宕起伏，此君也無甚政治影響。他是個雕塑家、詩人，但其一生或許較北一輝更清晰地顯示出，想在早期的現代日本追求個人主義是何其困難。高村對于西方和本國的態度是當時許多日本知識分子經歷的一種極端寫照。

作為著名雕塑家之子的高村對歐洲藝術情有獨鐘，尤愛羅丹。結束了在東京的西方藝術教育后，他于1906年來到紐約，開始寫詩，之后移居倫敦，結識了英國陶藝家伯納德·利奇（Bernard Leach）。最終，他在1908年時輾轉至巴黎這座接納了他所熱愛的羅丹和波德萊爾的城市。翌年回到東京，高村過上了西式波西米亞文化人的生活，他厭惡明治日本的閉塞和沉悶，常以此對比巴黎的海納百川。在一首名為《日本人》的小詩中，他宣泄著對同胞的“怒其不爭、哀其不幸”，這些個“如猿猴，如狐貍，如鼯鼠，如鯊魚，如獸頭瓦，如破碗片一般的日本人”！

這首詩作于1911年，彼時的高村回憶起旅居西方的時光，心情還是頗為愉悅的。他直言在巴黎時無憂無慮，甚至都忘了自己是哪國人，這在一個日本人身上很不尋常。或許他覺得在東京難以過上巴黎的那種波西米亞式生活吧：在熟悉的環境里反而會生出疏離感。不管出于何種原因，總之到了20世紀20年代，高村詩歌的基調變了，隱約能從中讀出一絲憤憤然的疏離感，間或顯得狂躁。如今談起旅歐歲月，浮現在腦海中的盡是些寂寥落寞和遭受排擠的片段。詩人不無苦澀地憶起他和一位法國女子的情史。一夜春宵后的早晨，他在鏡中端詳自己這個“蒙古人”，這個黃皮日本佬。自輕自賤的情緒逐漸蛻變為排外心理和種族沙文主義思想。到了30年代，他寫了一堆歌頌日本武運長久的詩，似乎戰事一開，他總算可以如釋重負地使用諸如“我的祖國，日本”或“我們日本人”這樣的字眼了。他還寫了一首給蔣介石的詩：

我的祖國日本要摧毀的不是您的國家，先生，

我們只是在摧毀反日思想。

他終于從西式個人主義的緊張感中獲得了解脫。

此類情緒在日本知識分子中間能引起廣泛共鳴，這讓對抗國家統一和天皇崇拜的政治宣傳成了一件難事。共產黨人和部分激進派社會黨人還在堅守陣地。盡管面臨審查，批評性報道還是層出不窮。但隨著時間推移，自由派陷入強硬左翼和暴力右翼的夾縫之中，原敬的政友會和濱口的民政黨等主流黨派對此作壁上觀。20世紀20年代末，下院投票通過一系列壓制政治異議的法律。在有黨派政治家的支持下，警察鎮壓激進左派，許多社民黨人也未能幸免。政客本想保全議會權力，但在努力無果后，反倒倒向了他們在官僚系統、朝野和軍中的沙文主義政敵。最終，正如司空見慣的那樣，他們自己也被絞殺殆盡。

\*\*\*\*\*

盡管東鄉平八郎大將對北一輝的革命理論饒有興致，但他還肩負著帶教下一任天皇的使命。皇太子裕仁的第一位、或許也是對他影響最深的老師，是日俄戰爭的另一位英雄乃木大將。乃木切腹自殺、為先皇盡忠后，東鄉接任太傅一職，輔導年輕太子的課業。裕仁幾乎完全與世隔絕，苦練射擊、識地圖、兵法和騎馬等軍事技能。他身材矮小、性情敏感又不善言辭，天生就不具備尚武氣質，但他盡力做到最好。

裕仁年輕的頭腦里裝滿了各式各樣稀奇古怪的思想，既有19世紀末水戶學派本土論的影響，也有來自最新日耳曼種族理論的熏陶。他被灌輸了一套日本種族純潔和皇族血脈神圣的說辭，似乎這些都是歷史事實。日本人與“雅利安”民族之間的達爾文式抗爭也是學習的重點，但最要緊的是，他被時時提醒要警惕“歐洲自由主義思想的毒草”。天皇制的存續是皇室最高職責，他的老師因而極其擔心民主思想會有損天皇制的威嚴。1918年，歐洲君主制土崩瓦解的消息傳至日本后，民心震動。德皇威廉二世的下場被當成一則警世寓言。實際上，裕仁所受的教育正是對苦苦掙扎的大正民主的某種反宣傳。

這并不是說他被訓導要與右翼極端分子站在一起，重要的是秩序和國家統一。當裕仁表達對“極端思想”的擔憂時——他屢次做出上述表態——他心里怕的其實不是北一輝等右翼，而是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或者簡單來講就是民主。社會和諧、秩序井然有賴于種族同質化、軍事紀律和忠尊君王的共同意識，任何其他事物只會擾亂綱常，分化國家，結出自私和混亂的果實。

1922年，裕仁受封攝政，他那倒霉的父親則退居幕后。但就在這之前，裕仁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體驗了自由是何種滋味。1921年，歐洲行被定為皇儲學習過程中的一節“必修課”。一些保守派對此表示反對，認為在西方的耳濡目染會玷污裕仁純潔而崇高的地位；其他人則擔心這位笨拙的青年會使日本在外國人眼中低人一等。但他還是啟程了，路過香港，經由新加坡，借道錫蘭（今斯里蘭卡），來到英、法、荷、意四國。此行令他大開眼界，見識了不少新鮮事：比如人們隨身帶錢，搭乘公共交通時要付錢。英國貴族舉手投足間無拘無束，甚至在白金漢宮也不例外，這一點令他印象頗深。宮廷內的人居然表現得和普通人沒什么區別，此情此景想必一定讓裕仁吃驚不已。感慨于阿索爾公爵（Duke of Atholl）和其領地內領民之間親密關系的裕仁表示，在這種政治體制下，“人們無須擔心會滋生極端思想”。回國后，他嘗試模仿英倫風范，但除了愛上并吃了一輩子的培根煎蛋外，這種模仿很快便宣告結束。

大正天皇卒于1926年，其子裕仁登基引來媒體廣泛關注。報紙和電臺不分晝夜地報道新天皇參加插秧儀式、人們揮旗游行、萬燈節、授勛儀式和各式各樣的神道教儀式，其中有些是新近才產生的。關于日本性精華和國體論的書籍汗牛充棟，講座一場接著一場。不斷有人對異見的危險性發出警告。學識淵博的人指出，敬仰祖先、君民連心、祭政一致等觀念不僅是日本的道統，也是“科學”的準則。1925年頒布的《治安維持法》后經修改，擴大了“特高課”的權力，后者也加倍努力地鏟除大學、報館、出版社等機構內的激進分子。為了捍衛國體，軍部也建立了屬于自己的“特高課”。

所有這一切的高潮發生在1928年11月14日，準確的說法是：裕仁天皇在伊勢神宮與祖先天照大神徹夜長談后，于次日早晨正式重獲新生，化身為一尊活神仙。兩周后，新天皇一身戎裝君臨東京，不動聲色地看著三萬五千名軍人列隊從他面前走過。這之后，他還檢閱了擁有兩艘航母、兩百零八艘戰艦和三十九艘潛艇的帝國海軍。當天，千百萬打開收音機的日本人以及旭日旗飄揚之地的每個人，都通過廣播聽見了軍靴行進、禮炮轟鳴和海軍戰機低空飛行時的聲音。昭和時代——昭和意為“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來臨了。

注釋

[\*](#_26) 　哈羅德·勞埃德（1893——1971），美國演員、導演、制片人。

[†](#_27) 　作者誤植為milk bars，應為milk halls。明治、大正年間，日本政府為改善人民的體質，推廣牛奶的飲用，于各街道尤其是學生聚集的街區及車站廣設小間的飲食店。以便宜的價格提供牛奶、咖啡、蜂蜜蛋糕等輕食，也提供報紙、雜志閱覽。——編注

[‡](#_28) 　昭和初期的流行語，應為“馬克思少年”（Marx boy）與“恩格斯少女”（Engels girl）。——編注

[§](#SS_4) 　Flapper特指20世紀20年代的一批年輕西方女性，她們打扮入時，標配是短裙，蘑菇頭。她們熱衷爵士樂，并表現出對合理社會行為的蔑視。

[¶](#P_4) 　弗蘭克·勞埃德·賴特（1867——1959），美國著名建筑師。

[\*\*](#_29) 　原書誤植為1920年。——編注

[††](#_30) 　即日本演員栗原喜三郎（1885——1926）。

[‡‡](#_31) 　本名為德永文六（1987——1967）。——編注

[§§](#SSSS) 　喬治·格羅茲（1893——1959），德國畫家，新客觀現實派大師。

[¶¶](#PP) 　戈哈特·豪普特曼（1862——1946），德國劇作家、詩人。

[\*\*\*](#_32) 　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時劇作家、詩人、散文家。

[†††](#_33) 　萊因哈特（1873——1943），奧地利導演、演員、戲劇活動家。

[‡‡‡](#_34)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沙俄/蘇聯杰出的戲劇大師，系統總結“體驗派”戲劇理論，強調現實主義原則，主張演員要沉浸在角色的情感之中。

[§§§](#SSSSSS) 　《卡里加里博士》是由羅伯特·威恩（Robert Wiene）執導的驚悚片，是德國表現主義電影的里程碑之作。影片通過一個精神病患者夢魘般的回憶，敘述了身兼心理學博士和殺人狂雙重身份的卡里加里的生活。該片是早期電影向藝術邁進的一大標志，并對其他藝術產生廣泛的影響。

[¶¶¶](#PPP) 　這里為作者筆誤，事實上，1921年11月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中，日本先與美、英、法三國簽署了《關于太平洋島嶼屬地和領地的條約》（又稱《四國公約》）。隔年簽訂的《五國關于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又稱《華盛頓海軍條約》）則包括美、英、日、法、意五國。——編注

[\*\*\*\*](#_35) 　這是指陸軍大將田中義一。加藤高明去世后，由內務大臣若槻禮次郎接任首相一職。1927年若槻內閣總辭，由當時政友會的黨魁田中義一接任。——編注

[††††](#_36) 　1930年4月22日，英國、美國、日本、意大利、法國召開倫敦海軍軍備會議，簽訂《限制和削減海軍軍備條約》（即《倫敦海軍條約》）。

[‡‡‡‡](#_37) 　又稱為不管部大臣（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指內閣里未被指派負責某一部門的大臣。——編注

# 第四章　“啊，我們的滿洲”

那么日本的對外戰爭究竟是何時爆發的？其導火索是1931年的“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還是1937年的“支那事變”（盧溝橋事變），抑或是1941年的偷襲珍珠港？日本國內在這一點上沒有共識，史學家甚至對如何命名這場戰爭都無法達成一致，因為每個人對開戰時間的認識都不同。右翼民族主義者依然沿用“大東亞戰爭”這一戰時講法，以偷襲珍珠港為開端。這種稱法的潛臺詞是，日本打了一場對抗西方帝國的亞洲解放戰爭，至于1941年前的侵華戰爭則被輕描淡寫地叫做“事變”。其他人則只肯承認“太平洋戰爭”，似乎除了對美作戰外便再無其他戰事。而對本國戰時歷史頗有微詞的左翼將日本的對外戰爭視為殖民征服，始于1931年吞并滿洲（中國東北），故稱之為“十五年戰爭”。

有個叫林房雄的人，于大正年間開始做學問，他起初信奉共產主義，但如許多人那樣，最終轉投右翼民族主義的懷抱。他的修正派著作《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寫于日本戰敗多年后，書中提出一個觀點，即日本經歷了一場百年戰爭，最早的對手是美國準將詹姆斯·貝特爾（James Biddle）。他于1846年率部赴日，最終鎩羽而歸。貝特爾本想迫使日本開國，卻遭到一名日本守衛的一頓痛毆。自此，日本就同西方較上勁兒了。

林房雄的觀點再現了20世紀30年代那種政治宣傳：日本總是被描繪為西方強權的受害者，列強的一再欺侮令日本拍案而起，為亞洲人民而戰。侵華戰爭的某位主要策劃者在1945年后接受審問時曾說道，佩里準將和他的黑船才是戰爭元兇，因為佩里硬生生地將日本從與世無爭的孤立狀態中拖拽出來，并將其推向大國爭霸這一無情的國際格局。人們在較為反動的日本刊物中依然能接觸到上述觀點，鑒于此類期刊比自由派出版物更能博人眼球，上述看法引起關注也不為怪。當然，不管如何命名這場戰爭，毋庸置疑的是，1931年掀開了嶄新的一頁，標志著日本開始對亞洲大陸進行軍事侵略。

“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發生于1931年9月18日，這一時間節點本可再往前推。盡管一位中國軍閥盤踞滿洲，統治著這塊半獨立性質的私人領地，但日本人的勢力已經坐大。關東軍控制了南滿鐵路沿線地區，其中包括哈爾濱和奉天在內的多數大城市。海濱城市大連和旅順則早已處在日本的直接管轄之下。然而，軍部蠢蠢欲動，不滿足于現狀。席卷全球的經濟蕭條彼時正重創日本，部分年輕官兵心中開始滋生一股強烈的反資本主義情緒。在東京，右翼狂徒和少壯派軍官不僅煽動人們仇視商人和文官，還密謀政變。在中國，蔣介石的北伐軍意圖統一全國，建立國民政府。中國人視滿洲為國土的一部分，盡管日本人簽署過協議予以承認，心里卻不這么想。日本人傾向于將滿洲視為一片沒有法律的無主之地，而日本能為其帶來秩序。考慮到中國末代王朝存在了大約三百年，中國人對滿洲的領土主張可謂合情合理。至于大半個中國屬于法外之地這一事實并不能成為日本侵占他國領土的理由。

20世紀30年代的滿洲，隨處可見氣焰囂張的日本軍官、右翼夢想家和具有革命思想的亡命徒。石原莞爾中將可說是集這些人的特點于一身。他智慧過人，長著一張娃娃臉，為人桀驁不馴，曾在旅德三年間接觸了風靡一時的全球種族戰爭思想。在他看來，最終的大結局勢必是白人和黃種人之間的一場激烈較量，日本和美國則是一對主要對手。同北一輝這位軍中極端主義者的思想導師一樣，石原也是日蓮宗信徒，幻想全世界同處一片日本帝國的屋檐下。但在這之前，他要先設計讓日軍進占滿洲，用不了多久，這里就會被打造為“人間天堂”。

1928年，關東軍炸毀奉系軍閥張作霖的專列，日本人反誣中國軍人，妄圖制造日軍出兵的借口。但事不遂人愿，陰謀流產了。裕仁天皇對軍人擅做主張的行為驚駭不已，勒令首相辭職，“皇姑屯事件”就這樣不露痕跡地被掩蓋了起來。有了前車之鑒，這一次的策劃務必更周密才行。9月18日夜，日軍在奉天城外的鐵路旁引爆一枚炸彈，南滿鐵路基本沒有受損，火車班次也依舊準點，但這起爆炸為攻擊駐扎奉天的中國軍隊提供了口實。日本人誣陷后者“陰謀破壞”。為了平息事態，繼承父親東北軍大帥之位的少帥張學良下達“不抵抗”的命令。日本人繼而宣布把中國軍人一律視同匪徒，而關東軍既然負責保護滿洲的安全，他們便無所顧忌地攻擊中國軍隊。不出六個月，大半個滿洲落入日本人之手。中國訴諸國聯以求仲裁，日本則不失時機地在國內大肆宣傳全世界都與日本作對。

“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爆發時，有黨派政治家、首相若槻禮次郎仍然傾向于對華采取安撫政策。他惶恐不已，關東軍正將日本推向戰爭，他卻無力制止，因為自己無權過問軍事。內閣中的陸、海軍大臣只對武裝力量最高指揮官天皇負責，而不是區區一介文官首相。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同樣是一位國際主義者，竭力想要維持同中國和西方的良好關系，可現如今，他卻要為日軍占領滿洲這一既成事實進行辯護——文官政府根本管不住軍人——這陷他于不仁不義之境地。惴惴不安的廷臣和謀士紛紛勸天皇不要激怒軍隊，生怕他們造反，在國內惹出亂子。作為在野黨的政友會則抨擊政府膽小怯懦，將自己的責任撇得干干凈凈。與此同時，駐扎朝鮮的日軍開始調防滿洲。首相若槻辭職。

他的繼任者犬養毅也沒能管束住在華的部隊，他徒勞地試圖阻遏官方承認滿洲為獨立國家。被反日情緒激怒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向上海的中國軍隊發動襲擊，誰料后者頑強抵抗，海軍陸戰隊只好向陸軍求援。日本媒體熱情洋溢地報道日軍在滬英勇作戰的事跡，以此鼓動公眾輿論，在自殺式任務中陣亡的軍人得到了“人彈”這一光榮稱號。

同前任一樣，犬養只能無奈地目睹這一切。他吁請天皇出面干預，但無功而返。為避免激化上海的事態，犬養再度試圖制止增兵，沒多久便被闖入家中的好戰派海軍軍官刺殺身亡。自此，統治日本的換成了主張“舉國一致”的內閣。1932年至1945年間執政的十四位首相中只有四位是文官出身。這既實現了石原莞爾等陰謀家的夙愿，也迎合了東京一些軍部高官的心意，他們對石原的所作所為百般縱容。陸、海軍大臣在“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和淞滬戰爭之后都被授予了爵位。

從某種角度看，1932年犬養毅遇刺事件敲響了政黨內閣制的喪鐘，其意義堪比1933年納粹上臺，唯一的區別在于，日本沒有納粹黨，也沒有元首。天皇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不假，但他既非法西斯政黨黨魁，亦非軍事獨裁者。對于他在多大程度上為人擺布，又在多大程度上積極投身戰時政治，我們依舊不甚明了。但只要有他在，提供神圣指引，就沒有人可以獨攬大權。日本諸多問題的根源在于體制頂層軟弱、分化，而不是太過強大。國內派系林立，宮廷、軍部、官僚系統、國會都有自己的“山頭”，遠遠談不上“舉國一致”。這些派系之間爭來斗去的勁頭絲毫不遜色于他們面對外敵時的同仇敵愾。

不同于1933年之于德國的意義，1932年并未斬斷日本歷史的延續性，原因是憲法從未被廢止。明治維新后確立的天皇制度完好無損，統治日本的也還是1932年前那批人。政黨一直活動到1940年，但多數只是充當吹鼓手，間或扮演攪局者的角色。政黨政治家依然占據政府職位，國會也照舊議事。他們本可通過拒絕合作來解散內閣。由于還需要其搖旗吶喊，政黨政治家算是保住了些許影響力。經歷巨變的是各派之間的均勢。直到1932年前，宮廷、官僚系統、軍隊和國會都享有權力，國會始終是最弱的一環，但憑借20世紀20年代興起的黨派內閣，其實力有所增長。隨著這一格局壽終正寢，日本政壇成了一群廷臣，陸、海軍首長和官僚的天下，而他們狂熱的手下常常越俎代庖，替他們做決定。

\*\*\*\*\*

有一件事令鉗制議會制政府變得相對容易，那就是強大的宣傳機器。侵華早期，日本國內對這場戰爭無比擁護。正當法西斯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在歐洲抬頭之際，日本的演藝界和媒體也都在為帝國的瘋狂行徑“添柴加火”。無論對于日本還是歐洲，這都是一個大眾政治的年代。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蕭條重創了正在壯大的中產階級，資產階級政治因此遭受沉重打擊。為了詆毀大正年間的自由風氣，官方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昭和早期的社會氛圍像極了彌漫戾氣的明治末年。裕仁天皇被拿來同他的祖父明治天皇作對比，裕仁的太傅乃木將軍等明治時代的英雄成了備受推崇的楷模。《緬懷乃木將軍》（‘憶ひ起せ乃木將軍’，1932年）這出戲大獲成功。日俄戰爭中，肺部中彈、踉踉蹌蹌卻還堅持吹號的英勇司號員再度成為連環畫、少年雜志和歌謠共同贊美的對象。爵士年代風靡一時的音樂換成了一首首進行曲，歌名透著一股明治末的氣息，譬如《皇軍出征之歌》（‘皇軍進発の歌’）《軍中探子之歌》（‘軍事探偵の唄’）或《啊，我們的滿洲》（‘ああわが満州’）。

經濟大蕭條年代醞釀的所有浪漫抱負、民族思想和焦慮情緒都被傾注到建設滿洲這項工程中來。人們被告知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專家們言辭鑿鑿，說要是丟了滿洲，已經因蕭條而傷了元氣的日本經濟將面臨崩潰。滿洲會給日本人提供生存空間（Lebensraum），滿洲的煤、鐵礦是重要的資源。滿洲會培育重工業，開設新銀行，鋪鐵路，建機場，造橋梁，開工廠。比日本國內還要先進、高效和漂亮的城市會拔地而起。滿洲連同朝鮮、臺灣等日本殖民地一起，會并入一個巨大的日元區，這么做的目的不是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剝削老百姓，而是要造福所有天皇陛下的子民。政府將牢牢掌控經濟。官僚、商界領袖和軍事將領同心戮力，為的就是把滿洲打造成為一臺驅動龐大帝國的引擎。

這一切更多只是一廂情愿，并不現實。從方方面面來看，建設滿洲的工程都披著一層虛假的外衣。首先，其經濟意義并不像專家認為的那么大。軍事戰略家和商人在目標的優先性上想不到一塊兒，軍隊和財閥因此向來不睦。工廠、公路、發電廠和漂亮的城市的確是建起來了，且代價高昂。日本官僚在管理工業發展的過程中鍛煉了本領。一些企業富得流油。日元區剛起步時內部貿易一度很紅火，但后來證明這對日本經濟更多是一種拖累，而非提振。滿洲無法吸收日本的出口商品，而滿洲自己生產的商品品質一般，擠不掉從西方進口的洋貨。此外，日本國庫虧空，無力再支持滿洲的工業發展。因此，企業界想把滿洲打造成帝國工商業重鎮的想法不過是南柯一夢。

但要說騙，這還算輕的。如今得名“滿洲國”的滿洲表面上是個“獨立”國家，皇位上坐著溥儀這位可憐兮兮的清朝末代帝王，他的身旁簇擁著一群謹慎、能干而和善的日本“閣僚”。關于“滿洲國”的謊言中有這樣一條：其“國民”大部分是滿人而非漢人，但實際上滿人在滿洲早已屈指可數，就算有，也常常和占據多數的漢人難以區分。日本揚言中國不是一個“穩定國家”，因此有權在北方使出強硬手段，維護本國利益。實際上，就算日本人在場面上給足了末代皇帝面子，“滿洲國”連傀儡政權都算不上，完完全全就是殖民地。“滿洲國”的官員是中國人不假，但人事任命權和政策制定權統統掌握在關東軍手中。

中國政府不斷對此事表達抗議，國聯于是派遣了一支由國際政要組成的調查團，赴“滿洲國”調查日本人的行為是否合法。對于日本，世人多少還有些同情之聲，尤其是在英國。旅行作家等訪客驚嘆于“滿洲國”內日本人的高效作風，在見識了日僑聚居區的整潔、有序和干凈后，再來看中國人待的地方，那只能用混亂和骯臟來形容。日本兵肯定有些粗魯無禮，但這無礙鐵路旅館的富麗堂皇。另外，“滿洲國”是除了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外，另一個火車總是準點的地方。

對日本不利的是，李頓（Lytton）爵士率領的國聯調查團在報告中認為日本人的主張純屬無稽之談 [\*](#_54)  。這引發了新一輪的自哀式宣傳：西方正伙同中國一起陷害日本。媒體又翻出陳年舊賬，其中一些不無道理：1905年簽訂的和約太便宜俄國了，西方列強不同意日本在1921年擴充海軍軍備，美國的排日移民政策，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關于日本人在日俄戰爭中“為滿洲”拋灑熱血這件事又被拿來大做文章。最終，日本退出國聯，其駐國聯首席代表松岡洋右因為在演講中稱日本就像耶穌基督，被釘在了世界輿論的十字架上，引發一片嘩然。

但即便是在最窮兵黷武的年代，日本也并非鐵板一塊。右翼恐怖分子也許十分猖狂，但是左派并沒有消亡，特別是大學里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依舊享有強大的話語權。實際上，某個社會主義政黨一直活動到了1940年。另外，日本異見者中幾乎沒有背井離鄉、流亡西方的人。這部分是因為多數日本人難以設想離開了日本將如何生活，因為他們既不會外語，也沒有人脈；此外，還有另一層原因：為了使他們融入國內新秩序，官方煞費苦心。日本當局沒有采用納粹那套辦法來控制潛在異見者。日本左派沒進過集中營，他們被“統一思想”的過程看似毫不費力，以至于許多知識分子從不覺得自己背棄了理想。

“滿洲國”提供了一條出路。它成了許多左翼理想主義者的樂園，他們在鐵路公司謀得調查員或顧問的差事，滿以為自己正在幫助亞洲人改頭換面。模范殖民地的一大優勢在于可以放手去嘗試，不必面對公眾阻力。這讓“滿洲國”和臺灣在建筑師和工程師眼里格外具有吸引力。不僅如此，“進步的”社會科學家也有了用武之地，他們或許發自內心地相信那套要將“滿洲國”打造為種族和諧典范的官方宣傳。“滿洲國”內部最接近政黨的組織“協和會”號召“五族”——日本人、朝鮮人、滿族人、蒙古人和漢族人 [†](#_55)  ——和諧共處，聽從日本號令。不管其他四個族群如何看待這一安排，但凡是日本人，在大連或奉天的感覺肯定比在大阪或東京更自由，也更愜意。

日本小說家和散文家也紛至沓來，記錄“滿洲國”無與倫比的現代面貌：火車跑得多快，大連的公園多漂亮，哈爾濱的夜生活多有國際范兒。一些杰出的導演加盟滿洲電影制片廠，拿到最先進的設備后，拍攝了一系列反映“勇敢的日本拓殖者”“幫助”亞洲同胞的影片。這些藝術家和作家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其實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反對資本主義，因而也就反西方。泛亞主義與他們的理想主義情懷不謀而合，所要做的不過是舍棄社會主義，轉投某種國家社會主義。

對于冥頑不靈的日本異見者，另有一套打壓他們的辦法，有時需要使用一定的武力，但通常情況下只需同僚或家人施壓即可，或者光是唱反調帶來的那種孤獨感也足以奏效。這種辦法叫“轉向”。別的不說，小林多喜二這位共產主義作家就曾拒絕背棄自己的政治信仰。他于1933年死在獄中，八成死于酷刑折磨。然而，盡管這起野蠻行徑絕非孤例，類似情況卻鮮有耳聞。20世紀30年代初鋃鐺入獄的左派政治犯幾乎全都在未經嚴刑拷打的情況下就放棄了共產主義，選擇“轉向”——換言之，他們承諾自己再也不會鼓吹馬克思主義。這之后，多數人獲釋出獄，哪怕依然可能面臨被惡警監視和被鄰居罵成“赤匪”的下場，日子總算是過得太平無事。

發生在美濃部達吉教授身上的事或許算得上是昭和早年知識分子生存狀態最悲涼的寫照。美濃部為人保守，擁護大正民主，同危險的左翼八竿子打不著。在東京帝大教授憲法的他提出一套“天皇機關說”，認為憲法沒有規定國會必須唯天皇馬首是瞻；天皇是國家首腦，不應讓他去做自己也無法承擔后果的決定。只有一個強大的、權力受憲法保障的國會才能確保軍人不以天皇的名義大開殺戒。

美濃部的看法頗具先見之明，20世紀20年代時曾在媒體和國會掀起一場公開辯論。他的觀點至少在理論上得到廣泛認可，甚至宮廷內部也不乏贊同者。極端民族主義者發表文章，對他惡語相向，還威脅恐嚇美濃部，卻無法撼動他的權威地位。美濃部與大正當權派過從甚密，他從教授位置上退下來后在貴族院里謀得了一個席位。

然而，到了1935年時風云突變。美濃部不僅遭到右翼極端主義者的非難，還在貴族院被人指控對君主不敬，有損“國體”。此時已經沒有同僚有底氣為他說話了。美濃部被褫奪議員資格，他的書被列為禁書。針對他的抨擊，部分是人身攻擊，是學術圈里的公報私仇，但也有部分是出于政治考量。對軍隊和右翼壓力集團中的極端分子來說，真正目標并非美濃部，而是過去的當權派，政黨固然是其中之一，但就連宮廷也包括在內。右派打出“凈化國體”的幌子，為的是擺脫優柔寡斷的廷臣、互相扯皮的政客和膽小怕事的官僚，他們一味敦促天皇謹言慎行。理想中的神圣軍國是容不下合憲性解釋的。

然而，軍隊同日本所有機構一樣存在內部分裂。“美濃部事件”發生時，軍隊分為“皇道派”和“統制派”這兩大勢不兩立的派系。后面一派人以滿洲陰謀家石原莞爾和首相東條英機為代表，認為日本未來會與西方爆發全面戰爭。在日本國內策劃反對資本家和官僚的暴動可不是他們的作風。這群人是軍事紀律的信徒，認為應聯手官僚和大企業，共同增強國力。皇道派則意欲鬧革命，發動一場“昭和維新”，清除腐敗資本家等“國體”的敵人，并在一部新憲法的框架下建立軍事獨裁。日本的帝制羸弱得很，其守護者總擔心左派會造反，但真正的威脅其實來自右派。

1935年美濃部的“天皇機關說事件”發生時，軍隊內部圍繞政府職位的爭斗演變為一場暴力事件。一位統制派高官原打算將一些惹是生非的皇道派軍官撤職，結果被人用武士刀砍死在自己的辦公室里。刺客是一名年輕軍官，正如在日本常見的情況，他的一片赤膽忠心備受推崇，大眾媒體也對其大加贊賞。為了平息事態，最積極的一些支持者被調去“滿洲國”，統制派再度權傾朝野。然而，除了天氣轉涼外，事態根本沒有冷卻的跡象。

1936年2月26日這天迎來了三十年來最大的一場雪。凌晨時分，皇道派青年軍官決定動手。他們成分復雜，其中一位還是東京某喜劇名家之子。多數軍官的老家在東北的鄉下，那里飽受蕭條之苦，民不聊生。許多農民家庭窮得只能將家中的年輕女性賣給在鄉間游弋的皮條客，后者再把她們轉手賣給城里的妓院。盡管軍旅生活嚴酷，但總算是給鄉下小子們提供了唯一的棲身之所。那些較為聰明的在受到北一輝等人的煽動后，滑向某種天皇制原教旨主義，滿腦子都是什么民族純潔和宗教崇拜。

千余名軍人試圖占領東京市中心。大藏大臣 [‡](#_56)  被人刺死在自家臥室，同樣遇刺的還有內大臣 [§](#SS_7)  和隸屬統制派的陸軍教育總監。首相岡田僥幸生還，僅僅是因為叛黨錯將他的妹夫當成了他。東京市民拿到的宣傳單里熱情洋溢地稱贊叛亂者懷著一顆碧血丹心。

他們中的一些人或許被打動了，但裕仁天皇不以為然。他很明智地看出這起未遂政變本打算拿他身邊的當權派開刀。縱容滿洲的少壯派軍人也就罷了，但這類發生在國內的犯上作亂勢必要予以制止。海軍受命前來恢復秩序。有驚無險的是，叛黨未能殺進皇宮直接向天皇表忠心，因而未能鏟除他身邊的“奸臣”。2月29日，整件事告一段落，叛黨投降，朝綱重整，統制派如今牢牢地將施政大權攥在手中。

日本阻止了一場暴力革命，但是統制派進一步削弱了政府內部殘余的文官勢力。軍部要求新內閣的人事任命要得到陸、海軍大臣的批準。鑒于二者都得是現役軍人，軍隊就有了組建和解散政府的能力。立場相對溫和的外交官廣田弘毅升任新首相，但他對軍隊只能言聽計從，于是，他追加軍費，同納粹德國結成反共同盟。是年，另一樁奇聞將日本人的關注點從軍政大事上轉移開來。一位名叫阿部定的卑微藝伎在情欲大發之際勒死了自己的情郎。她被人發現在東京街頭徘徊，包里裝著情郎的陽具。

在華日軍再度變得蠢蠢欲動。廣田拿他們沒轍，他的兩位短命的繼任者也一樣。天皇身邊一干保守派臣子還未做好全面侵華的打算，因此期盼某位“自己人”能出面穩住局勢。近衛文麿公爵同裕仁是發小，定期和后者打高爾夫球。出身皇族的他修養良好，為人高傲，游歷廣泛，在軍中根基深厚，還結交了一些右翼知識分子，但不能據此就說他是戰爭狂，說他是反共急先鋒倒不為過，而且深受當時極端種族偏見的影響。同滿洲陰謀家石原莞爾一樣，近衛認為全世界會被卷入一場東西方之間的種族沖突。任何形式的自由主義都令他膽寒。他希望日本成為一個團結一致、摒棄內部矛盾的極權國家。你死我活的黨派斗爭和冠冕堂皇的絕對團結這對矛盾是東亞政壇亙古不變的一大特色。所有威權主義政體都會遇到這一惡性循環：二者總是相伴相隨。

盡管公爵在軍中人脈甚廣，但在約束侵華日軍一事上并不見得比前任更有能耐。同中國的戰爭實際上是不宣而戰，揭開其序幕的是1937年7月7日的“支那事變”（盧溝橋事變）。事情經過如下：一名日軍一等兵在北平的盧溝橋下小解完后，溜達進了所謂的非軍事區。一等兵并未離崗很久，但被認定失蹤，他的長官因此堅持要搜查該地區。中方提議聯合搜查，但被日軍指揮官認為是一種侮辱。戰事一觸即發，很快便蔓延至華北其他地區。

近衛似乎犯了難，他一方面想給中國人點顏色看看，“讓他們好自為之”——這是東亞人常說的一句話；另一方面，一場全面戰爭似乎又不是他想見到的。近衛在日記里寫道：“我已決心放棄中立，以求控制軍隊，拉攏民心。”鑒于政黨對軍人的所作所為已經無能為力，近衛出了個糟糕透頂的餿主意：他計劃用“大政翼贊會”這一準法西斯黨派替代碩果僅存的那些政黨，以起到動員公眾輿論的作用。隨著這一設想在1940年被付諸實施，大正民主最后一點可憐的印跡也遭遇滅頂之災。大政翼贊會壓根就沒想過要管束軍隊。

不過，在這一令人不快的局面來臨前，日軍先是于1937年之夏同蔣介石的精銳部隊在上海周邊展開了一場激烈廝殺。城市遭到轟炸，郊區的戰斗趨于白熱化，有二十五萬中國人在戰火中喪生，多為平民。在日軍實施某起大屠殺的遺址，一塊紀念碑這樣寫道：“血流成河，染紅了大海。”到了11月，更多日兵在杭州灣登陸。上海上空飄起一只氣球，用中文宣告百萬日軍已經登陸，通往蔣介石的國都南京的一場血腥征程就此開始。

\*\*\*\*\*

發生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殺無疑是日本人在二戰時犯下的最令人發指的暴行。有人將其同納粹屠猶進行對比，然而，這么做對于理解這起戰爭罪行的特性并無多大助益。這是一場屠城，而非有計劃的滅絕行動。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兵跟中世紀的征服者一樣，滿載著搶來的東西在街上橫行霸道。數以千計年齡不等的婦女在慘遭輪奸后被殺或致殘。成片街坊被付之一炬。成年男性和男童像牲口一樣被拴在一起，在機槍掃射之下跌入溝渠或長江。江岸邊堆滿了腫脹的尸體。日兵屠戮百姓常常只是為了尋開心，或是用作刺殺練習等令人毛骨悚然的游戲。屠殺持續了六周之久。面子上掛不住的日本外交官搜集了外國目擊者證言后呈遞給東京，希望高層出面制止事態發展，但全無回音。日本大使館毗鄰一座女子學校，外交官們想必能聽見女生被蹂躪和殘害時發出的慘叫。

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到底有多少中國人死于這場屠殺。據估計，死難者人數——這往往取決于各方政治觀點——少則數萬，多則幾十萬甚至三十多萬。東京戰爭罪法庭認定的罹難人數為二十五萬。但具體人數還不是重點，需要解釋的是日軍為何要對毫無還手之力的民眾痛下重手，手段還異常殘暴。倘若說大開殺戒的目的不是將每個中國人趕盡殺絕，那么緣何要實施這種空前絕后的奸淫擄掠的暴行呢？日軍在之前的對外戰爭中素以軍紀良好聞名，怎么這一回就突然軍紀敗壞至此呢？人們給出了許多解答：一說根源在于日本文化的病態和武士道精神等因素；又說這是一起蓄謀已久的恐怖行徑，發號施令者遠在東京，目的是迫使蔣介石政府屈服；還有說是吃盡苦頭的軍人產生了厭戰情緒，繼而大肆尋找發泄渠道。

東京政府下令屠殺一說的可信度似乎很低，彼時的天皇及其幕僚還很在意國際輿論。日本迫切需要從英美不間斷進口原材料和工業品。華盛頓的政策是保持中立，但是美國社會同情中國，這也是日本未對華宣戰的原因；追究某起“事變”似乎比較不易引發眾怒 [¶](#P_7)  。另外，一旦宣戰，按照所謂的中立法案，美國將被迫中斷與交戰雙方的貿易往來。這樣一來，戰爭物質的供給也會隨之中斷，這種情況對于日本和中國都是無法承受之重。要是美國公眾聞知日軍暴行而義憤填膺的話，對日本可一點好處都沒有。而且，日軍將領很快便意識到，大規模奸淫婦女只會換來中國人更加頑強的抵抗。為扼殺這一勢頭，日本陸軍省決定招募——或者更常見的情形是擄掠——朝鮮、中國和東南亞婦女，甚至一些歐洲女性，命她們在龐大的隨軍妓院組織里提供性服務，這些妓院亦名“慰安所”。

日軍的另一條軍規“不留俘虜”也成了大開殺戒的導火索。自登陸一刻起，部隊長官便向手下傳達指令，北上攻打南京途中抓獲的俘虜都要“處理掉”。一路上遭遇大小游擊戰無數后，日軍常對軍人和平民不作區分。已經在自己長官手里飽受凌虐，又在異國他鄉經歷血雨腥風，日本兵因此愈加粗暴。包括婦孺在內的所有中國人在他們眼里都是敵人，養活他們太煩，不如索性殺掉來得省事。

南京攻城戰的過程尤其慘烈。蔣介石決定棄守南京前，日軍被斃者無數。蔣的大批殘部和社會名流跟著他，倉皇越江，以避戰禍。大約五十萬滯留南京城的黎民百姓中，有不少是從鄉間逃來的難民和身穿便裝的軍人。接到上級打掃戰場的命令后，被勝利沖昏頭腦的日本兵根本無從區分平民和軍人。但凡手上有老繭的，都會被處決。

但是光這一點還不足以解釋南京暴行為何如此慘絕人寰。……光殺人還不夠，受害者死之前還必須受到非人的凌辱。這讓殺戮變得容易，因為受害者被奪去了人性。但這同時也是惡毒洗腦的結果。許多年來，日本人被告知中國人是劣等民族，自己則是神的后裔。對“支那人”的蔑視可追溯至明治時代。以甲午戰爭為題材的浮世繪將日軍塑造為身材高大、皮膚白皙和勇猛果敢的偉岸形象，而中國人則以膽小鬼和黃皮蠢貨的面目示人。具有沙文主義傾向的日本媒體如鸚鵡學舌般呼應政府宣傳，告訴軍人他們正在打一場“圣戰”。不管多么殘暴，以天皇名義所做的任何事都會因為事業的崇高性而獲得背書。東京的巢鴨監獄在戰后曾被用來關押日本戰犯，一位在獄中做過多次訪談的美國隨軍牧師總結道，戰犯們“堅信，任何與天皇為敵的人都是錯誤的，因此，他們越是殘忍地對待戰俘，就越能顯示出對天皇的忠心耿耿”。

南京大屠殺可能是最令人發指的單起暴行，然而在中國各地、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和緬甸還發生過難以計數的屠殺。似乎誕生自明治末期、由江戶末年的本土論和德國種族理論雜交而成的軍國主義妖孽，終于成為了可怖的現實。這是一連串人為決定和錯誤道路釀成的惡果，早在裕仁天皇即位前就已初露端倪。這也表明，日軍的指揮系統存在無可救藥的缺陷，體現在戰場上則是，當兵的可以忤逆長官，東京的低級軍官可以恫嚇將軍，軍令部的人可以騎在文官和廷臣頭上。

在東京，根本沒有跡象顯示發生了駭人聽聞的事。將領們因為戰功卓著受到了天皇的嘉獎。唯一一個對南京大屠殺流露出悔意的人是松井石根大將。國民政府首都被攻破時，松井擔任華中方面軍司令。南京大屠殺后，他主動辭職，剃度出家。戰后接受審判時，他稱大屠殺為“國恥”，即便如此，他還是被判處絞刑。實際上，松井的許多手下才是下達屠殺命令的人，卻從未伏法。

\*\*\*\*\*

就在天皇的軍隊在中國陷入泥淖，止步不前時，偽滿和蘇聯邊境上爆發的沖突愈演愈烈，大有失控之勢。關東軍的將領迫不及待地希望主動出擊，攻擊蘇軍，其中就有辻政信大佐，他在戰爭結束前惡貫滿盈。辻政信等多數皇道派成員力挺“北上”策略，希望通過占領東西伯利亞遏制蘇聯。荒木貞夫大將嘗言，如果蘇聯不停止滋擾日本的話，他就要“像驅趕屋里的蒼蠅那樣蕩平西伯利亞”。荒唐的是，這樣的人居然還在近衛文麿的內閣里擔任文部大臣。

“北上派”多具有陸軍背景，吸引了不少下層軍官。那些一心避免日蘇沖突、轉而“南下”的人多半是海、陸軍將領以及隸屬統制派的高級軍官。只有在掌握了東南亞豐富的自然資源之后，海軍才能養精蓄銳，為勢必要到來的太平洋戰爭做好準備。天皇無意同蘇聯開戰，且總體上偏向海軍的路線。可是，對于下一步該怎么走，根本無法達成共識：要不要同蔣介石媾和，撤出華北？是同西方消弭隔閡呢，還是準備好與之全面開戰？是否要和納粹德國走得更近？是增強陸軍實力呢，還是擴充海軍？該北上呢，還是南下？然而，正如常見的情況，東京再一次被占領滿洲的日本軍人牽著鼻子走。

1938年夏，位于朝、中、蘇邊境的一片潮濕多霧的草原上燃起戰火 [\*\*](#_57)  。蘇軍在圖們江靠近偽滿一側建立了軍事要塞，日本人決定試探試探對手。蘇聯人有轟炸機和坦克，這兩樣日本人都沒有，但他們擁有高人一籌的“斗志”。戰斗持續了兩周，雙方均傷亡慘重，日軍損失更大，卻寸土未進。天皇下令讓部隊停戰，但辻政信大佐不為所動，命令手下接著往下打。有斗志，就不怕打不贏。不出一年，配備燃燒彈、軍刀、野戰炮和部分輕型坦克的日軍在外蒙邊境上的諾門罕襲擊了朱可夫元帥麾下的蘇聯坦克兵團。兩軍在環境惡劣、蚊蟲遍布的平原上激戰數月之久，最終以日本人被屠殺而收場。放眼望去，日軍尸橫遍野，成了沙漠黑兀鷲的美餐。逾兩萬名日軍在饑渴、疫病和蘇聯炮火的夾擊下喪生。辻政信大佐不負眾望，獲得晉升，但“北上”方案就此作罷。自此，所有軍事行動都將“南下”。

注釋

[\*](#_50) 　國聯調查團肯定東北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主權屬于中國；主張中日兩國都以東北撤出武裝力量，中國東北由西方列強共管。——編注

[†](#_51) 　偽滿宣揚的“五族和諧”中的五族為“和韓滿蒙漢”，作者誤植為“日滿朝漢俄”。——編注

[‡](#_52) 　即財政部部長。——編注

[§](#SS_6) 　日本內大臣府的長官，負責輔佐天皇，掌管宮廷事務。

[¶](#P_6) 　這里喻指日本借“七七事變”一事，制造“征討”中國的口實。

[\*\*](#_53) 　即1938年7月末8月初爆發的“張鼓峰事件”。日、蘇兩國之間圍繞張鼓峰、沙草峰這兩個高地進行了一場軍事沖突。

# 第五章　與西方開戰

1941年12月7日，停靠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艦隊在日本魚雷和俯沖轟炸機的偷襲下損失慘重，聞訊后，天皇及其廣大子民欣喜若狂。裕仁為此特意身著海軍服，在廷臣筆下，陛下“滿面紅光”。《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一書作者林房雄聽聞這則消息時正在“滿洲國”旅行。他寫道，這種感覺“就好像卸去了肩頭的重擔”。詩人、雕塑家兼巴黎式波西米亞文化人的高村光太郎喜極而泣。文學批評家伊藤整，“感到自己仿佛一下子獲得了新生”。偷襲珍珠港之后，日軍繼而占領新加坡，入侵荷屬東印度，進據菲律賓……“亞洲解放圣戰”的開局真是再順利不過了。

目睹這一切的著名文藝評論家奧野健男總結道：

普通人對中日戰爭比較曖昧，知識分子更是斥其為侵略，可同英美的戰爭一開始，他們的態度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人人都擔心日本未來的運數……與此同時，人們心里卻又喜不自勝，我們總算贏了一回；英美這些個傲慢的大國，這些個白人臉上總算挨了我們一拳。隨著捷報頻傳，擔憂逐漸失色，恐懼化為自豪和興奮……一個來自落后國度的有色人種在面對發達國家白種人時的所有自卑感，頃刻間煙消云散……古往今來，我們日本人還從來沒有如此充滿民族自豪感。

這種描述大抵算得上是最貼近事實的說法。這么多年來，日本人被不斷提醒自己是傲慢西方的受害者，受夠了輕慢和冷落——不管真實與否——他們還要忍受屈辱，在西化課堂里扮演優等生，努力追趕物質優越的西方，遑論“文明開化”運動。所有這一切造成的羞恥感，都因為撲向珍珠港的俯沖轟炸機一掃而光。今時今日，全世界或許會像日本人待見自己一樣，待見日本人了吧。

1937年，最初的連戰連捷過后，越來越多的日本人對征華“圣戰”犯起了嘀咕。那時的日本戰爭片在反映普通士兵的疾苦上有著驚人的誠實。不過除了極少數個案外，鏡頭不會對準他們的受害者。戰時宣傳的重點很少落在刻畫敵人的丑惡面目上。影視作品歌頌自我犧牲和人人精忠報國的精神，深陷中國泥淖的可憐士兵和家鄉的親人都是電影謳歌的對象。中國戰場上，大小戰斗似乎永遠沒個完，絲毫無法振奮軍心，也未能取得迫使中國屈服的理想結果。政府似乎不知道下一步棋該怎么走。另外，關于亞洲新秩序的宣傳都建立在兄弟友愛和文化親緣性的基礎上，可只要日本還與亞洲同胞兵戎相見——不管他們和神圣帝國的子孫相比多么卑賤，總還是同胞吧——就會使這一論調顯得十分空洞。

直到和西方開戰前，東京一直是個很西化的地方。盡管有人大費周章地想用日語詞匯替代美國棒球術語，但這不妨礙人們投身這項運動。影院播放好萊塢電影，人們聽西方音樂——既有古典樂也有現代樂，閱讀西方書籍。德意兩國的音樂和書籍從未被禁。1941年至1945年，被從日本人生活中剔除的那個“西方”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西方”——即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自由派崇尚且試圖效仿的一切。日本的對外戰爭打著多重標簽，其中之一便是反自由主義。

政黨此時大都已噤聲，到了1940年則面臨被解散的命運，取而代之的是大政翼贊會，其作用是號召國民“一億一心”，上至軍令部，下至町內會 [\*](#_61)  最底層的會長（級別低歸低，作風無一例外都很專橫），概莫能外。國會選舉照常進行，但候選人幾乎清一色都是由大政翼贊會推舉的資質可靠的強硬派民族主義者。從小學開始，官方在每個機構都強推極端形式的天皇崇拜。一聽到天皇大名，人們就務必立正站好。大和精神成了一種準宗教崇拜。人們得知，克己、堅忍和奉獻都是日本人獨有的美德，因此才有了那么多反映時艱的戰爭片。堅忍的精神和強大的意志力會攻克一切物質難關。

種族純潔在德日兩國戰時宣傳中的地位可謂等量齊觀，盡管后者并未造成類似種族滅絕的后果。由于日本宣傳機器的正式標靶是自由主義——也就是個人主義、多元主義、物質主義、資本主義和民主——在對抗的西方思想方面，日本和德國其實是一致的。只不過在納粹眼里，猶太人是上述所有罪惡的化身，而日本人則被告誡要粉碎的是以丘吉爾和羅斯福為首的“盎格魯——美利堅鬼畜”——他們是漫畫里墮落頹廢、頭戴高帽的財閥。英語本身被認為是一種污染。戰時的一幅漫畫里，日本學生將所學的英語詞匯（“You are a dog［你是一條狗］”）扔進垃圾桶；一旁的母親擺出一副神道教神官的模樣，在周圍撒上凈化用的食鹽。

經歷了近百年的西化運動，日本人如今又旗幟鮮明地變回了亞洲人。帝國軍隊通過“圣戰”將白人趕出亞洲，但光這還不夠，還要將亞洲人頭腦中的一切西式自由主義思想殘余清除殆盡。這種全新的亞細亞主義很像是明治早年間跳華爾茲舞、打惠斯特牌的名流身上的西化做派，既緊張，又不自然。知識分子和軍隊宣傳家混用諸如“克服現代性”和“超越西方”等辭令，似乎二者是一回事，而日本的全套現代化方案必須推倒重來。我們不難理解亞洲自豪感這一自我膨脹的觀念為何會具有強大的感召力，作為所有亞洲人的哲學和政治導師，日本充分地體現了這種自豪感。然而，日本建立的新秩序盡管部分地迎合了18、19世紀的極端本土論，但就像大正時期知識分子所推崇的馬克思主義一樣，這一傾向也受到了西方思想的洗禮。日本的新秩序大體上源自歐洲的法西斯主義，而后又被嫁接到東亞人的思維習慣上。

然而，納粹德國和日本并不一樣。在德國，國家社會主義是一種革命思想，踐行它的是一個民粹政黨。軍隊、宮廷、商界、官僚系統內的日本精英運用的則是法西斯手段，以強權穩住一項總有脫韁之勢的事業。以東條英機大將為代表、有天皇撐腰的軍中統制派試圖牢牢壓住激進的皇道派，以免爆發革命。希特勒及黨羽早在上臺前就對世界格局有了宏大的規劃；反觀日本精英，除了都反感自由主義——不論其形式如何——似乎只是在將各自的政治信條拼拼湊湊，為一連串無休無止的既成事實提供背書。此外，他們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早在珍珠港事件前夕就已看清一件事：日本走上了一條自取滅亡的不歸路。

\*\*\*\*\*

既然如此，那為何還要一意孤行呢？山本五十六大將曾警告近衛首相，日本成功對抗美國的時間不會超過一年，那么他又中了哪門子邪，居然同意偷襲珍珠港的方案？需要重申的是，可能性最高的解釋并不是像德國進攻蘇聯那樣，是奉了“元首的旨意”，反而是因為日本政府最高層太弱勢，甚至是失靈了。假使說熱衷于與西方開戰的人寥寥無幾的話，那么或許除了天皇外，有能力或有意愿制止戰爭的人連一個也沒有。

最終攤牌之前的鋪墊始于1940年1月。美國“出于國防利益考慮”，停止向日本出售航空燃料和廢金屬。日本人明白，此舉將使他們在中國的駐軍難以為繼。美國人對此也心知肚明，所以才會有這項新政。這之后，美國又頒布禁令，規定不得向日本出口任何品級的廢舊鋼鐵。日本該如何抉擇，眼下已經很清楚了：要么從中國撤兵，要么挺進東南亞，攫取當地的原材料。鑒于軍事控制中國被認為對日本的國家存亡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選項一斷無可能。德國那時已入侵法國，日本于是破釜沉舟，加入軸心國，自絕于美國。1941年7月，日軍占領南印度支那 [†](#_62)  。英、美、荷三國決定對日實施石油禁運。慣于操持受害者論調的日本報紙宣稱，日本的生命線被“ABCD”四個大國扼住了：A代表美國，B代表英國，C代表中國，D代表荷蘭。

日本此時仍可撤出中國，但時任戰爭大臣的東條大將表示“部隊駐華一事不存在妥協余地……”。部隊沒了油便寸步難行，這就意味著日本要動荷屬東印度的腦筋了，那里石油儲量豐富。當然，還有另外一條路可走。出主意的是海軍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大將，他在美國宣布石油禁運前五天指出，留給日本的時間不多了，海軍每天要消耗四百噸石油，因此務必即刻對美發動打擊，這樣才有最大的“勝算”。只要日本占領了菲律賓，海軍鐵定能控制太平洋。

永野大將的想法相比其同僚還是超前了些。不管是天皇、東條，還是近衛，誰都不想與美國為敵，起碼眼下還不是時候。當時的決定是，一邊進行外交斡旋，拖延時間，一邊為可能爆發的戰爭做好準備。日本再三向華盛頓方面陳情，只要以令日本滿意的方式解決“支那事變”（盧溝橋事變），并解除對日經濟制裁，日本就會撤出印度支那。或者，只要日本獲準在華駐軍，以確保地區安全，就會考慮同中國議和。再或者，只要恢復原油供應，日本就將承諾不再進犯東南亞其他地區。所有這些提議都未能獲得積極答復。現在該怎么辦？日本領導人決心等到10月，美國人屆時若依舊無視日本的訴求，那戰爭就在所難免了。

10月到了。近衛延請陸、海軍大臣，外務大臣，以及企劃院總裁鈴木貞一赴其私人官邸密會。鈴木將軍在五年后的東京審判時曾談及這次意義重大的會談：“這次會議過后，癥結所在已經明朗化了。海軍打心底里認為與美開戰必敗無疑，只是不愿公開表態。陸軍未必真想打仗，但又極力反對從中國撤軍。外務大臣堅定地認為，不答應從中國撤軍，與美國的交涉斷無希望成功。因此，首相若想避免戰爭，僅存的辦法要么是讓海軍正式公開其真實想法，要么是讓陸軍理解海軍未經聲張的意圖，并同意撤軍。我看得出首相很為難，因為從他個人來講，他覺得自己無力說服海軍或陸軍。” [‡](#_63)

換言之，沒人覺得自己有能力為一項一以貫之的政策擔責。首相對軍隊無計可施，陸、海軍大臣則樂見局勢隨波逐流。日本人即將為摧毀文官政府的權威付出最終代價。政治學者丸山真男在解釋日本之所以會大難臨頭時，認為這是自上而下不負責任而導致的順理成章的后果。他分析道，天皇就像一尊神轎，人們扛著他的時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將去向何處，只會被動地對命運的起伏作出回應。政治仿佛天氣一般：一會兒這里刮起暴風雨，一會兒那里放了晴，接著突然又來了一場可怕的地震。“神風”這個詞——意即“神圣之風”——本來指的是13世紀一種自然現象，當時蒙古侵略者的艦船在海上遭遇臺風，撞上礁石后全軍覆沒，但從此每當面臨危難關頭——比如1853年佩里率部前來，或者1944年美國連戰連勝——日本領導人都會祈求一股神風拯救日本于水火。既然沒人需要為不時將日本城市夷為平地的地震負責，同樣，也就沒人覺得自己要為與西方開戰負責。天皇或許除外，但話說回來，他也不過是一尊神轎罷了。

鈴木將軍講述的近衛官邸密會的經過是否準確，我們不得而知。畢竟，部分軍界人士可是巴不得開戰。丸山教授的分析或許有些過于化繁為簡，可是，日本自上而下不負責任這一點并不存疑。正是因為缺少政治上的問責，才會輕易將幾億人的命運歸咎于人類——或者至少是日本人——控制不了的因素，歸咎于“必然的歷史力量”這種抽象概念，歸咎于“ABCD”四大國扼住了日本的命脈，或者干脆歸咎于美國人的所作所為，譬如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于1941年11月26日遞交給日本駐華盛頓大使的那份著名的備忘錄。那時，近衛已卸任首相之職，接替他的是兼任戰爭和內務大臣的東條英機。

赫爾的備忘錄是一份“相互政策聲明草案”。美國要求日本撤出印度支那和中國，但沒有規定時限，對撤出中國的哪部分領土也未作說明。備忘錄沒有提及偽滿或朝鮮。東條將軍向內閣談起這份備忘錄時的語氣就好像這是一份最后通牒，但其實不然。實際上，倒是日本人給華盛頓下達了最后通牒。美國要是在11月15日之前解除對日經濟制裁的話，日本愿意模糊其詞地承諾一旦中國“恢復和平”，就會在“適當的時間段內”撤軍。反之，日本就將開戰。赫爾的備忘錄只是提供了口實，偷襲珍珠港的計劃早已制定完畢。海軍轟炸機正在鹿兒島海灣上空一遍遍地進行空襲演練。對此事疑慮重重的山本五十六大將把計劃捋了一遍，務求落實到最小細節。同別人一樣，他也希望一次毀滅性的打擊會使美國人在談判桌前硬氣不起來。只要展現出大和精神，就一定能讓腐朽墮落、貪圖享受的美國人變得識趣。至于要是行不通的話，東條將軍有言：“有時候人就得閉著眼往下跳。”

\*\*\*\*\*

盡管日本人從未制定過種族滅絕的政策，但他們在亞洲的“圣戰”卻異常殘暴。戰俘飽受摧殘，經常活活累死。東南亞奴工的處境甚至還不如西方戰俘，幾十萬人在鋪鐵路或從事其他苦役的過程中死于口渴、饑餓和凌虐。日本人的細菌部隊還在中國人和部分歐洲人身上進行恐怖的醫學試驗。來自朝鮮、中國和南洋的婦女和少女被脅迫在慰安所提供性服務；許多人因此喪命，幸存者往往落下終身殘疾，有的則要一輩子活在傷痛中。在中國、新加坡、馬來亞、菲律賓、緬甸等地還發生了屠殺平民的事件。日本的軍警“憲兵隊”是20世紀最心狠手辣的機構之一。

“圣戰”讓日本人也吃足了苦頭。國內食品日漸短缺，偷襲珍珠港前一年，大米就已實行配給制。肺結核在日本的致死率本已很高，20世紀30年代末為年均十四萬起死亡病例，到了1943年更是攀升至十七萬。町內會頭頭等好事之徒向特高課或憲兵隊打小報告，揭發任何“投降派”或“反國體”言行。家里人有在美國的，或者自己曾旅居美國的，不分青紅皂白就會被當成“間諜”遭到逮捕。只要舉止有一丁點“像外國人”的嫌疑，就足以成為秘密警察整你一頓的理由。婦女們無奈穿上土氣的“本土的”裙子，孩子被教育像軍人那樣“玉碎”。對于軍事化生活的高壓和清苦，日本國內怨言日增，但是官方告誡民眾要懷著光榮的大和精神，克服對戰前自由舒適生活的最后一點點留戀。

日本軍國政府對內對外的殘暴行為因為一套和平與友愛的宣傳而更顯邪惡。《國體的本義》曾誓言日本會將全世界聚攏在天皇的屋檐之下（即所謂的“八纮一宇”）。1940年，日本加入軸心國時，天皇頒布手諭稱：“‘為世間求公理，使天下成一家’是皇家世代相承的祖訓，吾輩必不分晝夜，銘記在心。”近衛首相在同年表示：“日本國家政策的根本目標在于遵照‘八纮一宇’的崇高精神，堅定不移地締造世界和平……”1942年，東條將軍稱，全新的亞洲秩序將建立在“道德正義的基礎上”，“日本處于核心位置”。

1943年，“大東亞共榮圈”所有國家的代表齊聚東京，參加“大東亞會議”。南京偽政府主席汪精衛來了，與會者還有菲律賓的何塞·勞雷爾（JoséLaurel）、緬甸的巴莫（Ba Maw）和孟加拉民族主義者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會上，各國莊嚴承諾將尊重國家獨立和民族傳統。代表們合影時，東條將軍站在中間，笑容可掬，活像慈祥的一家之長。會后發表的官方聲明如下：“《大東亞宣言》清晰道出了所有亞洲人民的集體愿望，大東亞共榮圈完全立足于公理之上，旨在對抗英美的盤剝、侵略以及唯我獨尊的自我中心主義。這是偉大的一課，其意義將為全世界人民所共知。”

日本人知道，光倚重軍事力量是建立不了東亞帝國的，因此他們除了承諾幫助亞洲人擺脫西方殖民壓迫、實現民族解放外，還輔以一種獨特的、普適的日本本質論。言下之意，就是主張輸出獨一無二的日本精神，以期啟蒙和開化他國。日本的宣傳家似乎在努力扭轉文化傳播的進程。幾個世紀以來，日本從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汲取養分，如今輪到日本來迫使他國接納日本文化了。明治時代的理想主義者大談日本是西式現代化之師，從中學到的教訓現已明確打上日本的烙印。帝國境內，神道教神社遍地開花。朝鮮人和臺灣人被迫給自己取了日文名。教科書向一代印尼、緬甸和菲律賓學童灌輸武士道精神——當然，效果不彰。既然是獨一無二的，那就是無法輸出的。多數亞洲人根本無意成為日本人，就連那些曾經視日本人為解放者和老師的人，在目睹日軍使用暴力播撒天皇福佑后，也改變了想法。

\*\*\*\*\*

與此同時，美國人正步步逼近日本本土。日本軍隊內部的派系與機構之爭，以及指揮系統一貫的混亂不清，讓日本的對外戰事亂成了一鍋粥。但就算統領日本的是一群軍事奇才，這場戰爭日本也打不贏。美國能生產更多飛機、戰艦等必要物資，且比日本更快、更高效。維持在華駐軍就已經讓日本勉為其難，再想守住東南亞和太平洋的陣地更是斷無可能。日本什么都缺：石油、戰斗機飛行員、食品，只有人不缺，但在本土也開始遭受轟炸后，連這一資產也成了“速耗品”。

1942年，瓜達爾卡納爾島被攻占，塔拉瓦島于次年淪陷；到了1944年，先是夸賈林環礁易主，之后萊特島、呂宋島、關島、塞班島也相繼宣告失守。最后失陷的是硫磺島，B-29轟炸機從這里起飛，可以輕而易舉地飛抵任何日本城市，繼而將它們一個接一個地變成一堆廢墟。一名日本軍官曾賦詩一首，描述戍守瓜島的日子：

一摔倒就渾身是泥，

傷口汩汩地滲出血來。

沒有布包扎傷口，

蚊蠅就在結痂處打轉，

無力將它們驅走。

倒地后便無法動彈，

多少次，我想要一死了之。

一旦被俘，所有日本兵都被要求“玉碎”，自我了斷。平民也不例外。到了1944年，日本領導人認清了形勢：這場戰爭靠常規手段是打不贏的，但頑固派堅持己見，強調即使所有日本人都要死，“國體”也不會亡。日本絕不可以投降。如此一來，一項本屬于武士階層的古老特權成了全民義務。美軍登陸塞班后，婦孺在威逼下跳崖自盡。在沖繩，罹難平民人數多達十七萬。數以千計的人被趕入美軍機槍火力網，為日軍擋子彈。還有避難者被迫用剃刀或匕首——如有必要甚至可以徒手——殺死家人后自殺，好為當兵的騰地方。東京、大阪、福岡火光沖天，十幾萬條生命在人為制造的大火中灰飛煙滅。即便是這樣，統治精英依然將日本的窮途末路（Götterdämmerung）歸咎于普通民眾的意志力和忠誠度不夠。

老師命學生給前線軍人寫信，盼他們“光榮戰死”。到了1945年，軍隊的“玉碎”策略儼然成為一項舉國方針。海軍中將大西瀧治郎是“神風特攻隊之父”，他在日本戰敗后自殺身亡。被強征入伍的往往是就讀于一流學府的青年，“自愿”以死來弘揚“大和魂”。為了配合自殺式任務，還專門制造了潛艇和戰機。實際上，盡管只有三分之一的自殺式戰機最終撞上目標，但這種戰法對美艦傷害不小，造成了慘重的傷亡。不過，哪怕是大西中將自己，恐怕也不會真的認為靠這樣就能贏得戰爭。借一位政壇元老的話來講，他大概希望這種非常戰術能創造一種“更有利的戰局”，迫使敵人就范。神風特攻隊的預期效果固然致命，但也不乏戲劇色彩：這標志著一種特殊的“日本性”從對外的咄咄逼人蛻變為純粹的自我毀滅，其種子播撒于江戶末年，到20世紀30年代末已成為舉國病態。

有一個人，也只有一個人可以提前結束這一切苦難，此人便是天皇。他的戰爭內閣在制定決策時必須一致通過，否則政府就會解體，而在商議終戰這一重大事宜時，裕仁的愛卿們根本無法達成一致。1945年5月，杜魯門重申盟國立場，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后由盟軍扶植民主政府，取代軍國主義政權。包括前駐日大使約瑟夫·格魯（Joseph Grew）在內的美國國務院內一批“知日派”主張保留天皇制，但事與愿違，杜魯門并未做出上述承諾。由于皇權是“國體”的最高神龕，天皇同手下將領一樣，并不急于答應無條件投降。

1945年6月，一枚炸彈擊中東京皇宮。或許這件事促使天皇定下心來，又或許令人焦心的報告迫使他全神貫注。據悉，他的臣民正變得躁動不安。當天皇出現在東京市中心，迅速視察燒焦的廢墟時，他震驚于人們在空襲過后竟然對他毫無敬畏心——現場的氣氛很是冷漠，甚至帶有敵意。這時的日本首都和幾乎所有大城市一樣，已是斷壁殘垣，一片狼藉。老百姓造反的苗頭暫時沒有，但不能據此認定毫無可能。前首相近衛文磨陰郁地警告，稱日本可能會爆發共產主義革命，而這對“國體”的威脅比盟軍勝利還要大。

于是，天皇決心在不危及自己神圣統治權的前提下謀求和平。他向斯大林示好，看蘇聯人是否愿意媾和，但日本開出的條件太過模糊，再說也太遲了，蘇聯人不為所動。日本一邊不斷遣特使赴莫斯科斡旋，一邊嚴整戰備，決心殊死一搏。日本的軍工業已是茍延殘喘，卻仍在加緊生產人體魚雷、自殺式戰機、人體火箭彈和用來與侵略者同歸于盡的“特別攻擊艇”。

7月的波茨坦會議上，杜魯門告訴斯大林他手上有“具備罕見毀傷力的新式武器”。斯大林早就通過手下特工得知此事，因此皮笑肉不笑地預祝美國人試驗成功。杜魯門、丘吉爾和蔣介石共同簽署《波茨坦公告》（Potsdam Declaration），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公告依然未對保留天皇制給出任何保證，但是盟軍承諾會“根據日本人民自由表達的意愿”建立政府。一些日本人，譬如外務大臣東鄉茂德，認識到這是日本所能指望的最好結局。然而，倘若堅持接受盟軍的條件，東鄉與志同道合者就會因為“投降主義言行”淪為階下囚。最高指揮部依然堅定不移地想要血戰到底。原海軍大將、首相鈴木貫太郎做了一件日本領導人過去常做的事：對局勢聽之任之。《波茨坦公告》被當成一紙廢文，日本的大決戰戰備繼續進行。到8月6日，杜魯門將他的特殊武器投在廣島。須臾之間，十萬甚至更多的男男女女和兒童命喪黃泉。兩天后，蘇聯出兵攻打“滿洲國”。廣島原子彈爆炸過去三天后，長崎也遭遇了滅頂之災。

當晚，在遭到長崎原子彈爆炸這一消息的重創后，天皇在一座密不透風的地堡內召開了最高戰爭指導會議。與會的六名成員身穿軍裝，汗如雨下，天皇則僵坐在一面鍍金屏風前，聽他們陳述各自的看法。要是對接下來的對策無法達成共識，政府就將解散，并且還會有更多的人為此喪命。接下來上演的，是神秘主義政治生態的一曲荒誕絕唱。所有人一致贊同“國體”應得到維系，但對于這一抽象概念究竟有何含義，卻又意見不一。在外務大臣東鄉眼中，天皇制的模板應該是世俗的立憲君主制，是大正時期杰出法學家美濃部達吉口中的“國家機關”。可是，東鄉的海、陸軍同僚認為天皇特權神圣不可侵犯，他的統治權不容染指。再者，陸軍大臣無法接受盟軍駐日，更別提設立什么戰爭法庭了。

事到如今，經歷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對外戰爭的日本面臨著“全員玉碎”，而左右一切的卻是日本政體內涵這一根本性問題。這關系到上百萬美國人、中國人、歐洲人、東南亞人和日本人的生死。鈴木首相是個行事曖昧的老派“和事佬”，他把決定權拋給天皇。天皇依然在憂慮其神圣皇權會否不保。要是敵人在伊勢灣附近登陸的話，兩座最重要的神道教廟宇將會落入敵手，那里可存放著神圣的皇家器物。據天皇事后回憶，見此情形，想要保住“國體”怕是很難了，他于是做出“神圣裁奪”，決定接受盟軍的條件。

8月15日，數以百萬計日本人生平第一次從收音機里聽到天皇的玉音放送，許多人是跪在地上哽咽著聽完的，但他一口正式的宮廷腔讓不少人如墜云霧。終戰詔書的措辭和大東亞宣傳的內容十分接近。天皇做出投降的決定，不光是為了杜絕“敵方最近使用殘酷之炸彈”再被使用，還因為“朕欲忍所難忍，耐所難耐，以為萬世之太平”。

天皇還有很多話沒說出口，他對蘇聯入侵日本的威脅只字未提，也閉口不談對國民造反的擔憂。在許多日本人眼里，終戰和戰爭都是天意。但諸如此類的天意一樣能被人濫用。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同是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成員，他在1945年8月12日曾坦言：“依我之見，盡管用詞可能不當，但是原子彈爆炸和蘇軍參戰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神賜的禮物，唯有這樣我們才不至于說日本退出戰爭是因為國內形勢所迫。”

日本滿目瘡痍，國內局勢今非昔比。除開數百萬條葬身戰爭殘骸之下的生命外，一種對日本的觀念——它既現代又古老，既西化又本土，既毀滅他人又自我毀滅——同樣也被埋葬了，但愿是永遠。然而，之后的歲月里，這一觀念還會蘇醒——是回光返照，還是隱隱說明其生命力強韌？或許現在下結論為時尚早。

注釋

[\*](#_58) 　町內會是日本市町村之下的基層自治組織。

[†](#_59) 　印度支那，亦稱中南半島或中印半島，指東南亞半島，東臨南海，西瀕印度洋，因位于印度與中國之間，而被近代歐洲人方便記憶式命名。——編注

[‡](#_60) 　此處援引自丸山真男的《現代日本政治中的思想與行為》（Thought and Behaviour in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69年版），由伊凡·莫里斯（Ivan Morris）編輯后出版。——作者注

# 第六章　東京布基伍基

1945年8月30日，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專機飛抵橫濱附近的厚木海軍航空基地。走出機艙，這位盟軍最高司令官（SCAP）在舷梯駐足片刻，一只手插進褲子的后兜。他緊了緊叼著玉米煙斗 [\*](#_73)  的下巴，透過飛行員墨鏡掃視了一遍這片被征服的土地。這是麥克阿瑟的標志性動作，雖顯得漫不經心，不怒自威，但其實經過反復排練。將軍還換著角度，輪番擺了幾遍這個姿勢，以便所有攝影記者都能拍到一張質量絕佳的照片。

我們不可能清楚最高司令官此時此刻在想什么，但是從他在澳大利亞飛往日本的漫長航班上所做的長篇大論來看，他深感自己肩負使命。麥克阿瑟不是日本通，實際上，他對日本知之甚少。但他自稱受到了喬治·華盛頓、亞伯拉罕·林肯和耶穌基督的指引，前來幫助這個蒙昧的東方國度擺脫奴役和封建主義，并將其人民改造為熱愛和平的民主主義者。這將是自明治維新以來最激進的一項改革，是西方世界迎來的一縷新曙光。不過這一回，師從的楷模不再是德國，而是美國，也只能是美國。從官方層面上講，占領日本是蘇聯在內的所有大國的集體行為，可事實上，從一開始這就是美國人的獨角戲。

最高司令官履職的時間，恰逢佩里率黑船來襲約一百年后。彼時，“胸懷四海的揚基民族”（反正佩里是這么覺得的）也是前來照亮日本之混沌的。佩里的旗艦波瓦坦號上裝備的火炮確保了日本人領會其用意。日本正式投降時，人們沒有忘記作為先行者的佩里。他的軍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存在位于安納波利斯的美國海軍學院，為了配合密蘇里號戰列艦上舉行的投降儀式，又被專程運至日本。舊軍旗升了起來，麥克阿瑟這位蹩腳的演員滔滔不絕地大談自由、寬容和公正。過后，一千五百架美國海軍戰斗機和四百架B-29轟炸機呈密集陣列，從上空呼嘯而過。

日本帝國的陸軍和海軍就此解散，剩余的軍用品和物資不是被銷毀，就是流入黑市，成全了人脈寬廣的日本黑幫、政壇掮客和右翼政治家的事業。然而，解散日本軍隊只是開了個頭，政治體制有待改造，財閥正聽候發落。另一方面，日本官僚機構基本保留了原班人馬，以便貫徹最高司令官的改革措施。不同于德國，管理日本的是日本人自己，最高司令官及其部屬更像是操縱木偶的人，往往在暗中活動。1946年，日本舉行全國大選，表面上，管理這個被占領國度的依然是日本人自己的政府，可后者處處要視最高司令官的獨斷眼色行事。就這樣，戰前、戰時和戰后日本之間的重要聯系保留了下來，其效果不見得都是積極的。

不過，最高司令官的使命可比政改宏偉深遠得多。日本文化本身，以及幾千年來日本民族形成的一整套思想，都必須像拔除毒草一樣，得到整頓、清理和重塑。在這件事上，最高司令官仰仗身邊一干保守派隨從為他出謀劃策。這些人自豪于對“日本人心理”的把握，大都思想保守，認為日本是個幼稚民族，若不嚴加管束，極易行野蠻之事。盡管并非所有幕僚都與他同心同德，但麥克阿瑟視培植民主為己任，而要實現這一點，光講政治是不夠的，他自視為日本人靈魂的改造者。

1951年，麥克阿瑟在講話中指出，從現代文明的維度來看，日本人就像是十二歲的小孩子。這很符合他一貫的思想。麥克阿瑟做出上述表態的場合是在美國參議院聯合委員會，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當時的背景。他對比了日本和德國后得出結論，德國人是個“成熟的民族”，日本人則仍處于“欠管教狀態”。德國有著和其他西方國家一樣高度發達的科學、文化和宗教。對于德國社會里的納粹遺毒，清除干凈即可，無須殃及德國文化，畢竟這種文化孕育了路德、貝多芬和歌德。納粹政權是德國文化變異的結果；其領導人主宰世界的目的昭然若揭，手段殘暴，但沒必要因此把德國當成化外之邦，給他們上課。（麥克阿瑟說這話可不是恭維；在他看來，德國人只會比日本人更卑劣，因為他們本應明曉事理。）相反，日本人則表現得像一群幼童。按照麥克阿瑟的認識，他們“誤入”軍國主義歧途，是因為心智不全。這句話的潛臺詞是，既然日本人心智不全，那么經過堅定不移的引導，外加循循善誘，他們是具備棄惡從善的可塑性的。

19世紀50年代，佩里中將也對日本人的心理有過些許思考，并在海軍部向上級做報告時陳述如下：“我很清楚，我越是擺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越是盛氣凌人，這些重外表和儀式的人就會越發尊重我。這也正是我報告的主旨，時間會證明這一結論的正確性。”最高司令官的看法與佩里如出一轍。從抵達厚木海軍基地、走出機艙時起，到1951年離開日本，他除了在極正式的場合面見過天皇等要員外，很少與日本人接觸。最高司令官冷漠離群，擺出一副近乎荒唐的高高在上的姿態。他既對“臣民”夸夸其談，發號施令，又和歷史上的日本統治者一樣，保持著與“臣民”的疏遠感。這位偉大的民主老師和天皇本人一樣不容指摘。

日本人察覺到了二者之間的相似性，但又不得不對之緘口不談。1946年，東京的某位歌舞表演者唱了一首歌，歌詞包含下面這句：“人人高談民主，但一國有二皇，民主從何談起？”最高司令官的屬下接到線報后，這首歌就被禁了。再比如東京的一家歌舞伎劇場，某位名伶的精彩演出引得滿堂喝彩。“江戶（東京）第一！”某人叫道。“日本第一！”有人跟著起哄。“麥克阿瑟將軍！”又有人大喊。劇場里頓時鴉雀無聲，因為沒人還能想得出比這更高的形容了。除了“太上皇”麥克阿瑟外，日本還有一位天皇，但在劇場里喊他的名字一來十分不妥，二來日本人也明白如今最高司令官才是“大統領”，而不是處在將軍卵翼之下的裕仁。天皇自己也是美國人的學生，正被塑造成日本轉型的象征。在某些人看來，他依然在位這點襯托出美國人的智慧，說明最高司令官對日本人的心理洞若觀火。而對包括許多日本自由派（日本戰敗意味著他們重獲自由）在內的其他人而言，這卻是最高司令官最大的敗筆。

\*\*\*\*\*

占領早期，“封建主義”成了概括日本文化一切弊病的關鍵詞。占領軍相信，歌舞伎充斥著封建思想。出于某些原因，他們對于樸素高雅的能劇與膾炙人口的文樂木偶戲的看法則不那么負面。表現武士忠臣和自殺場面的歌舞伎作品不是暫時被禁，就是面臨嚴格審查。8世紀的神話故事集《古事記》也遭此厄運，原因是其中收錄了一些對古代天皇歌功頌德的傳說。此外，神道教中具有神圣地位的富士山也被視為封建思想的有害象征，電影里出現的富士山片段因此被剪掉。至于武士片，自然只能被取締。

在向一代學生宣傳日本皇室是神的后裔、為天皇捐軀無比榮耀之后，老師們如今接到的指令是另起爐灶，講授“民主”的好處。鑒于新版教科書來不及馬上付印，舊版教材得以沿用，只是里面妨礙視聽的段落須用墨水涂黑。這個法子還被用來處理印有戰艦等日本軍事裝備的圖片。

日本人被灌輸“民主”的方式，就好像他們從未聽說過這個概念。簡單說來，這一過程可用三個S來形容，分別為sex（性）、screen（銀幕）和sport（體育運動）。作為“民主運動”的棒球得到大力提倡。過去，日本男女在公共場合從不牽手，遑論接吻，如此封建的兩性關系讓美國老師憂心忡忡。戰前的好萊塢大片里但凡出現接吻鏡頭一律免不了被剪，于是，占領當局下令，今后拍攝的日本電影要有吻戲。第一部試水的影片是《二十歲的青春》，公映后引發了熱潮。某位熱情洋溢的占領軍軍官靈機一動，主張通過跳交誼舞這一絕妙的辦法幫助日本人擺脫封建思想，繼而又在部分農村人口中推廣這一新鮮事物。

美國人嘗試給日本帶來民主的做法既高度理想化，又十分天真。理想主義向來是虛偽的溫床。盡管日本人被教育擁有言論自由，但批評占領當局政策卻是一個禁區。漫畫家不得發表諷刺最高司令官的作品。他手下的官員一心想要將美國和美國人樹立為道德和誠信的典范，哪能容得下唱反調的觀點。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小說《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因為反映美國的貧困問題在日本被列為禁書，以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為題材的書籍和影視作品同樣遭到封殺。一方面，當局大力提倡日本人接吻、牽手、跳舞，另一方面又對表現美國大兵和日本姑娘談情說愛的照片“零容忍”。但既然美國人“崇尚言論自由”，那么占領當局的查禁制度也是提不得的。

美國文化帶來的啟發也只有在非官方推行（也就是日本人自愿接受時）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用。經歷了將近十年的文化貧瘠和軍事宣傳后，多數日本人對任何外來的或“帶勁兒”的事物均如饑似渴。戰時，“反映個人幸福”的電影斷不能在日本上映。如此說來，比起高屋建瓴的“民主”課程，格倫·米勒（Glenn Miller）和貝蒂·格拉布爾（Betty Grable）對解放日本人做出的貢獻更大。自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以來，人們還從未如此癡迷于“色情、獵奇和無意義”（ero guro nansensu）：脫衣舞受到熱捧，印有美女招貼畫的雜志行銷一時，它們有著諸如L’Amour（法語：愛情）、Liebe（德語：愛情）、“夜總會”或“新自由派”等有色情意味的名字。同時，上百萬人饑腸轆轆，流離失所，孤兒只能在火車站過夜。不過，要說1948年最轟動的事，莫過于一首名為《東京布基伍基》（‘東京ブギウギ’） [†](#_74)  的金曲，歌詞大意如下：

東京布基伍基，

真帶勁，喔唉喔唉，

我的心撲通撲通、啪嗒啪嗒跳個不停，

全世界的歌，這首歡樂之歌，

東京布基伍基。

縱然最高司令官手下的清教徒官員一度下令禁止“同當地人員親善”，還是有日本人主動接近美國駐軍。開風氣之先的是人稱“潘潘女”（pan-pan girls）的業余或職業妓女，她們與大兵“親善”，換取絲襪、錢、吃的，或僅為一個睡覺的地方。“潘潘女”的攬客場所一般選在被焚毀的公園，或滿目瘡痍的市中心濕漉漉的彈坑里。她們一身廉價的冒牌美國行頭，模仿好萊塢明星的舉手投足。既招人羨慕、又背負罵名的“潘潘女”是戰后日本率先接觸美國商業文化的先驅。與之類似的還有兒童，每個美國大兵身后都能看到他們奔跑的身影，為的是討要巧克力和口香糖。美國人倒也慷慨，一般會開著吉普車，穿梭在廢墟之間，分發這些物品。

厭惡美國流行文化的知識分子在法國文學中尋找寄托。部分老于世故的文人身上透著一種精致的虛無主義情懷。馬克思主義殺了個回馬槍，很快便重新占領大學校園以及東京和京都的咖啡館。然而，不論其形式如何及以何面目示人，文娛創作在占領期間蓬勃發展，欣欣向榮。哪怕依舊面臨雜七雜八的查禁制度，但時局與軍國年代那種令人窒息的限制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語。日本人在擁抱思想和藝術自由一事上無需教導或慫恿。

文化其實只是一道掩人耳目的幌子。日本問題的根源同歌舞伎或富士山無涉，主要還是出在了以天皇為中心的“國體”身上。這一神圣體制為踐踏公民自由大開方便之門。

對維持“國體”的狂熱關切阻礙了包括裕仁天皇在內的戰時領導層在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前承認戰敗。部分美國人，尤其是對日本人心理有研究的保守派專家，主張盟軍應在這點上予以妥協。舉例而言，戰前美國駐日大使約瑟夫·格魯便希望盟軍給出維系日本皇室血脈的承諾。但也有人——往往是秉持自由立場的人——堅信這一做法將使任何試圖理解現代日本軍國主義根源的努力化為泡影。兩派之間的矛盾一直延續至麥克阿瑟主政期間。彼時，占領當局分為擁護羅斯福新政的自由派和強硬右派。多數“新政派”成員同麥克阿瑟一樣，滿懷一腔抱負，但不怎么了解日本。右派則認為自己比前者更了解日本，他們中的一些人有德國血統這一點恐怕純屬巧合。情報系統掌門人查爾斯·威洛比將軍（Charles Willoughby）便是一例，他原姓魏登巴赫（Weidenbach） [‡](#_75)  。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東久邇宮稔彥王 [§](#SS_9)  曾臨時執掌日本政府兩個月。他資質平平，和皇室關系密切。他的副手是曾在侵華戰爭期間擔任首相的近衛文麿公爵。“皇軍”是沒了，但這二位仍不死心，希望“國體”如故。當然，改革肯定是需要的，但應該是漸進式的，且須劃定范圍。為此，東久邇稔彥任命了一批特殊的幕僚。日本的戰敗曾被歸咎于國民“沒有血性”，滿洲陰謀家石原莞爾因此擔負了鼓舞日本人士氣這項責任。直到1945年9月，石原仍在發表演講，大談亞洲和西方之間即將到來的沖突。幕僚里還有兒玉譽士夫這位粗俗的右翼政壇黑手，他曾在中國的日占區大發橫財。1945年8月，兒玉正張羅著為美軍設立妓院，為了維持舊秩序，他可謂動足了腦筋。10月，最高司令官下令廢除對言論自由和公民權利的法律限制之后，東久邇稔彥視其政治生涯走到了盡頭，隨即辭官卸任。石原逃脫了戰爭罪起訴，對此，他自己也倍感意外。他卒于1949年。兒玉被控犯有戰爭罪，蹲了幾年大牢后繼續在右翼政壇扮演不甚光彩的角色，直到1975年前后被曝出卷入一宗巨大的腐敗丑聞，方才退出政壇。

妄圖保衛“國體”的并非只有右翼理論家、戰犯和反動貴族們，扮演了更加重要角色的反而是美國外交官眼中的“溫和派”——譬如吉田茂。吉田能說會道，是個親英派，20世紀30年代曾赴倫敦任駐英大使，期間耳濡目染，以至于舉手投足間頗有幾分丘吉爾風范。吉田在眾人眼中是典型的戰前自由派，曾在東久邇稔彥內閣中擔任外相，并于1946年升任首相。從脾性和氣質來看，吉田屬于大正時代。在他看來，20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那股極端軍國主義思潮是日本現代國家發展歷程中的一段插曲，雖然不幸，但純屬意外。眼下最好的出路就是復辟舊制度——它曾被武夫玩弄于股掌之間——讓一批家長式的文官精英當政，以準民主化手段管理日本。帝制肯定是要保留的，徹底的美式民主在日本會水土不服。不管戰前的吉田思想多么開明，從戰后看來，他趨于保守。

吉田在麥克阿瑟當局內遇到了意氣相投的保守派盟友，但司令官手下的“新政派”要除外，他們和他可不是同路人。吉田很巧妙地利用了美國人的內部矛盾，將司令官的部下分為“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兩派。麥克阿瑟本人對這一區分不置可否，這很像是他的為人。將軍對于盟軍早期的一些做法，諸如解散財閥、廢黜“特高課”、賦予婦女選舉權、釋放共產黨等政治犯、建立獨立工會，以及頒布一部全新的自由憲法——是謂重中之重——均鼎力支持。日本左派和自由派對上述改革歡欣鼓舞，吉田等保守派雖高興不起來，卻也無力阻止。可是，在處置天皇一事上，日美兩國想到了一塊兒。關于天皇在未來該扮演何種角色，司令官大人和吉田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與那些立場更右傾的日本人相比更是差之千里，但他同樣是個積極的保皇派。

這一點，僅從一起反映占領時期查禁制度的事件來看，便可窺見一斑。事件雖小，卻很不光彩。1946年，左派導演龜井文夫拍攝了一部名為《日本的悲劇》的紀錄片。他擇取了部分舊新聞片、剪報和照片，將其拼接在一起，以揭示日本戰時宣傳的本質。影片里有幾個裕仁的鏡頭，有的是戎裝照，有的是便裝照，至于裕仁的戰爭罪行問題，片中亦有明確交代。《日本的悲劇》過審后，先是在一些地方影院試映，原計劃之后再在東京上映，可是美國審查員的封殺令說來就來。之所以態度前后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究其原因，是因為吉田對該片頗有微詞，遂動用他和威洛比將軍的關系，吁請最高司令官封殺該片。

據稱，下達封殺令的原因是該片“拍攝手法過于激進”，可能“引發騷亂和暴動”。司令官大人執意保留天皇時，援引的也是這套說辭。澳大利亞、英國和蘇聯方面本想以戰爭罪起訴裕仁，可麥克阿瑟一再堅稱，沒了天皇，日本將變得無從治理。這與他認為日本人是一個幼稚的民族、沒有天皇指引將獸性大發的看法是一脈相承的。但事實是否果真如此？皇室成員曾希望裕仁退位，為戰爭擔負道義責任。當時的民調顯示，多數日本人對此欣然接受，甚至持歡迎態度者也大有人在。但司令官閣下持反對意見，他就像明治日本之前的歷任將軍一樣，一心想利用天皇的象征意義，將其塑造為一尊自授權力合法性的“神龕”。吉田首相等保守派之所以最后同意實施麥克阿瑟的全套改革方案，一大原因就在于他們擔心這尊“神龕”在為其所用之前，就會被人奪走。這可是“國體”的最后一絲痕跡。

不過，在此之前，司令官大人要先剝離皇權的政治權威和宗教神秘性，而這又牽涉到體制和憲政改革：神道教儀式和政務須做到“政教分離”，天皇將成為“國家統一的象征”，而不是一位神圣的大祭司。這還不夠，還要在公關上巧施妙計。天皇角色的轉型可以在一張官方照片中找到縮影。照片攝于1945年9月，地點是美國大使館，天皇來此覲見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穿著領口敞開的襯衫，雙手悠然自得地插在后兜里，身材高大地站在天皇身側，更加反襯出這位君王的矮小。裕仁一身朝服，嘴巴微張，人站得筆直。這張照片被發給所有日本報章使用。除非觀者愚鈍無比，否則不可能察覺不到其中隱含的美日關系實質。

1946年1月，在美國老師的訓導下，裕仁發表了《人間宣言》 [¶](#P_9)  ，表明自己非神。此舉大大觸怒了日本保守派。一個月后，日本出臺了新憲法草案，其誕生過程經歷了一番曲折。先是司令官大人要求日本法學家修改原有的明治憲法。無獨有偶，這些人基本都是吉田那樣的“溫和派”名流，素以親英聞名，可他們接受的是德國法學傳統的訓練，對美國人那套“主權在民論”很是陌生。他們均認為沒必要修改明治憲法，試圖說服美國人相信明治憲法是日本遠古傳統的一部分，若想用一個截然不同的文明所孕育的產物取而代之，是萬萬行不通的，這就好像有些植物只能生長在特定的土壤中。法學家們似乎忘了，明治憲法從根本上來看，基本照搬了普魯士憲法。總而言之，他們僅僅做了一些小修小補的工作。此事經媒體曝光后，多數日本人對他們嗤之以鼻：又是遠古傳統這一套。

將日本法學家免職后，麥克阿瑟責令其民政局局長科特尼·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組建了一支美國團隊，起草憲法。惠特尼在戰前曾擔任麥克阿瑟的私人律師。這項任務的預定工期是一周。為此，一群年輕而缺乏經驗的美國人把自己關在司令官總指揮部的舞廳內，足不出戶。出生于維也納的二十二歲猶太姑娘貝雅特·西洛塔（Beate Sirota） [\*\*](#_76)  負責起草關于社會權利的條款。為了了解制憲過程，她從圖書館借閱了其他國家的憲法。其中，蘇聯和魏瑪德國的憲法派上了大用場。年輕的海軍少尉理查德·普爾（Richard Poole）授命起草有關天皇新地位的法條。正是在他筆下，天皇從“亦神亦人”蛻變為一個“符號”。貝雅特·西洛塔則將男女平等的特別條款寫入了憲法。

憲法譯成日文后，有一部分讀起來格外拗口，但事后證明這部法律是占領時期最深入人心、生命力最持久的事物之一。吉田在內的保守派雖不喜歡“和平憲法” [††](#_77)  ，卻無奈只能接受，日后還學會了令其為己所用。然而，日本社會中有一群人恨透了新憲法，他們雖人數不多，但時而聲勢浩大，極具影響力，這些人便是極右翼。天皇乃區區象征物的新身份固然令他們大為不滿，但激起其怒火的還是第九條。這是新憲法中最激進的一項創舉，旨在剝奪日本保留武裝力量和發動戰爭的主權。即便是年輕的理查德·普爾，也對憲政和平主義是否現實表達過自己的疑慮，但他很快得知頒布指令的是將軍本人，那也只好這樣了。

好在極右翼在1946年并不招人待見，多數日本人欣慰的是不用再上陣打仗了。不光如此，憲法第九條讓他們心中涌起一股道德自滿的情緒：我們可是歷史上第一個和平主義國家。然而，這一戰后早期理想主義的偉大標志造成了始料未及的后果，導致明治時期遺留的一大主要問題依舊懸而未決。1882年頒布的《軍人敕諭》規定，帝國軍隊效忠天皇，而非國家。這將戰爭問題從議會政治中抽離出來，抬升到了非天皇而不能定奪的層面，而天皇是不用被問責的。由于日本的軍事大權從今往后都將掌握在美國手里，不被問責的皇權只是從東京轉移到了華盛頓。這一安排讓不少日本人和外國人更有安全感，但對于在亟須講民主的軍事領域強化這一制度，卻毫無助益。

\*\*\*\*\*

除了對日本人進行思想改造外，還要給他們上一堂歷史課。光懲罰是不夠的，要讓日本人務必認清他們所犯下的罪行。在遍及東亞和南洋的戰場上，那些為“圣戰”干臟活的日本人面臨著兩種下場：要么上絞架，要么蹲大獄，而且在此之前未必都經過審判。話說回來，最終的清算發生在東京的原帝國陸軍總部，這里也是小說家三島由紀夫幾十年后切腹自殺的地方。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期間，包括蘇聯在內的十一個同盟國派出的法官齊聚此地，對那些以天皇名義發動戰爭的軍事將領、政客和外交官進行審判。這些人當中有南京大屠殺的責任人松井石根大將、策劃“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的部分陰謀家、做出偷襲珍珠港決定的領導人、一意孤行發動侵華戰爭和出兵東南亞的首相和外交官、一位右翼理論家（他在審判時憑借裝瘋得到豁免 [‡‡](#_78)  ）以及天皇最親近的幕僚。這群卑劣之徒中，唯一缺席的就是天皇自己。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模板是紐倫堡軍事法庭。不管在紐倫堡，還是在東京，用來追究被告策劃和實施侵略罪行的都是可溯及過往的新法……。日本人同德國人一樣，也被控犯有“反人類罪”。之所以創造這一新型法律類別，目的在于制裁納粹的種族滅絕行徑。法官們在日本和德國的對外戰爭中尋找相似之處。盡管日本政府未制定全面種族滅絕的政策，南京大屠殺這一最令人發指的戰爭暴行仍被賦予了奧斯維辛般沉重的象征意義。在東京，垂頭喪氣的被告茫然地盯著控方。總的來講，他們和紐倫堡被告席上的納粹分子還是有很大區別的。戈林 [§§](#SSSS_3)  、赫斯 [¶¶](#PP_3)  、里賓特洛甫 [\*\*\*](#_79)  、弗蘭克 [†††](#_80)  等人是1933年奪權的罪惡政權的黨羽，而東京審判的被告當中，有不少人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士紳，是老派的文官精英，早在戰前就統治著日本。其余的都是軍人。

日本沒有納粹黨，也沒有希特勒這樣的元首。日本人的罪行罄竹難書，但這些罪行是以“國體”的名義犯下的，天皇又是“國體”的神圣領袖，他曾訓導每位陸海軍士兵“視長官命為朕命”。但既然麥克阿瑟認定天皇是清白的，不用出庭受審，哪怕作為證人也不行，那么東京審判這堂歷史課的意義不僅大打折扣，而且還具有一定的政治危害性。軍國主義者不得不承擔所有罪責：是他們將天皇引入歧途，并誤導了日本人民。裕仁通常比手下將領更清楚局勢，但這一點被輕描淡寫地搪塞了過去。同樣遭到粉飾的還有日本民眾對海外軍事冒險表現出的巨大熱情——至少戰爭初期是這種情況。這樣說來，倘若一個對所有事都負有正式責任的人是無辜的話，那么的確很難理解那些自認為在執行圣令的人憑什么被判有罪。

這場審判在日本電臺里實況直播，媒體也連篇累牘地進行報道。但多數民眾饑腸轆轆，壓根沒心思關心什么歷史教訓。當然，南京大屠殺、馬尼拉浩劫等不計其數的日軍暴行一經曝光，輿論一片嘩然。同樣令人驚愕的是，有證據顯示，政府從頭到尾都在欺騙國民。普通人當中鮮有同情甲級戰犯的，大多認為他們罪有應得。他們當初將日本帶向戰爭，最后落得一敗涂地，那就應該擔起責任來。然而，最高司令官對天皇的豁免使得最重要的一條教訓黯然失色——例如政治責任問題、“國體”的本質以及帝國意識形態和對其他亞洲人所犯罪行之間的聯系。要是所有日本人——軍國主義者除外——都和他們的天皇一樣清白而無辜的話，那么他們自己也是受害者咯；要是在中國屠殺平民是罪行的話，那么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也理應被視為罪行。對，還不光是這兩個地方，東京、大阪等城市遭受的大轟炸都應該算上。簡言之，麥克阿瑟讓日本人逃脫了制裁。

這場精心布局的審判只有一次險些因為真相而穿幫。1947年12月，東條英機站上了被告席，他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伊始擔任首相。這位戴著圓框玳瑁眼鏡、禿頂、一口齙牙的將軍是美國人心目中“邪惡日本人”最形象的寫照，可謂日本軍國主義的“傅滿洲” [‡‡‡](#_81)  。人們不惜在黑市上一擲千金，想要一睹他在審判席上的風采。不同于百般抵賴的同僚，東條愿意為戰敗承擔責任，但他出現了嚴重的失言：“我們（日本人）沒人敢違抗天皇的旨意。”檢控方的盤問環節因此縮短。有人對東條施壓，要求他更改證詞。一周后，他十分配合地改口稱，天皇向來熱愛和平，祈盼和平。

1948年12月22日，這一天寒冷而陰霾，包括東條在內的七名日本被告簡單用過一餐冷米飯配清酒的“上路飯”后，在巢鴨監獄被處以絞刑。該監獄于20世紀70年代被拆除，原先豎立絞架的地方，一棟名為太陽城的摩天大樓拔地而起。依然有人緬懷東條將軍，他在90年代一部膾炙人口的戰爭片中被描繪為英雄。但是其他人，像荒木貞夫、板垣征四郎、木戶幸一等戰犯則多數已為人淡忘。那些對東京審判揪著不放的與妄圖修改憲法第九條的恰恰是同一批人，是那些否認日本比其他參戰國更加罪孽深重的右翼史學家、新聞記者和政客。他們將東京審判留下的歷史教訓貶為美國的政治宣傳。在他們看來，日本的左派今后也會這么干。

\*\*\*\*\*

日本左派也有理由憤憤不平。起初，“新政派”在位時，“封建思想”是最高司令官當局主要的眼中釘，這一時期，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不僅獲釋出獄，還被積極動員為改革出力。他們熱情洋溢地投身改革洪流。一腔熱血的日本官僚修改了《勞動法》，日本的工會有史以來第一次手握實權，領導他們的一般是共產黨，引得幾百萬工人紛紛加入。罷工和游行屢見不鮮，工人偶爾還會接管工廠，甚至揚言要沖擊皇宮。馬克思主義學者繪就了計劃經濟的藍圖。“新政派”、日本官僚和馬克思主義者在國家干預經濟一事上達成了默契。1947至1948年，日本選出了首位社會黨首相。諸多重大的改革舉措中，有一項是土地再分配：土地從大地主名下流轉至佃農手中。土改得到了美國人的支持，但負責實際策劃和執行的是日本官僚。這既是一項進步舉措，令左派為之叫好，又杜絕了那種助長共產黨勢力的農村騷亂。窮苦的生活造就了佃農彪悍的民風，換到過去，他們是日本“圣戰”中最驍勇的兵員來源，但現如今，一個全新的小農階層應運而生，附帶產生了一種意想不到的后果：時至今日，他們依然幫助保守派占據著執政黨地位。

另一種始料未及的情況是，麥克阿瑟的改革導致日本官僚和民選政治家的權勢此消彼長。新成立的通產省（MITI）負責制訂中央經濟計劃。“新政派”相信，私人大企業是日本帝國主義產生的元兇，要想解決這一問題，就要將這些企業的所有權從家族所有者手中奪過來。這項任務同樣交由官僚代為操辦。但事實上，恰恰是這些人將財閥并入了戰爭經濟，且往往與企業主的意愿相違背。由于骨子里敵視大企業，美國左派不經意間賦予了這些機構更大的權力，殊不知正是它們將日本推向了戰爭。這么做的后果就是政治家成了游走在企業和官僚利益之間的掮客。

那么這場原本反封建、改良式的運動是從何時開始改弦更張，成為保守派打著各種幌子，對共產主義實施的一場鎮壓呢？很難給出具體的時間。美國銀行家和商界領袖從一開始就不看好司令官大人的改革。1947年，因為擔心共產黨搞垮日本經濟，麥克阿瑟感到有必要取締原本定于2月份舉行的一場大罷工。日本的通脹率居高不下，警鐘已經敲響。很快，其他措施相繼出臺：公務員被禁止參加罷工，私人財閥雖遭解散，但力度較原計劃已大大減弱。吉田等保守派樂見最高司令部內的“現實主義者”逐漸占據上風，壓倒“理想主義者”。然而，在起先備受鼓舞的日本左派看來，他們被美國人背叛了。

局勢的反轉有兩種解釋。一種是20世紀40年代末美國國會成了共和黨的天下后，華盛頓再也不愿用美國納稅人的錢幫扶日本了。另一種是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在中國內戰中勝券在握。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 [§§§](#SSSSSS_3)  等強硬派高官一致堅持，是時候把民主理想撇在一旁，集中精力復蘇經濟了。1949年，作風強硬的銀行家約瑟夫·道奇（Joseph Dodge）被派往東京，幫助控制通脹，平衡預算。根據“道奇計劃”，日本工人和消費者應為民族大義做出犧牲。有了官僚中能人的領導，再加上東南亞的原材料，出口外向型工業將成為日本復興的引擎，為對抗共產主義筑起一道屏障。針對政府、工會和私企內部潛在麻煩制造者的“紅色肅反”，讓本土的左派人士挨了整。

司令官閣下雖然從來算不上是“赤黨”的朋友，對此卻高興不起來，因為他自感對日本政局的控制力在下降。然而，所有這一切在日本保守派眼里都不啻為利好消息，他們正團結起來，形成一個新的精英階層——其中不乏受到信任的老面孔——一個由官僚、政客和大企業領導層構成的群體。從許多方面來看，新權貴同20世紀20年代的舊精英很像，區別是再也不會出現權欲熏心的將軍們鉤心斗角這一煩人的現象了。道奇抑制通脹的措施造成大批民眾失業，幫助日共在1949年的大選中拿到了10%的選票，但吉田茂的自由黨還是以巨大優勢勝出。

次年爆發的朝鮮戰爭為日本經濟的騰飛提供了助燃劑。美軍預先毫無準備，以大銀行為班底完成重組的財閥充當起他們的供應商，一切物資應有盡有，且售價不菲。左派、自由派與和平主義者對于“改弦更張” [¶¶¶](#PPP_3)  本就耿耿于懷，眼看著日本又被卷入一場亞洲內部的軍事沖突，更是氣不打一處來。而在一支名為警察預備隊、實則同軍隊無異的“自衛隊”成立后，矛盾徹底爆發。自衛隊是華盛頓方面違背麥克阿瑟的意愿、罔顧其有違“和平憲法”的事實，執意強塞給日本政府的。可是，經濟在增長，對于一個饑餓的國度而言，這比什么都重要。除開上百萬在戰火中殞命的朝鮮人和韓國人外，朝鮮戰爭另一大犧牲品就是司令官大人的仕途。縱然他在仁川打了勝仗，麥克阿瑟的自高自大還是惹惱了杜魯門總統。在司令官大人公開聲明要將戰火燒到中國，如有必要甚至不惜動用核武器后，他被革職了。

日本國內對此的反應令人訝異。盡管左右兩派均心存不滿，但自由立場的《朝日新聞》對麥克阿瑟感恩戴德，感謝他教會了日本人“民主與和平主義的真諦”，并帶領他們“心懷仁愛地走上了光明大道”。這還沒完，報紙繼續歌功頌德，想要溫暖司令官大人的慈父之心：“似乎是欣喜于自己的孩子終于長大，他對日本這個昔日的敵人一步步邁向民主滿心歡喜……”天皇親自拜謁麥克阿瑟，感謝他所做的一切。在將軍的專車駛往羽田機場的路上，數十萬眼含熱淚、揮舞紙質小旗子的日本民眾夾道歡送。當天學校停課。NHK電臺里播放著《友誼地久天長》（“Auld Lang Syne”）這首歌。吉田首相揮手致意，目送1945年載著麥克阿瑟抵達厚木機場的“巴丹號”（Bataan）專機最后一次飛離日本。

盡管有過倒退，但是麥克阿瑟的使命總體上可以說圓滿完成了。不論結果是好是壞，他的一腔抱負如今被融入了憲法。日本人除了普選權和言論自由以外，理論上還擁有自由且不受歧視地追求幸福的權利。軍國主義似乎已徹底滅亡，而隨著議會民主制的建立，從坂本龍馬到福澤諭吉，從民權運動家到戰后民主派，幾代人的夙愿似乎終于成真。然而，司令官大人留下的遺產存在著一些深刻的缺陷。和平主義的代價是國防完全依賴他人。右翼復仇思想因此陰魂不散，人們對于憲法也呈現出兩極分化的態度，而這一問題本不應造成分歧。戰爭罪審判和憲法給日本人留下了如何處置皇權這一懸而未決的問題，也令他們對自己的過去糾結不已。至少從某方面來看，日本成了那個極力想改造它的國家的某種扭曲鏡像：在崇高理想的映襯下，缺陷卻也更加明顯。

注釋

[\*](#_64) 　即玉米芯煙斗，源于美國。煙斗使用表面碳化以后，比較持久耐用。

[†](#_65) 　布基伍基（ブギウギ）即boogie-woogie，20世紀20年代開始流行的節奏搖滾分支。——編注

[‡](#_66) 　美國當局的情報系統對戰后日本的影響甚大。威洛比自戰時即擔任麥克阿瑟的情報參謀，戰后則掌管駐日盟軍總司令部的情報部門。——編注

[§](#SS_8) 　東久邇宮稔彥王為裕仁的妻子香淳皇后的叔叔，1947年脫離皇籍后，改名東久邇稔彥。——編注

[¶](#P_8) 　日語中“人間”意指“人類”。詔書前半引用《五條御誓文》并提及日本的戰后建設發展，故又被稱為《關于新日本建設的詔書》或《年頭、國運振興的詔書》。后半部中以百余字否定天皇作為“現世神”的地位。——編注

[\*\*](#_67) 　全名是貝雅特·西洛塔·戈登（Beate Sirota Gordon）。

[††](#_68) 　“和平憲法”對日本社會影響至深，其中較為著名的是第九條“放棄發動戰爭的權利”。——編注

[‡‡](#_69) 　即大川周明，鼓吹對外戰爭的右翼理論家，在遠東軍事法庭受審期間，他不時裸露身體，喧嘩叫嚷，還以手頻擊坐在身前的東條英機的禿頭，靠裝瘋賣傻逃脫了法律的制裁，事后他對此予以承認。

[§§](#SSSS_2) 　赫爾曼·戈林（Herman Göring，1893——1946），納粹德國空軍總司令，“蓋世太保”的創立者。紐倫堡審判后，刑前一天服毒自盡。

[¶¶](#PP_2) 　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1894——1987），納粹德國政治人物，曾任納粹黨副元首，1987年死于柏林施潘道軍事監獄。

[\*\*\*](#_70) 　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納粹德國外交部長，紐倫堡審判后被判處死刑。

[†††](#_71) 　漢斯·弗蘭克（Hans Frank，1900——1946），曾任納粹黨的高級律師，納粹上臺后，先后任不管部部長、納粹黨法律事務全國領袖、德意志法學院院長等職務。1939年后擔任波蘭占領區總督，積極推行滅絕猶太人計劃，并屠殺了大量波蘭人，1945年因戰爭罪和反人類罪被判處絞刑。

[‡‡‡](#_72) 　Dr.Fu Manchu，傅滿洲是英國小說家薩克斯·羅默創作的傅滿洲系列小說中的虛構人物。一百多年來，“傅滿洲”一直是西方人想象中“黃禍”的臉譜化代表，是一個陰險狡詐的中國人，在唐人街建立了一個隨時準備顛覆西方世界的黑暗帝國。這一形象的深入人心，充分反映出了在特定歷史時期，西方世界對東方世界的嚴重誤解、歪曲和丑化。

[§§§](#SSSSSS_2) 　喬治·凱南（1904——2005），美國外交家和歷史學家，遏制政策提出者，主張加強美國同西歐等國的關系，以軍事包圍、經濟封鎖、政治顛覆，特別是局部性的武裝干涉和持續的政治冷戰來遏制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與影響。其主張對戰后美蘇、美日關系影響重大，也是美國對日政策修改的因素之一。——編注

[¶¶¶](#PPP_2) 　指前面提及的改革力度減弱、對罷工的限制，以及麥克阿瑟主導的戰后日本農地改革內涵的隱性改變。二戰后麥克阿瑟的農地改革較為符合日本左派、自由派等人士的主張，但隨后美國政府因為冷戰政策的需要而扶植日本大企業經濟，削減日本工人民眾利益，遂激起他們不滿。——編注

# 第七章　1955年之散記

1948年的圣誕夜，一位身材瘦削、穿著寒酸卡其制服、頭戴鴨舌帽的中年人從巢鴨監獄獲釋。他的兩瓣柔唇一咧，露齒一笑，坐上一輛美軍吉普。作為甲級戰犯的岸信介剛剛結束了在巢鴨監獄的三年刑期。珍珠港事件爆發之際，他在東條將軍手下擔任商工省大臣。在此之前，他是“滿洲國”的工業大總管，堪稱日本的“阿爾伯特·施佩爾”（Albert Speer） [\*](#_85)  ，戰時曾負責軍需和勞工事務。倘若說打天下要靠軍人的話，那么守天下要靠的就是他這樣的人。

舊雨新知，岸信介在巢鴨監獄里都遇上了。和他一間房的獄友名叫笹川良一，20世紀30年代期間曾擔任一個小型法西斯政黨的黨魁，還因為在中國占領區從事敲詐勒索而聲名狼藉。戰后，笹川靠著見不得人的手段（比如開設大型賭場），大舉斂財。戰時結下的人脈和大筆來路不正的資金，奠定了他在戰后保守主義政壇不可一世的幕后大佬地位。笹川和岸信介于同一天獲釋。用不了十年，后者就將坐上日本首相的寶座。

不過，1948年掌權的依然是吉田茂。盡管兩人活動的圈子都很高調，但岸信介和吉田都不喜歡對方。出生于土佐地區的吉田身為民權運動家之子，是個名副其實的保守派；反觀岸信介，祖上是長州藩士，自然會擁護狂熱的日本右翼。吉田行事生硬，人們說到他，至今還會記起他曾在國會怒罵一位社會黨議員是“該死的蠢貨”；相形之下，岸信介為人處世更圓滑，也更有魅力。然而，自從踏入東京帝大時起，直至自己漫長的仕途結束，岸信介出于本能，一向站在自由主義的對立面。年輕時，他崇拜北一輝這位1936年軍事政變背后的國家社會主義煽動家。在當年那場美濃部和右翼對手的憲政大辯論中，岸信介倒向了極端民族主義陣營。在“滿洲國”任職期間，他與東條英機和關東軍走得很近。1939年，他贊成和納粹德國締結同盟。面對商界與軍界之間的紛爭，他選擇支持后者。被關押在巢鴨監獄期間，他依然認為日本發動的是一場“正義戰爭”。

盡管岸信介在戰后搖身一變，成了民主制的捍衛者，他的政治信仰從某些方面來看依舊帶有鮮明的戰前色彩。戰爭爆發前后，他曾標榜自己是國家社會主義者：崇尚威權、民族主義，但從他視計劃經濟為強國富民正道這一點來看，說他是社會主義者也不為過。他從來都不相信自由放任或盎格魯——撒克遜式自由資本主義那一套。1953年，岸信介公開表示反對“放任式”政策。他指出，日本需要的是中央集權式的產業規劃，“務必精心實施——比如俄國的五年計劃”。發表這番言論之前，他剛剛造訪過西德（聯邦德國），滿心歡喜地邂逅了老同事、原納粹經濟部長希亞爾瑪·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岸信介治理經濟的思路過去十分接近日本的主流思潮，日后亦復如是。

\*\*\*\*\*

在圍繞保守派領導權的爭奪中，岸信介鼓動人們相信吉田對麥克阿瑟卑躬屈膝，是個“美國小子”，是那種好“日本佬”，唯司令官大人的馬首是瞻。這么說吉田有失公允。1951年，麥克阿瑟搭乘飛機返回美國時，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正在前往東京的途中，他的身份是負責與日媾和的特使。兩人通過電臺，“地對空”商討此事。杜勒斯得到指示，要求他對日施壓，責令其建立一支像樣的軍隊。吉田，以及麥克阿瑟，在這件事上已經和華盛頓周旋了好幾年。麥克阿瑟在1948年表示這么做會違背他的原則，會讓美國人在“日本人民眼中顯得無比可笑”。即便上頭盯著他，要他責成日方組建一支國家警備隊，他卻依然念叨著日本應成為“太平洋上的瑞士”，虛與委蛇，能拖則拖。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違令不遵已無濟于事。于是，七萬五千名日本“警官”身穿淘汰下來的美軍軍裝，接收了機槍、坦克和巴祖卡火箭筒等一批武器裝備。吉田自欺欺人地認為這些帝國陸軍老兵不是真正的軍人。他們被部署在工業區周邊，鎮壓共產黨騷亂，但不久之后，這支警備隊的裝備變得更加齊全，并更名為日本自衛隊。

杜勒斯要的可不止這些，他希望日本有一支三十五萬人的軍隊。吉田對這一明確違反“和平憲法”的舉動予以抵制。他警告稱，這么做會引發巨大的動蕩，不光日本要遭殃，還會波及整個亞洲。為了證明這一點，吉田私底下還邀請社會黨成員在他辦公室門前抗議示威。他把自衛隊的人數控制在七萬五千人。最終，雙方達成妥協，吉田視之為一場勝利。美國將無限期且不受限制地享有在日駐軍的權利；沖繩會成為美國政府管轄下的巨型軍事基地；日本也承諾將來會承擔起本國防務的責任，但未給出具體時間，這一天來臨之前，日本的國家安全將交由美國負責，而它自己則可以放手將全部精力傾注在政府主導的工業發展上。1951年12月，美日兩國在舊金山同時簽署《舊金山和約》和《美日安保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日本重獲主權，但僅僅是有限主權。“和平憲法”的問題無人再提，“吉田路線”就此誕生。

軍事占領的結束意味著日本人總算可以發泄內心的不滿了。在左翼知識分子、日共和工會領袖的煽動下，學生和工人于1952年的五一節這天發動了大規模游行，抗議《美日安保條約》。示威人群在皇宮廣場與警方發生了沖突。警方開了槍，還動用了催淚彈和警棍。沖突造成兩人死亡，多人嚴重受傷，混亂中還有人遭踩踏。這場鎮壓并未澆滅日本知識分子和左派胸中的怒火。他們常對蘇聯抱有幻想，出于負罪感，同中共團結一心，意欲擺脫和美國簽訂的安保協定。日本曾妄圖成為一個西式的帝國主義強國，為了表示對這一歷史錯誤的懺悔，這一次，日本要和亞洲鄰國站在一起，再也不同他們兵戎相見。歸根結底，“和平憲法”里關于放棄使用武力的聲明，指的就是這層意思。日本左派將麥克阿瑟將軍頒布的憲法第九條奉為圭臬，視同神諭。

岸信介等右派既渴望在冷戰中與美國形成統一戰線，同時又主張修憲，更改涉及天皇世俗新地位的第九條和第一條。吉田等務實的保守派則樂見美國人對付共產黨——日本只需管好自己的事即可——并希望憲政之爭就此偃旗息鼓。可以說，這種愿望既實現了，也落空了。想要修憲，需要三分之二的國會議員表決通過。鑒于這一點不太可能發生，右派的怨氣便以各種形式爆發了出來：暴動、圍繞日本戰時歷史的口水仗、教科書風波、反美言論以及滿大街跑的廣播車，車上的暴徒身穿軍裝，高喊右翼復仇主義口號。

20世紀50年代是日本電影的黃金時期，小津安二郎、溝口健二和黑澤明佳作不斷。然而，電影也是呈現左右兩派反美情緒的絕佳載體。右派的代表作如《戰艦大和》和《太平洋之鷲》歌頌了帝國海軍的英勇氣概以及無所畏懼、無可指摘的海軍將領。左派也推出了《廣島》這樣的宣傳片。這部得到激進的教師聯盟贊助的影片將原子彈爆炸描繪為一起種族主義行徑。影片結尾有一幕：美國游客來到廣島，購買用罹難者骸骨制成的紀念品。同樣紅極一時的還有講述美國兵在軍事基地周邊奸淫婦女的準色情片。這類“黃片”十分走俏，是紅火的性產業中的重要一環。部分銀幕幻想流露出鮮明的惡意。在一部膾炙人口、后被翻拍成電影的連環畫里，愛國的女主人公、一位身患性病的日本妓女為了讓美軍染上梅毒，不斷地和美國兵上床。這一主題后來還被移植到了東京上演的一部名為《立川飛行場：被強奪的整整十年》的滑稽戲里。

即便廣島和長崎是反美和平主義思想的主要標志，日本左翼也沒有粉飾本國犯下的戰爭罪行，相反，20世紀50年代，日本國內對戰爭的批判要甚于德國，間或造成嚴重的后果。以反省為目的、將自己在華期間所施暴行記錄成篇的陸軍老兵被人誣陷是共產黨；出版社面對右翼暴徒的威脅，只得將書下架。話說回來，知識分子圈和頗具聲望的教師聯盟宣揚的“正確路線”又太過教條：在同日本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天皇體制”斗爭的解放戰爭中，中共是英勇的自由戰士；廣島原子彈爆炸應將日本塑造為一座和平燈塔；亞洲范圍內的新敵人是美帝國主義及其日本走狗云云。

以岸信介為首的右翼不依不饒，堅稱日本的戰爭是正義的。這一問題逐漸取代了圍繞憲法而生的必要的政治辯論。每當左派直陳日本戰時行徑罪惡滔天，并以此為據主張憲政和平主義時，右派就會矢口否認日本有罪，或者就算有罪，也不會比其他參戰國更加作惡多端。教師聯盟和保守的文部省之間曠日持久的教科書風波便是這一政治分野的例證。1953年，美國副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談及憲法第九條時，稱這是“無心之失”。這一條款使得日本人在對待本國近代史時分歧嚴重，個中理由與歷史無涉。日本的大眾媒體圍繞戰爭論戰不斷，其中一大特色是專業史學家旗幟鮮明地置身事外，他們傾向于只在學術刊物上發聲。

\*\*\*\*\*

左派要不是那么僵化教條、擅長內斗的話，或許在戰后的日本會有更大的建樹。經過1952年的暴亂，日共開始顯出頹勢。它本想將邊緣弱勢群體如朝鮮人、社會棄兒和散工團結在紅旗之下，但是疾風驟雨式的整肅和排除異己的做法令其越來越邊緣化。反觀面臨左右之爭的社會黨，則依舊掌控著下院近三分之一議席，時而多些，時而少些。他們有全日本最大的同業工會撐腰，后者勢力依舊如日中天，為首的均是強硬的左翼人士。保守派則分裂為民主黨和吉田麾下的自由黨兩大陣營。

到了1955年，一度有跡象顯示社會黨可能掌權。左右兩派冰釋前嫌，合并為“日本社會黨”。這對自由黨和民主黨形成了觸動，兩黨在一系列相互中傷和使絆子后，組建了“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除了促成這樁聯姻的岸信介外，大企業也在背后加以推動。自民黨首任總裁是鳩山一郎。同岸信介一樣，鳩山也是舊“國體”精英中的元老，曾因在1930年代彈壓言論自由而遭到麥克阿瑟的清算。這一政壇新格局日后得名“55年體制” [†](#_86)  。

1955年12月，就讀于京都大學、即將成為享譽世界的知名導演的某位激進青年在日記中寫道：“戰后十年，民主力量表面上看似遭遇挫折，實則取得了進步。狂暴浪漫主義的時代已經走到了盡頭，人民如今當家做主，我們步入了一個務實的時代。”但用不了幾年，大島渚的上述幻想就會化為泡影。

日本社會黨自誕生之初就面臨著一個先天性缺陷，而且還是自身造成的。一方面，左右兩派合并后，左翼獨攬黨內大權。盡管和平主義在日本深入人心，社會黨奉行的綱領卻是在亞洲范圍內領導工人革命，反抗資本主義，這與多數日本人的務實抱負相去甚遠。另一方面，自民黨很快將“55年體制”變成了“自民黨體制”，在大企業、華府、高級官僚和一個偏向保守農村地區的選舉制度的幫助下，自民黨打造了一臺強大的政治機器。金錢是其運轉的根本，來自建筑公司、黑幫、實業界、中情局和貿易公司的政治獻金通過一張利益勾兌的網絡，流進流出。只要錢源源不斷流向自己的票倉，長袖善舞的各派系成員便有望終身連任議員。派系的核心是手握實權的大佬，他們輪流坐莊，出任黨魁和首相，這樣一來，人人都有機會分得一杯羹。想要運轉順利，“自民黨體制”離不開幕后的操盤手，諸如笹川良一和兒玉譽士夫等昔日的投機分子便有了用武之地。每位自民黨首相上任之初都立誓要打破派系政治，但無人成功。社會黨直到四十年后才重新掌權，但不久即黯然下野。

這樣說來，導演大島渚所言不虛。一個新時代即將來臨，只不過這個時代和他預想的不太一樣。1956年的日本人陶醉在一句新口號中：“戰后時期已經終結。”這也是《經濟白皮書》的開篇詞，這份文件拉開了將近四十年高速經濟增長的序幕。日后，盡管日本知識界和政界普遍將經濟成就歸功于古代的日本美德——服從、自我奉獻、勤勤懇懇，抑或是“民族性格”——譬如心靈手巧、高度敏感、集體意識，但不得不承認戰后繁榮既有日本人自己的功勞，也要拜美國人所賜：論貢獻，麥克阿瑟和道奇與戰時官僚和保守派政客難分伯仲，在他們的努力下，日本實現了從戰前“國體”向“自民黨體制”的平穩過渡。

\*\*\*\*\*

不過，激進左派的頹敗還體現在另一場動蕩中。岸信介于1957年當選首相后，一心想要一勞永逸地解決懸而未決的憲法問題。日本若要恢復獨立主權國家地位，就得修改“和平憲法”和《美日安保條約》。《安保條約》授權美國在日本領土上為所欲為，不少日本人——有左派也有右派——不由聯想起19世紀60年代的不平等條約。美軍基地不斷遭到憤怒民眾的襲擾。岸信介意欲修憲，不僅因為他是民族主義者，還因為他希望見到一種兩個保守派政黨相互制衡的體制。他相信，只要對憲法尚無基本共識，且日本繼續蒙受不平等條約之恥，那么日本政壇就仍會深陷激進左翼和保守黨之間的紛爭，加上后者獨攬政權，極易造成腐化。撇開他過去的種種劣跡不談，岸信介的這番分析事后證明十分正確。

為了給日本走向自強鋪平道路，岸信介先是不辭辛苦地出訪東南亞，為日軍暴行道歉。他還在華盛頓同艾森豪威爾（Dwightd Eisenhower）總統一起打高爾夫球。盡管如此，修憲的嘗試還是無果而終。但他仍極力拉攏左派和保守派來支持他修改《安保條約》。問題在于，信任舊官僚的人實在寥寥無幾。政府原本計劃擴大警方職權，結果事情搞砸了，引發了國會大廈外的一場騷亂。岸信介還在學校里推行“德育”，此舉頗有戰前愛國主義宣傳的遺風，無怪乎社會黨人對于修改《安保條約》會一反常態，轉而堅定不移地站在了他的對立面。

華盛頓方面答應他的改進不足為道，無非是今后部署美軍兵力和裝備時會同日本人“商量”。艾森豪威爾計劃造訪東京，落實了新協定，這多少算是有些成果，但還不夠。到了1959年底，學生中的激進派開始沖擊國會，朝門上撒尿泄憤。參與示威者先是幾萬，后擴大至幾十萬人的規模，警方設立的路障被搗毀。在和平主義愛國思想的感染下，憎惡岸信介的自由派報紙紛紛聲援抗議《安保條約》的活動。警民沖突中，一位年輕姑娘遭踩踏身亡。不久后，將近一百萬人涌上街頭，用英語高喊“美國佬滾回去”！

社會黨總裁淺沼稻次郎直言“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共同的敵人”。他被一名右翼暴徒刺殺身亡，這一幕重蹈了戰前日本政治的覆轍。艾森豪威爾總統的特使在乘車離開機場途中遭遇暴徒襲擊。縱然各大幫派在老政治煽動家兒玉譽士夫的組織下承諾協助警方為艾森豪威爾開道，總統的日本之行還是取消了。一時山雨欲來，革命似乎近在咫尺。所有針對舊秩序的憎恨和猜忌，以及對美國的反感（人們指責美國扶植舊秩序的說法不無道理），仿佛黑云壓城一般，籠罩在東京街頭。岸信介曾動過征調自衛隊的念頭，好在最后還是放棄了這個想法。

1960年5月，國會內部一樣也不太平。條約在奏報下院批準時遭到社會黨人的抵制，他們先是想方設法阻礙辯論，接著還把議長關在辦公室內。曾在遠東軍事法庭擔任東條英機辯護律師的議長只好下令讓防暴警察沖進來，把他救出去。子夜過后，在警方的保護下，自民黨強行通過決議，在沒有一名社會黨議員在場的情況下，批準通過了條約。岸信介贏了，但也只是險勝。他自知必須下野，有人想要他的命。他的仕途在戰后曾柳暗花明，大放異彩，如今再度走向終點——表面上是這樣；暗地里，他依舊操縱著局勢，不容小覷。

倘若說作為公眾人物的岸信介大勢已去，同樣的話還可以用來形容激進左派。1960年，日本曾爆發過一場歷時數月的血腥罷工。罷工方是煤礦工人，起因是政府采用石油應對日本能源需求的決定導致了礦工失業。20世紀60年代末至1970年代，抗議越戰的學潮層出不窮，但并未造成多大影響。如同后來的德國和意大利，日本的激進左派中也分裂出若干殘暴的派系，其成員通過劫機、投放爆炸物等方式以達到推動世界革命的目的。然而，60年代那段風云歲月一去不復返。招人厭的岸信介充當了吸引公眾怒火的“避雷針”，他的繼任者是一位乏味無趣的金融官僚，即吉田茂的門生池田勇人。池田也沒有解決日本的憲法問題，他的應對策略是索性不去管它，另辟蹊徑以平息人們的不滿、彌合分歧。

1958年，岸信介曾召池田入內閣，擔任通商產業大臣。池田下轄的通產省，前身是岸信介昔日把持的商工省，戰時曾改名為軍需省。通產省處于日本戰后經濟增長的龍頭地位。池田借鑒了某位著名勞動經濟學家的觀點，承諾讓全體日本人富起來。他在1960年12月出臺了“收入倍增計劃”，有意識地將國民的注意力從憲法問題上轉移開。財富的公平分配博得了日本社會黨內溫和派的支持。池田希望，有了錢，人們會徹底忘掉政治。能干的技術官僚心懷國家福祉，引領日本經濟繼往開來。他們的存在，確保了自民黨統治的國家里一派穩定繁榮的氣象。這正是“池田路線”的要義。

愛惹事的左派工會無外乎兩種下場：一是被黑幫纏上，二是在私人企業工會的新制度下日漸式微。在私企，工會承諾將員工視為企業大家庭的子女，加以善待。規模最大的那類公司向員工提供終身雇傭合同，以換取后者的絕對忠誠。所有這一切安排雖常被形容為古老的日本傳統，但其實是“池田路線”的組成部分。除此之外，“池田路線”還意味著無休止的大興土木。舉國上下，日本城市與鄉村，成了一片大工地，公路、橋梁、水壩造個不停。這對建筑公司及其黑幫附屬而言是利好消息，同樣受益的還有國土交通省、農林水產省、日本產業界、給鄉村選民打開財源的政客以及自民黨自己——每個新上馬的建筑工程都會帶來一筆賄款和獻金，令其賺得盆滿缽滿。

20世紀60年代，日本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0.6%，完成了預期目標。曾經險些將國家撕裂的那些分歧如今僅見于社會邊緣：右翼暴徒依然扛著舊戰旗，開著廣播車巡街，高分貝播放著軍隊進行曲；學生中的極端激進派在殘酷的鋤奸過程中斗得你死我活。不過，多數日本人在經過舉國繁榮的新時代洗禮后，政治上已經變得很好糊弄了。人們一談起東京市內拔地而起的仿造埃菲爾鐵塔時，驕傲之情便油然而生——話說這座“山寨埃菲爾塔”比實物還要高。1964年，第一列子彈頭列車僅用三個半小時，便跑完了東京與大阪之間的路程。這一年，世人齊聚東京，共襄奧運盛會。此時此刻，日本人終于不用再窩里斗，也不再與世界為敵。

完成了使命的池田于奧運會舉辦當年與世長辭，取而代之的是吉田茂的另一位得意門生佐藤榮作。佐藤是岸信介的親弟弟 [‡](#_87)  ，他就像個“催眠精靈”（sandman） [§](#Ba__Zhan_Hou_Shi_Qi_De_Zhong_Jie)  那樣，在最容易引起爭議的問題上也采取了打太極的辦法。他的外交政策說來簡單得很。佐藤嘗言：“每每日本與美國背道而馳，國家就會蒙難；每每兩國通力協作，日本就會昌盛。因此，我的方針就是與美國充分合作，確保世界和平。”佐藤滿口的和平論調，為此他于1972年被授予了諾貝爾和平獎。

注釋

[\*](#_82) 　阿爾伯特·施佩爾為納粹德國的首席建筑師、軍備部長。——編注

[†](#_83) 　“55年體制”雖在法治上維持執政黨自民黨與在野黨日本社會黨的兩黨制，實際上是自民黨一黨執政。——編注

[‡](#_84) 　岸信介原姓佐藤，他的親生父親從岸家入贅到佐藤家，岸信介在中學時才被過繼到父親本家，改姓岸。佐藤榮作是他的親弟弟。

# 跋　戰后時期的終結

那么，現代日本的故事是否到此就結束了？肯定不是，但我要講的故事已進入尾聲。自1964年以來，日本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政府因為貪腐倒臺；裕仁天皇去世，新天皇即位，年號“平成”；被泡沫經濟裹挾的日本大有要買下全世界的勢頭；宗教恐怖分子在東京制造沙林毒氣事件；泡沫經濟崩盤。除此之外還發生了許多事。不過，建立于美占期、并于1955年得到鞏固的戰后秩序依舊如故，其根基雖然出現了裂痕，也顯出衰敗的跡象，卻巋然不倒。只要戰后秩序不變，1964年就是近代日本完成興衰交替的標志性年份。

一度有跡象表明真正的變化即將來臨，1976年冬天就上演了一出重頭戲。在此一年前，我來到東京求學，那時依舊能于細微處感受到戰爭的影響。缺胳膊少腿的退伍老兵穿著白色和服，枯坐在火車站外，用手風琴如泣如訴地拉著傷感的戰時小調。路人行色匆匆地從這些大活人跟前經過，仿佛壓根不曾留意其存在。他們揮之不去的身影只是飄蕩在盛世暖空中的一絲寒意。

20世紀60年代的新宿車站曾是學生集會的熱門場所，見證過不少戲劇性“事件”。我目睹人們朝一幅丑化田中角榮的漫畫像扔花生。這位前首相當時已身敗名裂。“花生”這個詞是有來頭的：為了拿到購買飛機的合同，從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收了錢的中間人再將其分給田中等日本政客，“花生”就是他們指代這筆交易的暗語。在幕后活動的主要掮客是戰時投機商兼岸信介的獄友兒玉譽士夫。這起丑聞曝光后，一位年輕的色情片男優駕著自己的輕型飛機，撞上了位于東京的洛克希德公司辦事處，以示對資本主義腐敗的抗議。他臨死前穿著神風特工隊的軍裝，留下了“天皇萬歲！”這句遺言。歷史還真是既有悲劇，也有鬧劇。

由于卷入了日本媒體報道的“金錢政治”，田中早在兩年前就已辭職，但收受賄賂的指控還是給了他當頭一棒，他感到自己被人算計了。畢竟，腐敗現象在日本政壇司空見慣，要想辦成事，唯有走此渠道。田中不過是用的錢比對手多，比對手更能干罷了。他最終被趕下臺，并非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是調查新聞記者給害的。一手促成其下野的，是老對手福田赳夫。福田老謀深算，出身官僚系統，正是福田派的人將洛克希德案的細節捅給了媒體。扳倒田中、將他趕出自民黨是為了報復他妄圖篡奪自民黨大權。即便如此，福田也沒能剿滅田中的影響力。田中派即便在首領出走并成為無黨派國會議員后，依然控制著自民黨，這種狀態持續了多年。

田中極其擅長民粹之道，逢人必握手，熱情得過了頭，而且敢作敢為；反觀福田則是典型的政壇官僚。自從池田與日本國民達成協議，以慷慨的施政來打消他們對政治的關注后，自民黨就一直是官僚的天下。他們制定政策，為內閣大臣起草議會演講稿，任職屆滿后依然在自民黨黨內保有一席之地。政客的職責是運作好“豬肉桶”（pork barrel） [\*](#_89)  ，確保自民黨的執政地位不動搖。黨內的派系之爭使得沒有一位政客能夠脫穎而出，只手遮天。然而，田中憑借自己過人的政治天賦和大手筆的利益勾兌，差一點就辦到了他人不可為之事。他的庇佑令許多人蒙恩于他，以至于這位連中學都肄業的鄉下牛販子之子幾乎撼動了技術官僚的主導地位。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現政客向官僚發號施令的局面，結果田中讓日本變得更加富有，但腐敗程度也更加驚人。

操弄民粹主義不等于就要推動民主改革。田中從未嘗試改革“自民黨體制”，在他的運作下，這一體制為盡可能多的人創造了財富和就業機會。田中出身建筑行業，娶了自己公司社長的千金為妻，建筑業為他提供了從政所需的資金。田中曾發誓要將整個日本列島變成一片建筑工地。哪怕是在他1985年中風、影響力走下坡路后，日本國內的土木工程也未見“退燒”跡象，一如既往地持續著，由此而生的現金流也源源不斷，助自民黨保住了江山。各地興建了越來越多的道路、橋梁、水壩、會議中心、機場、柏青哥彈子房、博物館、市政廳、賓館、隧道、主題公園和工業園區。這些項目中，有不少派上了用場——應該說是解了燃眉之急，但也有很多無意義的建設。日本如今隨處可見用處不大的“爛尾”隧道和公路，毫無生機、連個人影也瞧不見的河道和橋梁，以及空空蕩蕩、鮮有人踏足的博物館和主題公園，這些都是“池田路線”和田中的金錢政治留下的不那么可愛的遺跡。

然而，從其釋放的洪荒財力來看，田中的政績可謂光鮮亮麗。20世紀80年代，東京的雅皮士可以金箔為食，在黃金地段置辦不動產的錢可以買下一個小國家。日本作者著書立說，吹噓即將到來的“日本世紀”：今天還在東京，明天就將傳遍全世界！外國人寫的書有些宣揚與日本將有一戰，有些則評議所向披靡的日元，或者勢不可擋的日本體制——要想與之抗衡，唯有出臺與之針鋒相對的產業政策；西方的生意人捧讀17世紀介紹武士戰法的小書；以日本管理技術為題的書籍行銷一時。似乎這一輪“日本熱”永遠都沒有盡頭。

可是，許多日本人內心彌漫著一股悵然若失的情緒，他們的國家是很富足，但也越發丑陋，似乎丟了些什么。奧姆真理教在1995年制造了以大量殺傷人員為目的的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這是個邪教組織，其成員都受過最好的教育，不少人不是科學家就是經過培訓的未來技術官僚。他們是“池田路線”的接班人，缺乏對眼下現狀的政治責任感，滿腦子都是噬人的精神烏托邦。該組織的宗旨是引發一場祝融之災，任熊熊烈焰焚毀他們眼中這個無意義的社會，并從戰后繁榮的灰燼里誕生出一個美麗新世界。

20世紀80年代，保守派政客及其知識界擁護者也開始對現代日本價值觀的缺失犯起愁來。尤其是青年，被養尊處優的生活寵壞了，一副得過且過、毫無方向的樣子。原海軍軍官、田中派成員中曾根康弘在80年代中期當選首相，之后嘗試推廣一種新型的民族主義思想，但實際上，他在任內搞的那套宣傳和舊民族主義思想相差無幾：譬如單民族國家好處多多、尊重天皇制度、日本精神獨一無二。這些宣傳的出現，部分是為了與教師聯盟和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多年來炮制的左翼教條分庭抗禮。然而，對于一個純粹視擴大經濟實力為政治目標的國家而言，再談什么內涵純屬庸人自擾，而民族主義者關于日本性精髓的那套說辭又不足以取代政治辯論。

中曾根的民族主義思想不過是虛張聲勢，甚至都不如岸信介的修憲嘗試更有政治能量。有時聽中曾根說話，會覺得他像個戰時愛國者，但他也說過“日本是美國不沉的航空母艦”這樣的話。不管多少民族主義辭令都改變不了美日關系一邊倒的實質。1991年的海灣戰爭——打這一仗的目的部分是為了保障日本的石油供應——令這一點清晰到了讓人痛苦的程度：日本人只能作壁上觀，對于一場直接牽連到他們的危機插不上手，無能為力。日本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美國及其盟友支付一大筆酬勞，被嫌棄錢給晚了不說，也換不來幾句感謝。對此感到恥辱的并不只是日本民族主義者。

海灣戰爭兩年后，自民黨在大選中落敗。該黨此時正飽受貪污丑聞的困擾，還經歷了幾位實力派政客倒戈的變故。一時間，“自民黨體制”猶如明日黃花。說不定一個由反對黨組成的新政府會推行必要的改革，為日本封閉的政治體制注入活力呢。自民黨的主要變節者之一、“豬肉桶”政治的老手小澤一郎甚至主張修憲，使日本成為他口中的“正常國家”。小澤指出，日本人是時候成為獨立個體，愿意冒風險，為自己站出來了。修憲將引導日本在世界舞臺上扮演更加獨立自主的角色。另外，長久以來，選舉制度一直都是畸形的，偏向不斷衰減的農村人口，對之進行改革有助于形成一個富有活力的兩黨制格局，終結自民黨一家獨大的地位。

事后證明，這又是一場偽黎明。選舉制度變更的力度不夠，未能產生影響。反對派領導人在內斗中徒耗精力。脫離了自民黨的小澤一郎燒不起錢，也就辦不成事，無法取悅手下黨員。1994年，自民黨與社會黨聯合執政，回歸權力舞臺。到了1997年的時候，小澤等自民黨“叛徒”已是窮途末路。

要說變化，倒還真有，其催化劑不是政治意愿，而是經濟走勢：繁華盛世在股災中戛然而止。地產價格狂瀉，銀行倒閉。以事后之見，日本經濟的泡沫之大，一下子讓人聯想起17世紀席卷阿姆斯特丹的“郁金香熱”。不管是日本勝利論者，還是西方杞人憂天者，都少見地陷入了集體失語。當然，這并未讓自民黨體制垮臺，卻多少葬送了人們對其的信任。官僚精英威望掃地。曾經他們備受信賴，充當穩定和增長的守護人，如今則被視為與現實脫節、夜郎自大的一群草包。自民黨依舊當政，但僅僅是因為沒有更好的選擇，況且他們也不再一黨獨大，不得不與其他黨派分享權力，比如與右翼佛教組織有關聯的公明黨。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頭一回出現連受過高等教育、在大公司高層任職的工薪族也不再有把握獲得終身聘用的情況。圖書館、咖啡店、地鐵站里不難見到他們的身影：這些男人穿著筆挺的藍色西裝，翻看報紙，假裝在工作，可實際上只是在一個緩慢解體的社會里隨波逐流。經濟崩盤倒不至于讓許多日本人變得一貧如洗，還沒到這一步。五十年的高速增長創造出了巨大的財富儲備，可“池田路線”也就此宣告終結。

就連平素在世界各國首都中最熙熙攘攘的東京，似乎也一反常態，籠罩上了一層憂郁的氣息。人們仿佛陷入了沉思，追問到底是哪兒出了問題。在我寫作本書期間，時任日本首相的是小泉純一郎。因為講話直白，外形陽光，再加上他承諾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小泉在2001年成了媒體上的大紅人。同各位前任一樣，小泉號稱將打破黨內派系之隔，限制官僚的干預行為，并承諾上任后，以吃回扣為特色的腐敗舊體制、失控的大修大建和稀里糊涂的預算制度將得到清理整頓。人們期待他成為日本的戈爾巴喬夫，成為埋葬體制的改革者，但他們的希望落空了。這之后，政治和政客日益成為公眾冷嘲熱諷的對象。這種情況在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向來不是什么好兆頭。這些情形一旦與受挫的民族主義情緒和經濟絕望感交織在一起，或許將再次把日本推向自由的對立面。

人們對現任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議論紛紛，說此人值得關注。有人一說起石原就滿懷殷切希望，似乎他象征自民黨的底牌；但也有人對他又怕又恨。石原本是一位小說家，因為在20世紀50年代發表了一些膾炙人口的作品而聲名鵲起。他與小泉的共同點是兩人均擅長面對鏡頭，而且敢言，這為他們博得了不少美譽。石原的觀點在書籍、視頻、雜志和電視脫口秀中屢有曝光。同民粹主義前輩類似的是，他也對官僚執掌“自民黨體制”一事頗有微詞。他最著名的一部小說出版于1955年，書中主人公是一群叛逆的富家公子。同年，自民黨成立；翌年，《經濟白皮書》宣告戰后時期結束。自打那時起，石原的思想就未曾動搖過。他指責美國一手打造了一個孱弱而精神空虛的國家。在他看來，日本打的是一場正義戰爭，是時候讓戰后的日本斬斷同華盛頓之間的紐帶，恢復其亞洲盟主的地位了。

這同樣可能只是一堆誑語，反映了內心的失落和戰敗造成的揮之不去的恥辱感。但是與石原熾熱的民族主義情結產生共鳴的還不光是他的同齡人，年輕人一樣受到了蠱惑。在我看來，這是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結果：一方面，日本的思想文化處于左右兩派教條的夾縫之中，有些發育不良；另一方面，當權派執拗地將眼光局限于經濟增長，有意扼殺政治辯論；除此之外，還要算上日本對美國嬰兒般的依賴。在這些問題得到解決之前，戰后時期是不會終結的。

可又該如何解決呢？故事回到了原點，回到了日本最初與西方勢力正面交鋒的時刻。在一些人看來，這標志著與西方漫長戰爭的開端。2002年的早春時節，我在東京伏案寫稿，其間回想起一件事：過去幾周以來，日本人曾屢次一本正經地告訴我，他們希望黑船再殺回來，打破封閉的政治體制。他們表示，過去的老一套已經行不通了，只有借助外部壓力，才能將束縛這個狹隘社會的死結解開。我明白這些話的含義，但我還是期待有朝一日看到日本人解放自我，真正地和黑船告別，因為他們不再需要后者。

注釋

[\*](#_88) 　“豬肉桶”喻指人人都可分一杯羹。在西方政界，議員常會在國會制訂撥款法時將錢撥給自己的州/選區或自己特別熱心的某個項目，這種做法就叫“豬肉桶”政治，本質上是一種分肥政治。

# 專有名詞詞匯表

將軍（Shogun）：字面意思是軍事將領，實際是日本的軍事大統領。1603——1867年間的歷任將軍均出自德川一族，其統治時期被稱為德川或江戶時期。

江戶（Edo）：德川將軍府所在的城市。1867年幕府倒臺后，江戶更名為東京，成為現代日本首都。

幕府（Bakufu）：將軍府的名號，亦可使用shogunate這一別名。

武士（Samurai）：武人階層的統稱。所有將軍以下的武夫，乃至最卑微的門客，都叫武士。武士被禁止經商，因為這有損其高貴的身份。因此，武士多為收入微薄的官門中人。在和平年代，不少武士賦閑失業。不過，他們是唯一獲準攜帶武器和行切腹之儀的群體。

蘭學（Rangaku）：意即荷蘭的學問。自幕府早期以降，荷蘭商人是唯一獲準駐留日本的歐洲人。通過學習荷蘭文，日本學者得以接觸歐洲的科學知識。

薩摩（Satsuma）：封建時代的一個藩，位于今天的九州。除了薩摩之外，還有兩個藩的領主起事，反抗幕府。薩摩孕育了一大批明治年代的豪杰，譬如政治家大久保利通。另一位祖籍薩摩的英雄人物是西鄉隆盛，在他的率領下，一批心懷不滿的武士揭竿而起，對抗東京的新政府。

長州（Choshu）：本州島西南端的一個藩。長州的武士也是對抗幕府統治的叛黨之一，他們時而與薩摩藩的武士結盟，時而又與之敵對。偉大的明治維新政治家伊藤博文就出生在長州，他的同鄉里還有近代帝國陸軍奠基人山縣有朋。

土佐（Tosa）：這是三個造反的藩當中最貧窮、但也是風氣最開明的一個。土佐位于四國島南部，名氣最響的土佐藩人士莫過于坂本龍馬這位鄉野劍客和日后的明治憲法起草人。

幕末（Bakumatsu）：德川幕府最后的光景。這一時期的日本危機四伏，陰謀和暴力起義不斷，走四方的劍客隨處可見，血淋淋的歌舞伎作品層出不窮。

明治維新（Meiji Restoration）：推翻幕府的起義，后在東京建立新政府，天皇一躍成為昔日將軍府的新主人。維新成功后，“明治”二字立即啟用，作為天皇的年號。

文明開化（Bunmei Kaika）：“文明開化”是明治年間的主要口號，這一時期的日本嘗試以歐洲為模板，將自己打造為現代國家。

富國強兵（Fukoku Kyohei）：“富國強兵”是明治時期流傳的另一句口號，是“文明開化”的變種，著重于增強軍力和經濟實力。

國會（Diet）：這個詞在英語里常被用來指代英國以外的議會機構。

大正（Taisho）：明治天皇之子嘉仁的年號，在位時間為1912——1926年，但由于嘉仁無力繼續履行職責，其子裕仁在1922年出任攝政王。

國體（Kokutai）：一種描繪日本國家的半神秘主義觀念。按其構想，日本應該是一個專制的家族式國家，統治者是神圣天皇。這一神圣國體精髓論最初出現在1937年文部省出版的《國體之本義》一書中。

皇道派（Kodoha）：20世紀20年代末，一批年輕軍官和他們的思想導師發動了一場革命，旨在清除有害的西方影響，譬如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他們希望以日本精神來征服世界，而這一精神的化身便是神圣天皇，這就要求“復辟”他的絕對統治權。為了實現這一理想，1936年2月，皇道派發動政變，政變以失敗告終。

統制派（Toseiha）：軍隊內部的主要敵對派系。盡管其成員并不一定反對激進皇道派的宗旨，但他們更傾向于循規蹈矩的做法。粉碎了1936年的未遂政變后，統制派獨攬兵權。

財閥（Zaibatsu）：起源于明治早期“公私轉制”的商業聯合體。三井和三菱等私營企業在政府的幫助下，將業務拓展至銀行、礦產、重工和貿易等領域，從而獨霸日本經濟的半壁江山。二戰結束后，盡管這些家族企業的掌門人在美占期遭到法辦，財閥依舊存在，形式雖較過去不同，但壟斷程度未必遜于過往。

# 引用文獻

要是想通過一本書了解近現代日本史的話，馬里烏斯·楊森（Marius Jansen）的《現代日本誕生記》（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可以說是最全面的，囊括了所需要的一切信息，此書令我受益匪淺。不過，其他經典作品一樣不容錯過，比如由費正清（John K.Fairbank）、埃德溫·O·賴肖爾（Edwin O.Reischauer）和阿爾伯特·M·克萊格（Albert M.Craig）共同創作的《東亞：現代化轉型》（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60）一書，這部參考資料我沿用至今。

在撰寫德川日本與西方的沖突時，唐納德·金（Donald Keene）的《日本發現歐洲：本多利明與其他發現者，1720——1798》（The Japanese Discovery of Europe：Honda Toshiaki and Other Discoverers，1720–1798.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2）令我獲益良多，尤其是談到啟蒙帝國主義者本多利明的那部分。彼得·布斯·威利（Peter Booth Wiley）的《眾神之國里的美國佬：佩里司令與日本開國》（Yankees in the Land of the Gods：Commodore Perry and the Opening of Japan.New York：Viking，1990）既風趣又全面地記錄了佩里將軍來到日本以及其所引發的政治紛爭的來龍去脈；佩里的翻譯衛三畏的引語便是摘自此書。在寫到德川幕府末期的日本知識界氛圍時，我參考了丸山真男的《幕府日本思想史研究》（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okugawa Japa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和格蘭特·K·古德曼（Grant K.Goodman）的《日本：荷蘭經驗》（Japan：The Dutch Experience.London：Athlone，1986）。另一部重要文獻是鮑勃·若林忠志（Bob Tadashi Wakabayashi）的《日本現代早期的排外主義和西學》（Anti-Foreignism and Western Learning in Early Modern Japa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其中收錄的水戶學派及其分支的資料彌足珍貴。講述由劍客轉型成為憲政主義者的坂本龍馬的書籍已經汗牛充棟，我采用的是馬里烏斯·楊森的《坂本龍馬與明治維新》（Sakamoto Ryo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讀者若想進一步深入探究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生活狀態，請參見楊森的《德川世界里的中國》（China in the Tokugawa Worl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要想知道明治時期的日本文化人過的是怎樣的生活，最好的辦法恐怕還是讀上幾本夏目漱石的小說，特別是1914年問世的《我是貓》。唐納德·金在《西方的黎明：日本現代文學》（Dawn to the West：Japanese Literature in the Modern Era.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84）一書中談及了這部小說及當時其他作品。金本人很有明治時期的風骨，他不僅為我提供了寶貴的指引，還有著美妙的譯筆。拙作引用的高村光太郎的詩歌譯文便是出自金之手。我摘用的另一位明治時期名人福澤諭吉的語錄則出自《福澤諭吉自傳》（The Autobiography of Fukuzawa Yukichi.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譯者是清岡瑛一。

關于明治年間的戲劇創作，J.托馬斯·萊默（J.Thomas Rimer）的《邁向現代日本劇院：岸田國士》（Towards a Modern Japanese Theater：Kishida Kunio.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提供了很好的素材。要想了解日本早期電影史的話，唐納德·里奇（Donald Richie）和約瑟夫·L·安德森（Joseph L.Anderson）的《日本電影：藝術與工業》（The Japanese Film：Art and Industry.New York：Grove Press，1959）依舊是一部扛鼎之作。茱莉亞·米奇——佩卡里克（Julia Meech-Pekarik）的《明治浮世繪的世界：對一個嶄新文明的印象》（The World of the Meiji Print：Impressions of a New Civilization.New York：Weatherhill，1986）的內容遠不止浮世繪，全書配有精彩的文字介紹。我從她的書里選用了皮埃爾·洛蒂描寫鹿鳴館內景的段落。三島由紀夫對于明治時代假道學發出的嗟嘆出自他為矢頭保的精美攝影集《裸祭》（Naked Festival.New York：Weatherhill，1968）所作的序言。這本書居然已經絕版，著實令人愕然。

在寫到現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時，我想不到有比卡羅爾·格魯克（Carol Gluck）的《日本的現代神話：明治末年的意識形態》（Japan’s Modern Myths：Ideology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更加出色、也更引人入勝的作品了。要是沒了這本書，我就真是束手無策了。關于日本的帝國建設，竊以為拉蒙·梅耶斯（Ramon Myers）和馬克·皮蒂（Mark Peattie）編著的《日本殖民帝國，1895——1945》（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1895-1945.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不可不讀。在寫到民權運動等反抗當權者的叛亂時，羅杰·W·鮑溫（Roger W.Bowen）所著的《明治日本的叛亂與民主：民權運動中的庶民》（Rebellion and Democracy in Meiji Japan：A Study of Commoners in the Popular Rights Movem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派上了大用場。

愛德華·塞登斯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的《低城、高城：從江戶到大地震時期的東京的東京》（Low City，High City：Tokyo from Edo to the Earthquake.New York：Knopf，1983）以挽歌般的筆觸描寫了大正年間的東京，勾起了人們的思緒。此書當和塞登斯蒂克翻譯的懷舊派巨匠永井荷風的部分作品搭配在一塊兒看，如果硬要挑其中一本的話，非《墨東綺譚》莫屬。北一輝的文字讀起來就沒那么令人暢快了，但對于一些讀者而言或許同樣趣味盎然。拙作中的引語摘選自《北一輝論》（東京：現代評論社，1981年），作者是松本健一。不過有關北一輝的英文類權威讀物還要看喬治·M·威爾遜（George M.Wilson）的《日本的激進民族主義者：北一輝，1883——1937》（Radical Nationalist in Japan：Kita Ikki，1883-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D.C.霍爾頓（D.C.Holtom）的《現代日本與神道教民族主義：當代日本宗教趨勢研究》（Modern Japan and Shinto Nationalism：A Study of Present-day Trends in Japanese Relig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3）也很有意思，但明顯帶有時代局限性。記載1936年政變的一部重要文獻是本——阿米·施羅尼（Ben-Ami Shillony）的《日本之亂：少壯派軍官和二·二六事件》（Revolt in Japan：The Young Officers and the February 26，1936 Incid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在撰寫日本皇室近代史，特別是裕仁的教育經歷時，我參考了赫伯特·P·比克斯（Herbert P.Bix）的《裕仁與現代日本的誕生》（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New York：HarperCollins，2000），從中獲益匪淺。

“滿洲”如今已有許多人著書討論，但沒有一位作者在寫到這個話題時可以忽略路易斯·楊（Louise Young）的《日本的大一統帝國：滿洲與戰時帝國主義文化》（Japan’s Total Empire：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我大段借鑒了其中的內容，特別是講述大眾文化和政府宣傳的章節。南京大屠殺或許比起“滿洲”更有話題性，幾乎每一本以此為題的書都帶有政治色彩。要想了解日本自由派／左派的觀點，本多勝一的《南京大屠殺始末采訪錄》（The Nanjing Massacre：A Japanese Journalist Confronts Japan’s National Shame.New York：M.E.Sharpe，1999）不可不讀。我在拙作中引用了一段參加過南京攻城戰的日本兵的話，出處是阿諾德·C·布拉克曼（Arnold C.Brackman）的《另一個紐倫堡：東京審判未曾述說的故事》（The Other Nuremberg：The Untold Story of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s.London：Collins，1989），該書完美地記錄了東京戰爭罪審判的經過。諾門罕戰役在阿爾文·D·考克斯（Alvin D.Cox）的《諾門罕：日本對抗俄國，1939》（Nomonhan：Japan Against Russia，193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一書中有十分詳盡的記載。

關于偷襲珍珠港，最出彩、同時也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戈登·普蘭奇（Gordon Prange）的《我們沉睡在清晨：有關珍珠港的未告訴過人的故事》（At Dawn We Slept：The Untold Story of Pearl Harbor.New York：McGraw-Hill，1981）。在寫到珍珠港事件前夕的外交風云時，我參考了拉爾夫·E·夏弗（Ralph E.Shaffer）編著的《迎向珍珠港：日美外交往來，1899——1941》（Toward Pearl Harbor：The Diplomatic Exchange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1899-1941.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林房雄在《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東京：大和文庫，1978年）中羅列了一些日本人對珍珠港事件的反應，我引用了其中文學評論家奧野健男的話。讀者可能不同意約翰·W·道爾（John W.Dower）在《無情的戰爭：太平洋戰爭中的種族和權力》（War Without Mercy：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New York：Pantheon，1986）一書中的部分前提假設，我也一樣，但是作為一部記錄戰時日本人心態的史籍，道爾的這部書提供了海量的資料。鶴見俊輔的《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Wartime Japan，1931-1945.London：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86）同樣涉及這一題材，雖然較前者薄得多，但內容一樣發人深省。此外，我還一遍遍翻閱了入江昭的《權力與文化：1941——1945年的日美戰爭》（Power and Culture：The Japanese-American War，1941-194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日本投降的全過程在羅伯特·J·布托（Robert J.Butow）的《日本的投降決定》（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一書中有翔實的記載。而若想了解戰爭全局，同時又能接受左派/自由派偏見的話，可以參考家永三郎的《太平洋戰爭，1931——1945》（The Pacific War，1931-1945.New York：Pantheon，1978），這本書仍不顯過時。

在我看來，所有以盟軍占領時期的日本為研究對象的作品當中，最出色、最詳盡、同時也最公允的一部當屬約翰·W·道爾的《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日本》（Embracing Defeat：Japan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New York：W.W.Norton，1999）。要想了解內幕的話，不妨查閱《重塑日本：美占期的“新政”》（Remaking Japan：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New York：Free Press，1987）一書，作者是西奧多·科恩（Theodore Cohen），編校工作由赫伯特·帕辛（Herbert Passin）操刀。關于占領時期的文化政策，平野共余子的《史密斯先生去東京：美占期的日本電影，1945——1952》（Mr.Smith Goes to Tokyo：Japanese Cinema Und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1945-1952.Washington，D.C.：Smithsonian，1992）提供了一個十分新穎的視角。除了前述的阿諾德·C·布拉克曼的書之外，任何東京審判的研究者都繞不開理查德·H·米尼爾（Richard H.Minear）的《戰勝者正義：東京戰爭罪審判》（Victor’s Justice：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該書犀利的觀點只是其若干亮點之一。此外，梅里安·哈里斯（Meirion Harries）和蘇希·哈里斯（Susie Harries）經過十分扎實的研究而寫成的《藏劍入鞘記：日本之非軍事化》（Sheathing the Sword：The Demilitarization of Japan.London：Hamilton，1987）也令我收獲頗豐。

丹·庫茲曼（Dan Kurzman）的《岸信介與日本：追尋太陽》（Kishi and Japan：The Search for the Sun.New York：Astor-Honor，1960）對于岸信介這個老流氓過于褒獎，話雖如此，這本書還是挺有用的。愛德華·塞登斯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的《東京崛起：大地震之后的城市》（Tokyo Rising：The City Since the Great Earthquake.New York：Knopf，1990）完美地回顧了東京廢墟間的眾生相，以及這座城市之后的重生。大島渚的日記選自其散文集《體驗的戰后映像論》（東京：朝日新聞社，1975年）。若要從保守派的視角來探討戰后憲法的話，我向各位推薦（我也引用過）片岡鐵哉的《憲法的代價：日本戰后政治的起源》（The Price of a Constitution：The Origin of Japan’s Postwar Politics.New York：Crane Russak，1991）。查默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的《通產省與日本奇跡︰產業政策的成長，1925——1975》（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s：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1925-197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是一本分析戰后經濟的好書。而在紀實方面，大衛·J·陸（David J.Lu）所著的《日本：一部紀實歷史》（Japan：A Documentary History.New York：M.E.Sharpe，1997）對我幫助很大。

當然，還遠不止上面這些，一些杰出的學術著作并未列入這份簡短的書目。我在撰寫這部簡史時，將參考書目限定在那些于我特別有用的書籍。我只能希冀這本小書起到“開胃菜”的作用，激發人們對后續“大菜”的胃口。

# 索引

（按漢語拼音順序排列，頁碼參見本書邊碼）

A

阿部定（Abe Sada）100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76，115

岸信介（Kishi Nobusuke）155-156，158，161，163-167，170，173

奧姆真理教（Aum Shinrikyo）172

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38，41，52

奧野健男（Okuno Takeo）111

奧運會（Olympic Games）3-7，167

B

巴茂（Ba Maw）121

白神源次郎（Shirakami Genjiro）50

坂本龍馬（Sakamoto Ryoma）27-29，30-32，40，151

板垣退助（Itagaki Taisuke）42

北上派（Strake North Faction）106-108

北一輝（Kita Ikki，）77-79，81-82，89-99，156

本多利明（Honda Toshiaki）24，51

本土論者（nativists）22-24

幣原喜重郎（Shidehara Kijūro）90

濱口雄幸（Hamaguchi Osachi）75，81

波茨坦會議（Potsdam Conference）125-126

部落民（burakumin）70-72

C

財閥（zaibatsu）41，132，149，150

查爾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138，141

朝鮮（Korea）：

起義（rebellions in）65-66

日本人的暴政（Japanese brutality）74

統治朝鮮（domination of）49，51，121

與朝鮮通商（foreign trade with）11

朝鮮戰爭（Korea War）150-151，157

池田勇人（Ikeda Hayato）165-166，167

沖繩（Okinawa）123，157

川上音二郎（Kawakami Otojiro）45

D

大島渚（Oshima Nagisa）161，162

大久保利通（Okubo Toshimichi）39，41

大隈重信（Okuma Shigenobu）38，42

大西瀧治郎（Onishi Takijiro）123-124

大正年間的東京（Taisho Tokyo）67-69，70，73-74，76-77，82，92，102，114

大正天皇／嘉仁天皇（Emperor Taisho/Emperor Yoshihito）65

大政翼贊會（Imperial Rule Assistance Association，IRAA）102，113

丹下健三（Tange Kenzo）3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59，131-134，138-143，151，157，163；另見“最高司令官”

德川吉宗（Tokugawa Yoshimune）16，21

德川幕府（Tokugawa bakufu）12，17，20，21，26，28，39，40

德國（Germany）：

二戰期間（in World War II）115

民族身份（nationhood of）52-53

納粹（Nazis in）91，100，113，114，133，145，156

紐倫堡法庭（Nuremberg court in）145

魏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76

猶太大屠殺（Holocaust in）102，113，145

殖民地（colonies of）65-66，70

作為楷模（models from）35-36，41，52-53，56，57，106，133，142-143

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Dwight D.Eisenhower）163，164

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the German kaiser）58，82

東京（Tokyo）

暴亂（riots in）69-70

大眾文化（popular culture in）66-69

地震（earthquakes in）74

毒氣事件（poison gas in）172

憂郁的東京（as subdued）175

戰爭罪法庭／東京大審（War Crimes Tribunal）103

東久邇稔彥（Higashikuni Naruhiko）138-139

東條英機（Tojo Hideki）98，114，116，118，119，121，146-147，155，156，165

東鄉茂德（Togo Shigenori）125，126

東鄉平八郎（Togo Heihachiro）58，79，81

E

俄國與“滿洲國”（Russia and Manchukuo）106-108

兒玉譽士夫（Kodama Yoshio）139，162，164，170

二戰（World War II）3，14，87，111-128

ABCD四大國（ABCD powers in）116，118

天皇（and emperor），見“裕仁天皇”

日軍暴行（Japanese brutality in）119-120，163

揮之不去的戰敗恥辱感（humility lingering from）176

“舉國玉碎”（as national suicide）115

日本投降（surrender in）123-128

完全不負責任（systemic irresponsibility of）117-119，122

物資生產（production in）122

戰爭罪審判（war crime trials）144-147，152

珍珠港事件（Pearl Harbor）111-112，115，119，145，155

政治宣傳（propaganda in）120-121

自殺式攻擊（suicide in）123-124

F

F.D.羅斯福（F.D.Roosevelt）113，138

菲利普·弗朗茨·馮·西鮑魯特（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17-18

菲律賓（Philippines）105，111，116，146

佛教（Buddhism）45，57，89，175

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 Lloyd Wright）67

福田赳夫（Fukuda Takeo）170

福澤諭吉（Fukuzawas Yukichi）17，45，47-50，56，60，61，72，151

G

富士山（Mount Fuji）135，138

高村光太郎（Takamura Kotaro）79-80，111

高橋景保（Takahashi Kageyasu）17-18

哥白尼（Copernicus）22

歌舞伎（Kabuki theater）44-45，134，138

格勞比烏斯（Globius）18

瓜達爾卡納爾（Guadalcanal）122

寡頭／藩閥（oligarchs）41-42，52，56，60，71

廣島（Hitoshima）4，126，136，146，159，160

廣田弘毅（Hirota Koki）100-101

國會（Diet）37-38，92，97-98，113，159，162，165

國家統一（national unity）51-57，91

國際聯盟／國聯（League of Nations）90，94-95

國體（kokutai）77，78，83，98-99，120，123-127，138-139，141，145，146，161，163

H

哈利·S·杜魯門（Henry S.Truman）124，125，151

海灣戰爭（Gulf War）173

何塞·勞雷爾（JoséLaurel）121

荷蘭商人（Dutch merchants）11，12，15，16

荷屬東印度（Dutch East Indies）111，116

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epncer）42-43

亨利·溥儀（Henry Pu Yi）94

橫濱地震（earthquake in Yokohama）74

荒木貞夫（Araki Sadao）79，106

皇道派（Imperial Way Faction）98-100，106，114-115

會澤正志齋（Aizawa Seishisai）23

J

基督教（Christianity）15，22-23，57

吉田茂（Yoshida Shigeru）3，36，139，139-143，149-151，155-158，161

吉田松陰（Yoshida Shoin）53

吉野作造（Yoshino Sakuzo）72-75，76

加藤高明（Kato Takaaki）75

江戶幕府（Edo bakufu）12，14，21，25，26-29，31，53，56

將軍（shogun）11-12，16，20，32

蔣介石（Chiang Kai-shek）88，102，103，104，107，125

《教育敕語》（Imperial Rescript on Education）56

近衛文麿（Konoe Fumimaro）101-102，106，115-118，120，139

井上馨（Inoue kaoru）46，47，51，53

鳩山一郎（Hatoyama Ichiro）161

九代目市川團十郎（Ichikawa Danjuro IX）44

《軍人敕諭》（Rescript for Soldiers and Sailors）55，144

K

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118-119

困民黨（Poor People’s Party）43-45

L

蘭學（Dutch learning，Rangaku）15，16-19，21，23，24，48

林房雄（Hayashi Fusao）87，111

鈴木貫太郎（Suzuki Kantaro）125，126-127

鈴木貞一（Suzuki Teiichi）117，118

硫磺島（Iwo Jima）122

鹿鳴館（Deer Cry Pavilion）46-47

M

馬克思少男少女（Marx boys and girls）67

馬克思主義（Marxism）95，96-97，114，137，160，173

馬休·C·佩里（Matthew C.Perry），昵稱“老馬特”（Old Matt）11-14，18，22-23，25-26，53，88，118，131-134

滿洲（Manchurian）76，87，88，93-96，100，144，170

“滿洲國”（Manchukuo）94-96，105，106-108，119，155，156

毛澤東（Mao Tse-tung）149

美國（United States）：

反美主義（and anti-Americanism）159-160，163-165，176

原子彈（atom bombs of）125，126，127

民主（democracy in）38

海灣戰爭（and Gulf War）173

中立法案（neutrality laws of）104

與美國簽訂條約（treaties with）3，26-27，30，47，51，158，163

二戰期間（in World War II）111-128

美濃部達吉（Minobe Tatsukichi）97-98，126

米勒德·菲爾莫爾（Millard Fillmore）12

米騷動，1918年（rice riots）66，70

民權運動（People’s Rights Movement）42，54，59，70，77，152

明六社（Meirokusha）48-49

明治維新（Meiji Restoration）29，31，35，37-47，51-56，78，80，92-93，105，113，121，142，144

木戶孝允（Kido Takayoshi）39

幕末（bakumatsu）26-29

明治天皇／睦仁天皇（Emperor Meiji/Mutsuhito）35-36

N

乃木希典（Nogi Maresuke）59，60-62，81，92-93

南京大屠殺（Nanking massacre）102-106，144，145，146

能劇（No theater）135

P

皮埃爾·洛蒂（Pierre Loti）46，47

平成（Heisei reign）169

《樸次茅斯條約》，1905年（Treaty of Portsmouth）69，70

Q

淺沼稻次郎（Asanuma Inejiro）164

喬治·凱南（George F.Kennan）149

犬養毅（Inukai Tsuyoshi）75-76，90-91

R

日本（Japan）：

“不留俘虜政策”（take no prisoners policy of）104，123

閉關鎖國（isolation of）11，14，21

產業規劃（industrial planning in）40-41，156，157，161

大眾文化（popular culture in）66-69，92，112-113，135-138，159

等級制度（caste system in）21，40

地震（earthquakes in）74

二戰期間（in World War II）111-128

分權（separation fo powers in）20-21

腐敗（corruption in）170-172

共產黨（communists in）148-150，158

古代詩歌（ancient poetry）22

股災（stick market crash in）174-175

海軍（navy of）116，117，132

經濟增長（economic growth in）151，162-163，167

盟軍占領（Allied occupation of）126-128，131-152，另見“最高司令官”

民主（democracy in）72-73，133-136，140，144，151，156

民族主義（nationalism of）23，91，173

內戰（civil war in）30-32

農民起義（farmers’uprisings in）43-45

企業工會（company unions in）166

日本社會黨（JSP）161-162，164-166

日俄戰爭（Russo-Japanese War），見“日俄戰爭”

日軍（army of）54，55，57，98-100，103，114，117，132，143，150-151，156，157，158

日軍暴行（atrocities of）102-106，119-120

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 of）40-41

外國通商貿易（foreign trade with）11-19，21，24，26-27，103-104，115-116，119，148

文化傳統（cultural traditions of）21-22

現代性（modernism of）54

憲政和平主義（constitutional pacifism in）143-144，151-152，157，160

選舉權（voting rights in）72，75，76，151

政黨（political parties in）92，113，161，171，174

殖民主義（colonialism）74

種族純潔性（racial purity in）113-114

專制統治（arbitrary rule of）43

《日本的悲劇》（電影）（The Japanese Tragedy）140-141

日俄戰爭（Russo-Japanese War）58-59，65，69，73，79，81，93，95

日心說（heliocentrism）22

儒家思想（Confucianism）17，19，56-57

若槻禮次郎（Wakatsuki Reijiro）90

S

薩摩藩起義（Satsuma）39-40，61

三島由紀夫（Mishima Yukio）45-46

三井（Mitsui）41，44

三菱（Mitsubishi）41，44，65

森有禮（Mori Arinori）36-37，38，48

山本五十六（Yamamoto Isoroku）115，119

山縣有朋（Yamagata Aritomo）39，41，53-56，60，61，71-72

上帝的角色（roles of God）57

神道教（Shinto）22，23，45，56，121，142

神風（kamikaze）118，123-124

勝海舟（Katsu Kaishu）27-28

辻政信（Tsuji Masanobu）106，107-108

石原莞爾（Ishiwara Kanji）89，91，98，139

石原慎太郎（Ishihara Shintaro）175-176

笹川良一（Sasakawa Ryoichi）155，162

水戶學派（Mito School）22-24，27，57，82

松岡洋右（Matsuoka Yosuke）95

松井石根（Matsui Iwane）106

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 Chnadra Bose）121

蘇聯和日本左派（Soviet Union and Japanese Left）158-161

T

臺灣（Taiwan）51，121

太陽女神（sun goddess）23，84

天皇（Emperor）：

首任天皇（first）35

效忠天皇（loyalty of）21，26，55，144

圍繞天皇的陰謀（plots around）14，29

天皇的角色（roles of）20-21，30-31，37-39，82，117-118，126，158

作為最高統帥的天皇（as supreme commander）90，91，145

作為象征的天皇（as symbol）11，105，138，141-143

天皇崇拜（worship of）22，55-56，81，113

另見“裕仁天皇”

天照大神（Amaterasu Omikami）84

田中角榮（Tanaka Kakuei）170-173

通產省（Ministry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MITI）148

統制派（Control Faction）98-100，114

W

55年體制（1955 system）161-163

汪精衛（Wang Ching-wei）121

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2，25

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36，113，125

文樂木偶戲（Bunraku puppet theater）135

五條御誓文（Charter Oath）29，40

武士（samurai）21，37，31，39，54-55，61，122，123，135，155

X

西方（West）：

對西方的激烈反應（backlash against）47

西方的觀念（ideas of）24-25，47-50，53-54，112-114，121

控制日本（Japan controlled by）95

西方知識（knowledge of）14-20

醫學（medicine of）15-16

與西方的全面戰爭（total war with）98，111-128

西田幾多郎（Nishida Kitaro）76-77

西鄉隆盛（Saigo Takamori）39-40，61

夏目漱石（Natsume Soseki）60，61

憲兵隊（Kempeitai）120

憲法（constitution）29-30，35-39，52，78，92，142-144，151-152，159

小林多喜二（Kobayashi Takiji）97

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50-51

小泉純一郎（Koizumi Junichiro）175，176

小澤一郎（Ozawa Ichiro）174

新加坡（Singapore）105，111

新人會（Shinjinkai）73-74

新儒家（Neo-Confucianism）17，18，57

血盟團（Blood Pledge Society）76

Y

鴉片戰爭（Opium Wars）21

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59

亞洲人的自豪感（Asian pride）114，121

一戰（World War I）65

伊藤博文（Ito Hirobumi）36，38，39，40，41，45，47，53，54，61，71

伊藤整（Ito Sei）111

銀座（Ginza）66-67

印度支那（Indochina）116，118

尤利塞斯·S·格蘭特（Ulysses S.Grant）42

裕仁天皇（Emperor Hirohito）83-84，92

去世（death of）169

失去實權（ineffectiveness of）91，107

未遂政變（and attempted coup）100

與暴力（and violence）89，103，106

與二戰（and World War II）111，114，116，117-118，124-127，138，141，145-147

與最高司令官（and SCAP）134，140-142，146

作為皇儲（as crown prince）65，71，81-83

原敬（Hara Kei）70-72，81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57

約瑟夫·道奇（Joseph Dodge）149-150，163

約瑟夫·格魯（Joseph Grew）124，138

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125

Z

占星學（astronomy）22

戰爭罪（war crimes）144-147，152，159-160

張學良（Chang Hsüeh-liang）89

張作霖（Chang Tso-lin）89

長崎（Nagasaki）12，17，126，136，146，159

昭和年代（Showa period）84，92，97-99

珍珠港（Pearl Harbor）111-112，115，119，145，155

植木枝盛（Ueki Emori）37

殖民主義（colonialism）24-25，51

《治安維持法》（Peace Preservation Law）75，83

中曾根康弘（Nakasone Yasuhiro）173

中國（China）：

作為天下的中心（as center of world）16，18，19，20

共產主義（communism in）20，149，160

集權（concentration of powers in）20-21

外國通商貿易（foreign trade with）11

“支那事變”（盧溝橋事變，1937年）（“Incident”）87，101-102，116

滿洲（and Manchuria）88，94-96

五四運動（May 4th Movement）66，70，74

南京大屠殺（Naking massacre）102-106，144，145，146

鴉片戰爭（Opium Wars of）21

治國術（statecraft of）19，22

與中國簽訂的條約（treaties with）51

與中國的戰爭（war with）49-51，61，105，111，112，145

從中國撤軍（withdrawal from）115，116，117，118，122

朱熹（Chu Hsi）17

自民黨（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cy Party，LDP）161-163，165-166，170-171，173-176

自然法（natural law）42

最高司令官／駐日盟軍總司令（SCAP，supreme commander）131-152：

保留天皇（emperor retained by）134，140-142，146

被撤職（dismissal of）151

得到最高司令官支持的官僚（bureaucrats supported by）148-150

繼任者（successes of）151-152

結束占領（end of occupation by）158

培育民主（democracy fostered by）133-136，140，144，151

戕害經濟（economy wrecked by）149-150

審查制度（censorship by）136，138，140-141

文化改革目標（cultural reform as goal of）132-138

修憲（constitution revise by）142-144，151-152

以消滅封建主義為目標（feudalism as target of）135-136，147-148

主審戰爭罪（war crimes tried by）144-147，152

佐藤榮作（Sato Eisaku）167





